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

〔苏〕 M·M·巴赫金著
B·H·沃洛希诺夫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07.01.14

D. R. / 2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

[苏] M · M · 巴赫金

B · H · 沃洛希诺夫

张 杰 樊锦鑫译



“Фрейдизм•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7, М—Л.

Copyright for original material

1983 by Chalidze Publications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

〔苏〕M·M·巴赫金

B·H·沃洛希诺夫

张杰 樊锦鑫 译

中国文海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4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245册

ISBN7-5059-0060-9/I.34

书号：10355·1060 定价：1.45元

目 录

第一篇 弗洛伊德主义与当代哲学、心理学思想流派（批判的理解）

第一章 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 2

1. 弗洛伊德主义和当代性
2. 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核心
3. 当代哲学的类似核心
4. 弗洛伊德主义的初步评价

第二章 当代心理学的两种流派 15

1. 问题的提出
2. 实验心理学
3. 客观心理学
4. 语言反应
5. 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
6. 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问题
7. 科学与阶级

第二篇 弗洛伊德主义阐释

第三章 无意识和心理活动 30

1. 意识和无意识
2. 弗洛伊德主义发展的三个时期
3. 无意识的最初概念
4. 净化法

5. 第二阶段的特点	
6. 压抑说	
第四章 无意识内容	43
1. 本能理论	
2. 幼儿的性欲生活	
3. 俄狄浦斯情结	
4. 第二期的无意识内容	
5. 第三期的本能理论	
6. “自我理想”	
第五章 精神分析方法	57
1. 妥协的结构	
2. 自由联想法	
3. 梦的解析	
4. 神经机能病症	
5.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	
第六章 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化哲学	68
1. 文化与无意识	
2. 神话与宗教	
3. 艺术	
4. 社会生活形式	
5. 生之创伤	

第三篇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

第七章 弗洛伊德主义是主观心理学的变种	80
1. 弗洛伊德主义和当代心理学	
2. 心理和“无意识”的元素	
3. 主观主义的心理“动力学”	
4. 性感带理论批判	

5. 弗洛伊德主义和生物学

第八章 心理动力是思想观念动机的斗争，不是自然力量的斗争	90
1. 弗洛伊德主义的新颖之处	
2. “心理动力”是各种动机的斗争	
3. 社会动力向个人心灵的投射	
4. 意识的现在向无意识的过去的投射	
5. 事实与结构	
6. “心理动力”的客观因素	
第九章 作为思想观念的意识内容	103
1. 语言反应的社会学特征	
2. 意识内容的研究方法	
3. “日常思想观念”的概念	
4. “日常思想观念”的不同层次	
5. 性	
6. 结论	
第十章 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为弗洛伊德主义的强辩	113
1. 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2. Б·贝霍夫斯基的观点	
3. А·Г·卢里耶的观点	
4. Б·Д·弗里德曼的观点	
5. А·Б·扎尔金德的反射学化的弗洛伊德主义	
6. 总结	

附录：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	
.....	安娜·塔马尔琴科 142
译后记	184

第一篇
弗洛伊德主义
与当代哲学、心理学思想流派
(批判的理解)

第一章

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

- 1 弗洛伊德主义和当代性
- 2 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核心
- 3 当代哲学的类似核心
- 4 弗洛伊德主义的初步评价

1. 1893年，两位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在专门的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①题名为《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宣言）。文章为运用催眠术来治疗歇斯底里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这一“宣言”成了当代欧洲最盛行的思想流派之一——“精神分析”的发展开端。

精神分析诞生时是作为一种简单的精神病学方法^②，其理论基础极其薄弱。在本世纪头十年里，精神分析就已确定了自己的一般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阐述了人的精神生

^① 本文收入布洛伊尔医生和弗洛伊德医生合著的《癔病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一书。1895年第一版（1922年第四版）。
（原注）

^② 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提出的治疗歇斯底里的方法应该只是对医学上其它疗法的一种补充。（原注）

活的各个方面。随后，这种心理学理论被运用于解释文化创意的不同方面，如艺术、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现象。所以，精神分析具有自己的文化哲学。精神分析的这些一般心理学和哲学的理论渐渐排斥了这一学说的原始的，纯精神病学的内核。^①

精神分析在欧洲知识界获得广泛成功还是始于战前。但是战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它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按精神分析在资产阶级知识界影响的广度来看，它已是一切同时代思想意识流派所望尘莫及的。在这方面能与其媲美的也许只有人智说（斯泰纳学说）。^②甚至国际上的时髦流派，如当时的柏格森主义^③和尼采主义，任何时候，即使在其鼎盛时代，也没拥有过象弗洛伊德主义那样众多的追随者和爱好者。

精神分析“赢得欧洲”是相当缓慢的，而且一开始（在

① 并非所有的精神分析者都象我们所说的那样。然而，这种观点是可信的。弗洛伊德后期的两本专著《超越唯乐原则》("Jenseits der Lustprinzip" 1920)和《自我和伊底》("Das Ich und das Es" 1923)具备纯哲学的性质。1922年，在上届世界精神分析者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表示了忧虑，担心精神分析的投机的(思辨的)部分完全排斥了它本来的治疗使命。关于这一点参见 S·费伦齐博士和D·朗克博士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目标》 ("Entwicklungsziele der Psychoanalyse" 1924)。（原注）

② 人智说是法国P·斯泰纳（1861—1925）等人的神智学的一种，它认为，人具有特别的“超自然”性质，可以直接与好像存在的灵魂世界交往。（译者注）

③ 柏格森·昂利（1859—1941）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主要是直觉主义。（译者注）

本世纪的头十年中) 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道路。这表明, 它并非象斯宾格勒学说^①那样, 不胫而走, 表面上“时髦一时”, 而是更持久、更深刻地反映着欧洲资产阶级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所以, 任何一个人, 只要想深入了解当代欧洲的精神面貌, 就不能回避精神分析。因为它非常独特、令人难以地反映了当代生活的特征。^②

怎样解释精神分析的这一成就呢? 为什么欧洲资产阶级热衷于它呢?

当然, 不是因为这一学说关于专门学科和精神病学的方面。如果以为, 所有这些大量的精神分析的狂热崇拜者只是出于对精神病学的专业问题, 以及对于研究这一学科的专门构造感兴趣, 才倾心于精神分析, 那是极其幼稚的。他们不是在这方面和弗洛伊德主义情投意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弗洛伊德是他们研究过的第一位, 也是最后一位精神病学家。而《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成了他们翻阅的第一种, 也是唯一的一种专门论精神病学的杂志。如果以为, 弗洛伊德成功地使精神病学的专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那同样非常幼稚。显而易见, 并非由于对治疗方法成就的实际兴趣而导致了对精

① 斯宾格勒·奥瓦德(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之一。(译者注)

② 统一的国际弗洛伊德主义者组织的存在就可以说明弗洛伊德主义运动的广泛性。1924年举行了第八届弗洛伊德主义者会议。出席大会的各地方团体的代表分别来自维也纳、布达佩斯、柏林、荷兰、苏黎士、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和莫斯科。创立了许多精神分析期刊和专门的“希达佩斯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1920年, 在柏林为贫穷的精神病患者开办了第一家精神分析医院。(原编者注)

神分析的关注。倘若认为，所有这些大量的弗洛伊德的崇拜者只是些渴求痊愈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那就更加荒唐。毋庸置疑，弗洛伊德之所以能使当代资产阶级大为激动，不是靠其学说的专业科学，也不是靠它狭义的运用方面。

任何一个思想流派都不只是专家的狭小范围内的所有物。而它总是逐渐地获得广泛而又特殊的读者群。这些读者自然不会钻研学说的专业细节及细微差别。在每一个思想流派中，都可以挖出一个基本核心，即决定其成就与影响的整体体系的主要思想部分。这一基本核心能笼络人心，独自说明许多问题。它相对独立于广大读者难以理解的，该学说的科学理论的复杂构造。所以，可以用简单、粗糙的形式来标出它，用不着担心有什么不准确。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先略微涉及一下将进一步阐释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挖掘弗洛伊德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核心，并给予它以初步的评价。

这样，我们按下面的内容来论述。

精神分析是一座极为复杂，时而又饶有趣味的迷宫。在引导读者步入之前，必须一开始就使其站在坚决批判的立场上。我们应首先向读者说明，在什么样的哲学界状况之中，也就是说在哪些其它哲学流派之中，无论它们是否支配着欧洲知识界的思想，他应该来了解精神分析，以便真正把握这一学说的思想实质和价值。因此，必须强调，精神分析的核心决不是什么绝对新颖和意料之外的，而是完全可以纳入二十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切思想发展的基本轨道，也许是它们的最鲜明和最大胆的反映。

在下一章，即第二章里，我们不急于阐释弗洛伊德学说

本身，努力先使读者了解当代心理学各种流派的斗争，然后再去批判地理解这一学说的纯心理学方面。由此，我们就确定了要了解和评价弗洛伊德主义的专门心理学观点的步骤。

我们让读者有了批判的思想准备，作好了认识新现象的历史铺垫，从第三章开始转向系统阐释精神分析，不再用批评来打断这一叙述。本书的第二部分将重新回到第一部分两章中批判过的内容。

2. 什么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呢？

人的命运，人的生活和创作的一切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艺术家，他的艺术内容，如他是学者，他的科学内容，如果他是政治家，他的政治纲领和活动，——完全取决于他的性欲的命运，只取决于这一种命运。其它一切只是性欲这一基本的强大旋律的泛音。①

如果人的意识告诉自己其它的生活和创作起因与动力，那么人在撒谎。在弗洛伊德那里，基本论题的展开总是伴随着对意识的批驳。

因而，人身上起重要作用的不是决定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各自所属的那个阶级、民族和历史时代，而只是他的性别和年龄。其余一切都仅仅建筑在此之上。人的意识的确立不在于其历史生活条件，而在于生物条件，主要是性欲。

① 作者强调的只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在进一步的阐述之中（第三章），读者可以确信，无意识精神过程之存在的学说，“溢泄与反溢泄”说同样是弗洛伊德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见《性科学手册》（“Handwörterb der Sexualwissenschaften”1926, 第614页）中弗洛伊德的文章）（原编者注）

这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

就一般形式而言，它并不新鲜，也不奇特，然而，新鲜和奇特之处在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仔细分析，例如**性别和年龄的概念**。因为在这里，弗洛伊德确实成功地揭露了丰富多彩的新因素和新特点。由于官办科学在所有涉及人的性生活问题上的无比虚伪，这一切在他以前完全不能够科学地加以考察。弗洛伊德多少展开和充实了性欲的概念。我们习惯于把这一概念和那些通常的生活认识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认识原来仅是他庞大理论中的一个小角落。在评价精神分析时，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例如指责弗洛伊德主义是“泛性论”的同时，不应该忘却弗洛伊德的“性欲”一词有着这种新的、特别宽泛的含义。

其次，在性欲和年龄间的联系问题上，精神分析揭示了许多难以意料之处。人的性欲史始于其诞生之时，经历了一个漫长、独特的发展时期。它迥然不同于“从无辜婴儿到成熟少年，再到无辜老人”这一素朴的体系。弗洛伊德竟然不落窠臼地解开了斯芬克斯让俄狄浦斯猜的人的年龄之谜。^①这种解谜有多少道理是另一回事，我们后面再论述它。这里我们注重的只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的两个组成部分“性别和年龄”都已用新的内容加以补充和丰富了。所以旧内核本身已以新的形式来展示了。

然而，内核仍是陈旧的。在各个社会团体和阶级频频更

① 据希腊神话，女妖斯芬克斯那个著名的谜语是：“是什么用四条腿、两条腿和三条腿行走，腿越多时反而越没有力气？”聪明的俄狄浦斯猜出来谜底是“人”，因为人儿时用四肢爬行，成年时用双脚行走，到了老年则需要加上一根拐杖。（译者注）

迭、创造历史的所有时代中它常常重复出现。这是危机和衰落的主要标志。

当这一或那一社会阶级处于没落时期并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时，其意识形态就开始再三重复和百般变换说法来强调：人首先是一个动物。它企图从这一“启示”的观点出发，重新评价世界和历史的整个价值。著名的亚里斯多德公式的第二部分（“人是社会的动物”）这时被彻底忽视了。

这些时代的意识形态把注意的重心转到了孤立的生物体。而机体一般动物生活的三个基本事件“出生、性交（Coitus）、死亡”，按其思想意义来看，开始和历史事件相匹敌，似乎成为历史的替代物。

人身上的非社会性东西和非历史性东西被抽象出来，并通过超社会、超历史的尺度和标准来解释。看来似乎这些时代的人们想逃避不适而又冷漠的历史氛围，躲进动物生活的机体温暖之中。

例如，在希腊国家的没落时期，在罗马帝国的衰歇时期，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贵族制的崩溃时代，都出现过类似情况。

尽管在不同的情绪中，在诸如贫困享受、禁欲主义之类的现象中，还存在着各种细微的差别，罗马衰落时期的文学（如彼特罗尼的《萨蒂里孔》），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怀疑主义的智慧就这样向我们表现了自然之力、造化之功和历史之无力且无益的主题。恐惧历史、重新评价个人生活的利益、把人身上生理和性欲的因素放置首位——这就是所有这类思想现象的共同特征。

3. 正因为如此，在十九世纪末年，类似的主题又重新明显地呈现出来。抽象的生物体再度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纯粹理性”的（康德）、创造性“自我”的（费希特）、以及“绝对精神”的（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兴盛时代（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朝气蓬勃、自我清醒的哲学。它还充满着历史及资产阶级领袖的激情。到世纪的下半期，它就越来越庸俗化，并停滞在后继者的经院哲学的死气沉沉、毫无变化的体系之中（新康德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新费希特主义者）。终于，在我们今天，消极、萎靡的生命哲学接踵而来。它用生物学和心理学装扮自身，百般变化，并且使用了所有可能加前后缀的动词“жить”（生活）、“переживать”（忍受）、“изживать”（摆脱）、“вживать”（体验）等等。^①

各种结构组成的生物学术语直接吞没了宇宙观。因为大家都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生物学上的比喻，乐于使在康德纯粹理性的冷漠之中凝固了的物体复活。

这一当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当代思想家们，如柏格森、齐美尔、^②戈姆佩尔兹、^③

① 见于李凯尔特的《生命哲学》（科学院，1922年），书中有许多资料，但作者作为新康德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其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原注）

② 齐美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③ 戈姆佩尔兹（1832—1921）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实用主义者、舍勒尔、①杜里舒、②斯宾格勒，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各属不同的流派，但是基本上仍然具备三个共同点：

1) 哲学体系的中心是生物学意义的生命。有机体的一致被认为是哲学的最高价值和标准。

2) 不相信意识。试图把意识在文化创作方面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因此，把康德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哲学加以批判。

3) 企图用主观心理学或生物学之范畴来替换客观社会经济的范畴。力图回避经济，直接从自然中认识历史和文化。

这样，作为至今仍最知名的欧洲哲学家之一，柏格森把生命冲动 (*elan vital*) 这一概念确立为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他竭力从这里引出文化创作的一切形式。认识的最高形式（指哲学的直觉认识）和艺术创作相似于本能。它最充分地反映了整个生命之流。柏格森轻视造就精密科学的理智，而且即使理智的形式，也是直接从机体的生物构造中演绎出来。③

不久去逝的盖奥尔格·齐美尔在早期的论著中表现为一个康德主义者，到二十世纪就成了各种时髦的生物学流派的最旗帜鲜明的鼓吹者之一。他认为，个体生命之封闭的有机

① 舍勒尔 (1874—1928) 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② 杜里舒 (1867—1941) 德国生物学家。活力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③ 柏格森最重要的著作《创造进化论》，俄译本，莫斯科，1909年。
（原注）

体的一致是一切文化价值的最高标准。凡是能接近这种个体一致的，才具有思想和意义。在其代表作之一《特殊的规律》中，齐美尔努力把个性特殊发展的规律理解成道德法则。他一边反对康德提出的道德法则是一种普遍形式（绝对的无上命令），一边又发展了自己特殊的道德法则的概念。这一法则应该调节的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封闭、孤立的有机体内部的力量和欲望。^①

刚故去的美国心理学家、实用主义之父詹姆士的追随者和**实用主义者**运用了更愚蠢的形式来表现哲学上的生物学倾向。他们试图把文化创作的一切形式都归结为适宜、合理等生物学过程。^②

弗洛伊德的同胞，维也纳“病理经验主义”哲学家根里赫·戈姆佩尔兹在未完成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出和弗洛伊德主义接近的独到之处。戈姆佩尔兹试图把诸如因果关系，客体等一切思想范畴一起归于人的机体对外界的感觉和情感反映。维也纳性学家奥托·韦伊宁格对他的影响。^③

我们注意到，当代最有影响的德国哲学家，现象学派的

① 见齐美尔的《特殊的规律》（罗戈斯通讯社，1914年），该文作为一个章节收入齐美尔的最后一本专著《生活直观》（“Lebensanschauung”1909年）。关于齐美尔，斯维亚洛夫教授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撰写了一篇短文，作为齐美尔《现代文化的冲突》一书的序（彼得格勒，《基础知识》1923年）。

② 见詹姆士的哲学著作《实用主义》（“Прагматизм”（俄译本，“普拉”出版社）。该书是这一流派的主要著作。（原注）

③ 戈姆佩尔兹的主要著作“Auschauungslehre”有俄译本：《直观理论》“普拉”出版社。关于韦伊宁格对他的影响参见《直观理论》172页—175页。（原注）

主要代表马克斯·舍勒尔也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发表了同样的见解。舍勒尔一边反对心理论、简单生物论，宣扬客观主义，一边又深深怀疑意识及其形式，采用认识的直觉方法。舍勒尔在这方面和柏格森接近。他由生物体对外界的适应形式推出一切正确的经验科学。①

著名生物学家、新活力论者、实验形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任的哲学教授汉斯·杜里舒在其著作中最彻底地表现出，要竭力使哲学服从于部门科学的任务和方法。他的体系的基本概念是“**隐德来希**”（亚里斯多德所用的术语。逐字译出的意义是指：“实现一种内在目的的活动。”）。“**隐德来希**”仿佛是有机体一致和达到目的的基本要素。它制约着机体的一切行为，无论是低级的动物作用，还是高级的文化活动。②

① 从M·舍勒尔的著作中，我们列举两本为例，如《现象学和同情感理论》（*Phe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Sympathiegefühle*），哈勒，1913年），“**论人的永恒**”（“Vom Ewigen im Menschen”1920年）。除了巴姆梅尔的文章《马克斯·舍勒尔，天主教和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7—8页，1926年）以外，没有关于舍勒尔的俄文论著。我们在准备出版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一书中为舍勒尔专门写了一章。在列举的第一本书中，舍勒尔花了不少笔墨来分析和评价弗·洛伊德主义。（原注）

② 杜里舒的代表作：《机体哲学》（“*Philosophie des Organischen*”）1909年，2卷本版，做过重要修改的一卷本出版于1921年；《秩序论》（“*Ordnungssiehre*”1926）和《实在论》（“*Wirklichkeitslehre*”1924）。俄文版的杜里舒著作有《活力论及其历史和体系》（莫斯科，1915年）。评论他的俄语论文，参见尼·伊·卡纳耶夫的《当代新活力论》，《人与自然》杂志，1926年，1—2期。（国家出版社书籍发行联合公司列宁格勒分公司）。（原注）

最后，我们还得提提轰动一时，但已几乎被遗忘的斯宾格勒。他试图用生物学范畴来理解历史过程。①

这样，我们发现，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决不是孤立的。它附和着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切基本精神。当代哲学的整个体系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特殊恐惧。它力图不顾整个历史和社会去开辟另外的世界，并且就在有机体的深处挖掘到了这一世界。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瓦解和衰落的征兆。

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是时髦的生物论的极端。它把当代反历史主义的各种因素都集中到了一个浓缩的方面。

4.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代哲学的基本命题呢？是否有根据来设想从人体的生物学原因直接推导出整个文化创作呢？

抽象的生物个性，当代思想意识之基础的生物个体其实并不存在。因而社会之外的人，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外的人就根本没有。这是一种歪曲的抽象。人的个性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只能处于阶级之中。他是历史现实和文化生产的一部分。若要成为历史的人，仅仅生理上的出生是不够的。动物只有生理上的出生，但它不是历史的。这就需要第二种出生，即社会出生。人的出生不是表明诞生了一个抽象的生物体，而是说明降生了一个地主或农民，资产者或无产者，还表示生于1800年还是1900年。因为只有这种社会和历史对人的制约才使人成为现实的人，决定着人的生活和

① 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两卷本版，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有俄译本：《因果与命运》（科学院，1926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斯宾格勒的论著有：杰博林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论文集）。论文《欧洲的毁灭或者帝国主义的胜利》（国家出版社，1926年）。（原注）

文化创作的内容。任何回避这第二种的社会出生的企图以及由机体生存的生物学前提演绎出的一切东西都是不可信的，并且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无论一个人的每一举动，无论一种具体思想意识的形成（想法、艺术形象，甚至梦幻内容）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来阐释和理解。甚至即使生物学的专门问题，如不充分考虑被研究人体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得彻底解决。显然，“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① 马克思。引自《费尔巴哈论纲第六》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译，“红色处女地”出版社，莫斯科，1923，第89页。（原注）

第二章

当代心理学的两种流派

- 1 问题的提出
- 2 实验心理学
- 3 客观心理学
- 4 语言反应
- 5 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
- 6 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问题
- 7 科学与阶级

1. 我们已经熟悉了精神分析的基本核心，并且明确了它和欧洲当代其它思想流派的渊源关系。这一核心始终贯穿着整个精神分析体系。当然，在其独特的文化哲学方面，思想倾向更加一目了然。但是，即使就心理学而言，在该体系的专业学科材料中，我们也能够发现这种基本的核心。它作为一种决定因素制约着弗洛伊德主义者关于人的精神生活及其内驱力的一切概念。

然而，却流行着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①尽管精神分析

① 贝科夫斯基、扎尔金德、弗里德曼、卢尔恩等人的观点。参见最后一章对马克思主义为弗洛伊德主义辩护说的批判分析。（原注）

的基本思想核心是异端邪说，但精神分析仍具有健康和宝贵的科学因素：这就是它的心理学理论。该观点的维护者认为，弗洛伊德的专业心理学学说完全受另一种哲学观的支配。它最恰当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心理学提出的要求。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阐释精神分析之前，必须引导读者了解当代心理学基本流派的状况，以及马克思主义观点可能对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提出哪些要求。目前，在西欧和我们苏联，在研究人和动物的心理活动方面，展开了一场两种派别的激烈论战，即**客观心理学**和**主观心理学**的论战。

它们中的每一流派自身又分成了许多分支。下面我们仅谈谈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可是，至于它们的区别和特点我们将不涉及。我们注重的只是客观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观点间的最根本的区别。

主观心理学在当代最重要的变种是**实验心理学**（冯特①、詹姆士等人的学派；我国这一学派的魁首是切尔巴诺夫教授②）。而客观心理学的变种是**反射学**（巴甫洛夫③、别赫捷列夫④等人的学派），也称之为“关于行为反应的科学”

① 冯特·威廉·马克斯（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实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代表作有《生理心理学原理》等。（译者注）

② 盖奥尔克·伊凡诺维奇·切尔巴诺夫（1862——1936）俄国心理学家、哲学家。（译者注）

③ 参见：И·П·巴甫洛夫院士：《动物高级神经活动客观研究的二十五年经验》，1926年版，关于多数大脑半球研究的讲稿，1927年版。（原注）

④ 参见：Б·М·别赫捷列夫：《人的反射学的一般基础》（彼得格勒，1923），1926，第三版。（原注）

(行为主义)。它在美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华生①、帕迈里②、杜威等)。在苏联，布隆斯基、科尔尼洛夫从事着类似行为主义方面的研究(反应学)。③

主客观心理学间的本质区别何在？

人对心理活动的认识有两种：

1) 人在自身、在内部经验中直接观察到不同内心感受的流动，即表象、情感和愿望。

2) 人从其他人和动物身上仅仅只能够观察到，另一客体受刺激而产生的各种反应的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当然，在外部经验中，没有任何愿望、任何情感、任何意动。因为，它们无论如何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而存在着的只是产生在反应(也就是刺激反应)体中的一定的物质过程。显然，这一心理活动的外在物体语言，人在自身也能观察到。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科学的心理学应该依据哪种经验：内部的，即主观的；~~还是外部的，即客观的~~或许是这一和那一经验资料的某种综合？

书 纸

2. 应当说，把纯主观经验作为心理学的★基础，未掺杂任何外部经验，真正持这一观点的人，目前已不存在。主观心理学的现代翻版的代表们下了这样的结论：作为心理学

① J·B·华生：《行为主义者眼光中的心理学》(伦敦，1919)，有俄文版，国家出版社，1926。(原注)

② M·帕迈里：《人类行为科学》(纽约，1921)。(原注)

③ 科尔尼洛夫：《关于人的反应学说》(莫斯科，1921)第二版，(国家出版社，1927)以及《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的心理学教科书》(莫斯科，1926)。(原注)

的基本原则，也许只能说，直接观察内心活动，即自我观察是合适的。然而，它的资料应该由外部观察来充实和检查。这就是实验心理学的目的，即在一定的，正是由实验者创造的外部条件之中来控制心理现象（感觉）。

同时，这种心理学的实验内容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两部分：

1) 实验的第一部分，指作为研究对象的感觉，它产生所需要的一切外部物理环境，即设备，刺激物。因刺激而出现的身体外部的表现和试验对象的反应属于实验者外部客观经验的范围。实验的整个这一部分都服从于利用专门仪器进行精密的自然科学的检定、分析和测算的方法。

2) 实验的第二部分，指心理感觉本身。它不属于实验者的外部经验，而且原则上超出了任何外部经验的范围。这部分只是试验对象本身的内部经验。它向实验者提供自我观察的结果。实验者已经把试验对象的这些直接的内部资料和自己的外部客观经验资料加以联系。

显然，整个实验的重心在于第二部分，即它的主观部分，也就是说在于试验对象；实验设备正是为了它而安排的。其实，这一内部感觉也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所以，实验心理学最关键的词是自我观察。这一流派的代表者们引以为自豪的其它一切，一切精密的测算仪器，只是自我观察的外部形式，只是主观内心图画的客观科学框架，不会有更多的内容。

3.这就必然会出现一个问题：试验对象的“内部感觉”不是破坏了实验者的外部经验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吗？某些和外部经验资料不相连的东西，某些原则上不属于客观分析和

测算的东西，不是加入了这一内部观点吗？（要知道，正是用内部观点，研究对象阐明了自己的感觉。）

客观心理学的代表者们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断言，如这样运用主观主义者推崇的自我观察方法，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客观科学。在建立科学的心理学时，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外部客观经验的观点。若引进自我观察的资料，就会破坏客观经验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显然，一切在生活和实验中具有某种意义的东西，应该是外部物质的因素，应该在某种纯物质的变化中来表现。①

这类纯物质因素是生物体对刺激的不同反应。这种反应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人或动物的行为。

动物体的这种行为完全属于外部的客观经验。而在外部的客观经验中，一切都能被注意和测算到，都能被推导出和外部刺激以及周围物质环境条件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有这种人和动物的物质表现行为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这种心理学研究才是准确和客观的。客观主义者的主张就是这样。

心理学的实验（即使是客观主义者，当然也应该运用实验）应该限于外部世界，并且它的一切方面应该使实验者容易了解。但有一点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即把内部和外部观察的资料放在同一个物质经验的水平面上。而主观心理学正是这样做的：两种资料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形成（也就是说同一种现象将出现两次），这将产生混乱，外部物质经验的严整

① 为了准确，必须指出，行为主义者在否定把自我观察作为一种研究的科学方法的同时，毕竟还承认，在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现代条件下，自我观察在某些方面还可以当作一种我们直接运用的观察方法加以运用。（参见：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第38页。）（编者注）

和一致将遭到动摇。试验对象的“内心感觉”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外部经验语言。只有在这种形式下，它才能被实验者观察到。

4. 试验对象的语言和外部经验中的内心感觉相一致，在语言的帮助下，试验对象能表达这一感觉。感觉的这种表现称之为语言或口头反应（或者用行为主义术语说，“语言报告法”）。

口头反应是高层次的复杂现象。它包括下面几个成分（也就是组成部分）：

- 1) 口头语言产生的物理现象。
- 2) 神经系统、发音和接受器官中的生理过程。
- 3) 对应于语言“意义”，并从另一（或另一些）方面来“理解”这一意义的各种现象和过程的特殊组织。这个组织不属于纯生理的阐释。因为，构成它的各种现象越过了封闭的生理机体的界限，并且以一些机体的相互影响为前提。所以，语言反应的这一第三组成部分具有社会学的特征。各种语言意义的形成要求在个人间的长期而又有规律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确定视觉、运动、听觉反应间的联系。可是，即使这一组织，也完全是客观的。因为，无疑所有这些构成语言联系的途径和过程都属于外部经验，并原则上接近客观方法，尽管不是纯生理学意义的方法。

即使在试验对象一点也没把自己感觉说出来，而是“默默地”体验着的时候，口头反应的复杂器官也在一些基本方面运动着：因为它意识到感觉，那么它就会产生出内心的（“内隐的”）语言过程（这是由于我们又思索、又感

觉、又想借助于语言：如没有内心语言，我们自身什么也不能意识到），这一过程和外在语言一样，是客观存在的。①

因此，倘若我们进行心理学实验时，用口头的等价物（内在和外在的语言，或仅仅是内在的语言）去替换“内心感觉”，那么我们就能够保持外部物质经验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客观主义者正是这样理解心理学实验的。

5. 这就是当代心理学的两个流派。

在这两个流派中，哪一个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呢？显然是第二个，即客观心理学流派。因为，只有它才符合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决不否定主观心理现象的存在。无疑，主观心理现象是存在着的。然而，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和机体行为的客观物质基础相分离。心理现象只是有机体的特性之一。所以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解释现象和物质相对立。相反，必须完全以外部物质经验为基础，说明，在哪一类有机物和哪一个复杂性层次中，物质会出现这一新的特性——心理现象。这只是物质的一种新特性。内心主观经验根本不能解释这一点。在这方面，客观心理学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给心理学提出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这一要求远非是客观主义者常常意识到并加以完成的，即人的心理学应该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

① 《论语言的反应》，参见：华生：《心理学》第六章，J·C·维戈茨基的论文《意识作为行为心理学问题》（科尔尼洛夫教授主编的论文集《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5年，第176页）。（原注）

确实，若不注意**客观社会学**的观点，怎能理解人的行为呢？一切基本的、人的生活中存在的行为都是由社会环境条件中的社会刺激物所引起的。如果我们知道的只是刺激物的物理成分，只是反应的、抽象的生理学成分，我们对人的行为还了解得很肤浅。

例如，语言反应在人的行为活动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因为内心语言总是伴随着人的每一个有意识的行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语言反应不属于纯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人类组织的特殊的**社会现象**。

语言反应只能形成于社会环境的条件之中。口头联系的复杂构造形成和实现于各生物体间长期而有规律的、多方面的社会交际的过程之中。显然，没有客观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就无法解释。

总之，心理学应该运用**客观方法**，在自然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研究**人的实际表现行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给心理学提出的要求。

6. 在当代心理学流派的斗争中，精神分析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

弗洛伊德本人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建立真正客观的自然主义心理学的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尝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俄国心理学和哲学文献中，出现了一些论著。它们企图证明，精神分析在专业研究方面是正确的。所以，在此基础之上（当然，包括各种变化和补充），它更多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向心理学提出的要求。①另一些客观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则对精神分析持

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和客观唯物主义的观点格格不入^②

这一问题有趣而又非常重要。

客观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它对自己观点和方法的最好解释在于深入批判和反对其它流派的过程之中（当然，至于它对行为具体材料的直接研究，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促使它在方法论方面坚定和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立场。

客观心理学一直受到一种严重的威胁，即堕入**素朴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危险。这一危险在研究无机自然界的自然知识方面，早就不那么严重了，而它在生物学方面却已更加严重。在心理学中，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能够起到直接破坏的作用。这种简单的唯物主义倾向和与此相连的客观心理学任务的特别简单化，我们在美国的行为主义者(b*ehaviourist*)^③和俄国的反射学学者那里能够发现。

① A·Б·孔尔金德：《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概观）；同名文译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1924年，第4期。另见他的《有机体的生命和暗示》（国家出版社，1927年）第7、8、9三章。
B·贝霍夫斯基：《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3年，第12期。）B·Д·劳里德曼：《弗洛伊德的基本心理学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尔尼洛夫主编，《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A·Р·卢里亚：《精神分析作为一元论的心理学体系》（出处同上）。（原注）

② B·尤里涅茨：《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4年，第8—9期，以及我们的一篇论文《在社会的那一方面》，《星》杂志，列宁格勒，1925年，第5期。）（原注）

③ 指人的行为科学的代表者。（原注）

这样，当客观心理学面临着对精神分析提出的一切复杂和特别重要的问题必须表明批判立场的时候，明显地表露出以简单化的生物学态度去看待人的行为的缺陷和拙劣。因此，在心理学中运用辩证法和社会学的观点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问题在于，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批判分析，把我们繁繁地引向了语言反应的问题以及它在整个个人的行为活动中的意义。这是人的心理学的一个最重要和最难解的问题。

我们看到，精神分析向我们解释的一切精神现象和冲突，都是人的语言和非语言反应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冲突。

我们知道，即使在人的行为的语言（口语）之中，也存在着内部和外部语言之间的强烈冲突。我们清楚，在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性的方面），语言联系形成得特别困难而又缓慢（也就是说，语言反应的形成必须经过个人之间交际的过程，从而达到确定视觉和运动，以及其它反应间的联系）。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

弗洛伊德的力量在于，他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收集了研究材料。他的弱点在于，他不理解这一切现象的社会本质，并力图钻进个别有机体及其心理的狭小圈子。

他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些实际的社会过程。

由于如此忽视社会学，弗洛伊德学说还存在着另一个弊病，即其方法的主观性。显然，这种主观性已加以了掩饰（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会引起争议）。弗洛伊德并没有自始

① 其实，弗洛伊德本人就知道“无意识的”即“非语言的”这一意义。

至终地坚持外部客观经验的观点，并从内部来阐释人的行为冲突，即用自我观察的方法（但是，我们再次强调，它已加上了一些修饰过的形式）。因此，就象我们让读者确信的那样，他注意的那些事实和现象的解释（说明）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在批判地评价弗洛伊德主义之际，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它和第一个语言反应问题紧密地联系着。它涉及“心理的内容”：思想、愿望、梦幻等内容。^①这一心理内容完全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从模糊思想和不清楚、不定型的愿望，到哲学体系和复杂的政治构想，我们看到一个连续着的思想意识现象系列，从而也是社会学的现象系列。无论这一系列从头至尾的哪一个部分，都不只是个别有机体创造的产物。不管是模糊的思想，如果说出来的，还是复杂的哲学活动，都同样是以个体间的社会交际为前提的（固然，这一交际的社会性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层次）。然而，弗洛伊德却认为，这从头至尾的一系列思想意识现象都来源于个别心理的最简单因素，仿佛处于社会的真空里。

当然，在这里，我们只先指出心理学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但是我们强调，读者在阅读下面精神分析的阐释时，应该时刻注意这两点。

7. 现在，在本章的结尾处，我们还应该谈谈本章开头稍稍提过的一个问题。

从我们前面的初步意见中，读者已经能看出，弗洛伊德在心理学的专业学科方面决不是以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一般思

^① 严格地说，这是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借助于内心语言来认识心理内容。（原注）

想意识的阶级观点。这和其在基本哲学核心方面所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观点是一致的。

至于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许多人认为，专门科学问题能够，而且应该完全脱离一般的世界观。在当代争论之中，就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来说，不少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世界观和社会倾向的问题之中，专门科学是高度中立的（所以，心理学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专门科学的这种中立是彻底虚假的。因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社会学内容上来看，这种中立都是不可能的。

确实，只有当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某种科学理论认识清楚时，我们才会看不到它和世界观基本问题的必然联系。只要我们执着地思索，这种理论就一定会向我们表明其一般的哲学倾向。

例如，主观心理学的任何流派，无论其怎样发展，在方法论上都必然会或许倒向二元论，也就是把存在分为两个互不相连的方面，即物质和精神；或许倒向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来自感觉内部的”那个显然根本无害的部分，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实验室里破坏了实验心理学派的客观存在的一致性。而它却能够出色地成为阿基米德完整地解释世界的客观物质图画的出发点。

在社会学方面，科学的中立也不可能存在。要知道，即使人的思想中的最无可非议的主观真诚性也不能令人相信。阶级利益和偏见是一个客观社会学的范畴。它远非是个体的心理所总能意识到的。然而，正是在这一阶级利益中包含着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思想的力量。很清楚，如果思想是

有力、可信而又有意义的，那么，显然，它能够触及到一定社会组织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能够在阶级斗争中把自己和这一组织的基本立场联系起来，哪怕这种思想的创立者本身完全没有意识到。思想家的影响和活动力量与他们的阶级基础，**他们受到一定组织的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的大小，直接成正比关系。**我们记得，语言反应纯粹是社会的产物。这种反应的一切根本的、**不变的（牢固的）因素正是阶级因素，而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

人的思想从来都不只是反映，他力图了解客体的存在，而且同时反映认识主体的存在，反映主体的具体的社会存在。思想是一个双面镜。它的两面能够，而且应该明亮而不模糊。我们力图理解弗洛伊德思想的两面。

现在，无论是主要的哲学，还是主要的心理学的当代流派，我们都已经相当清楚了。我们又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的准则。所以，我们现在手中就有了一个指南针。我们借助于它，就能够步入精神分析的迷宫了。

第二篇

弗洛伊德主义阐释

第三章

无意识和心理活动

- 1 意识和无意识**
- 2 弗洛伊德主义发展的三个时期**
- 3 无意识的最初概念**
- 4 净化法**
- 5 第二阶段的特点**
- 6 压抑说**

1.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分为三个部分：意识、无意识和前意识。这三部分或者心理现象体系处于不停的相互影响状态。而前两部分又处在彼此激烈的斗争之中。人的心理生活就是由这一影响和这种斗争所构成。应该把每一种精神活动和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看作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冲突、斗争的结果，看作是这样一种标志，即在生活的某一瞬间，这些不停斗争着的各方所达到的力量对比关系的一种标志。

如果我们只听到，意识向我们述说我们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弄清这一生活。因为，在同无意识的不停斗争中，意识总是有片面性的。无论是整个心理生活，还是意识自身，意识向我们提供的都是些十分虚假的资料。

然而，心理学却总以意识提供的资料为基础，来确立自己的原理。而且大部分心理学家简单地把心理现象和意识现象相混淆。只有少部分人注意到了无意识，如利普斯^①或者沙可^②及其流派。但他们又根本没有充分肯定它在心理中的作用。他们把无意识作为精神生活的永恒不变的现成附属品而提出来。他们对它和意识斗争的不息活动却视而不见。根据弗洛伊德的意见，由于心理现象和意识的这一混淆，旧心理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全虚假的精神生活图画。因为心理现象的主要部分和其动力中心正是在于无意识部分。

弗洛伊德主义的“情欲”^③揭示了整整一个世界。它在文化和历史的对立面上发现了新大陆。然而，同时它对于我们又很熟悉。它随时准备冲破意识表层，它反映在我们的语言、任何偶然失言、手势和行为之中。

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特点是，无意识现象的这一可触性，而深入这类生活的最实际现象和日常普通现象又那么容易。它不同于诸如叔本华，特别是爱德华·哈特曼^④这类文体高雅的“无意识哲学家”的学说。

2.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这一概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和几次质变的过程。

① 利普斯（1851—1914）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美学家。（译者注）

② 沙可·让·马丁（1825—1893）法国神经病理学家。（译者注）

③ 指弗洛伊德主义的无意识的主要内涵，即被压抑的情欲。“ПаFос”一词来自希腊文。（译者注）

④ 爱德华·哈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我们把它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时期（一般称为弗洛伊德—布洛伊尔时期），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接近于著名法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沙可、李厄保^①、伯恩海姆^②、让内^③的学说，它和他们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弗洛伊德求学于沙可和伯恩海姆）。

第一时期的大概年限是1890至1897年。这一时期主要和唯一的著作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并发表于1895年的《Studien über Hysterie》（癔病研究）。

第二时期是精神分析发展最漫长、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学说的一切基本和突出的特征在这一时期确立。这时，它已不落窠臼，独树一帜。各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在这一时期进行，特别是理论和应用心理学方面。弗洛伊德还回避了广泛的哲学概括，回避了世界观问题。整个体系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特征。^④弗洛伊德论著的风格冷静而又枯燥。这一时期大概的年限是1897至1914年。这一时期出

① 李厄保（1823—1904）法国精神病学家。（译者注）

② 伯恩海姆（1837—1919）法国精神病学家。（译者注）

③ 让内（1857—1947）法国心理学家。（译者注）

④ 弗洛伊德一直到现在（1926年）还继续坚持并实现了其学说的严格的经验主义特点。用他的话说，精神分析不是一个哲学体系。它不从个别严格的确定前提出发，力图借助于它们来把握世界的整体性，一劳永逸，而不留给新的探索和深邃观察以更多的空隙，它从不狂妄，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理论（Handwörterbuch，袖珍字典，第616页）。

（编者注）

版了弗洛伊德的所有主要的精神分析著作。^①

在第三时期，无意识体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尤其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和继承者的研究方面），并且开始和叔本华、哈特曼的空洞学说相接近。世界观的一般问题开始压倒具体的专门问题。无意识开始既反映人身上一切最低级的东西，也反映其一切最高级的东西（主要指弗洛伊德主义的瑞士学派的代表者们）。出现了“自我理想”理论（Ich-Ideal）。

如何解释弗洛伊德理论最本质方面的这些变化呢？这多少来自叔本华和哈特曼的直接影响（还有尼采）。这时弗洛伊德着手仔细地研究他们（在第一和几乎整个第二时期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作为彻底的实证主义者，不承认哲学）。^②这还多少说明追随弗洛伊德的新继承者们的有力影响。他们从一开始就用哲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来全面研究精神分析问题，并赋予这一研究以新的色调（特别是奥托·朗克和费伦齐）。然而，也许，在这种转变中起最大作用的是着迷的同时代人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反响。在这一时期之前，弗洛伊德已成为最广泛的知识界所公认的“思想领袖”。但是，这一广泛的知识界却已在力图从弗洛伊德过去的著作中探求那些恰恰属于哲学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他们期待着，并且要求精

① “Traumdeutung”（《梦的解析》）1900年，有俄译本（1911年），“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俄译本，1925年，“Der Witz”（《俏皮话》），俄译本，1925年，“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性欲理论三讲》），俄译本，国家出版社（年代未注），最后，主要的三卷“Kleine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神经病学短文集》）和一系列其它较不重要的论著。（原注）

② 参见本书32页注④。

神分析在世界观方面“开诚布公”。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渐渐地屈从于这一要求和期待。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出现了：成就和推崇把在蔑视和敌意气氛中成熟和突起的学说引向了顺应环境和蜕化变质。

这一最后时期，即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的界限大致是1914至1915年左右。^①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是弗洛伊德的两部晚期作品：“Jenseits des Lustprincips”（快感原则的彼岸）和“Das Ich und das Es”（自我和伊底）。^②然而，用更鲜明的文字论述来表现精神分析这一时期的，并不是弗洛伊德，而是他的得意门生奥托·朗克，是他在三年前出版的那本轰动一时的论著《生之创伤》。^③这是最近主宰着精神分析的新精神的最突出表现。论著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哲学书。全书是用一位聪明人的语调和风格来写成的。他说着“庄严而恐怖的话语”。书在许多方面象一本拙劣的模仿之作，模仿处于迷恋叔本华时期的尼采。^④结论极其惊人。在精神分析的第二时期，即经典时期，在冷静而枯燥的气氛中，这类书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这就是精神分析发展的三个时期。必须时刻注意它们的区别和特点。为了体系的逻辑一致性，不应该忽视它们。在

^① 弗洛伊德后期特征的最初旋律开始出现在下列论著中：“Einführung des Narcismus”和“Trauer und Melancholie”（《恋己癖浅论》，《悲伤忧郁病》）。（原注）

^② 该书有俄译本。科学院，1924年。（原注）

^③ “Trauma der Geburt”《生之创伤》，1924年。（原注）

^④ 指尼采的论著《悲剧的诞生》。朗克把这部书里的卷首提词引进了自己的著作。（原注）

三十三年的历史过程中，精神分析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在，它已经不是1914年战前的那个样子了。

3. 究竟什么是“无意识”呢？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初期，它的概念又是怎样的呢？

早在1889年，在南锡，弗洛伊德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维也纳医生。著名的催眠术专家伯恩海姆的经验使他感到惊讶：

被催眠的女患者得到指示：醒来之后，过一段时间打开放在房间角落里的那把伞。从催眠状态醒来以后，女患者在指定的时间准确地完成了这一指示。她走到角落，打开了房里的伞。在回答自己行为动机时，她说，她似乎想确认，这把伞是不是她的。这一动机和行为的实际原因完全不一致。显然，这是在行为之后想出来的。然而，他却非常满意患者的意识：她执意相信，打开伞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她所有的目的是，要确认伞是否是她的。随后，伯恩海姆经过再三提问和引导她的思想，终于使病人回忆起真正的行为动机，即她在催眠时获得的指示。①

从这一实验中，弗洛伊德得出了三条一般的结论。这些结论确立了他早期的无意识概念。

- 1) 意识的动机，无论其主观上怎样执意，并非总是和行为的动因相一致。
- 2) 行为有时可以受制于活跃在心理之中，但却不能意识到的力量。
- 3) 这些心理力量借助于一定的方法才能够被意识到。

① 关于这一点，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史论》（《神经病学短篇论文集》，第四辑）。（原注）

这三条又经受了精神病学自身的实践检验。以此为基础，弗洛伊德和他的老同事布洛伊尔医生一起提出了新的方法，名为，治疗癫痫的净化方法。^①

4. 这一方法的实质在于：歇斯底里和某些其它精神性（由于精神，而不是器官刺激所引起的）神经病的根源是患者不能意识到的精神构造物。这是患者曾感觉过，而故意忘却的某些精神刺激、感情或欲望。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他的意识或者害怕，或者羞于记起它们。这些被忘却的感觉没有进入意识，因此就不能够得到正常的解脱和反应（渲泄）。它们导致了歇斯底里病症。医生应该召回这些感觉的记忆缺失（遗忘部分），使它们进入患者的意识，编织成这一意识的一个共同体。这样，给它们以自由渲泄和自我解脱的机会。用这种解脱方法，歇斯底里病症就不再存在了。

例如，某位姑娘依恋着一位亲人。但用她的眼光看，这种情欲是无法实现的，是粗野和反常的。以至于她甚至连自己都不能承认这一感情。所以她不能使它受到清醒而又有意识的谴责，哪怕是一个人独自的时候。这种她自己都不承认的感觉在她心中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它不能和其它感觉、思想和想象相联系。恐惧、羞愧、愤怒促使这一感觉要作痛苦的精神渲泄。这种被隔绝的感觉不可能找到渲泄的突破口。因为，渲泄正常的出口是一定的活动、动作或者哪怕是

① 关于这一切，参见弗洛伊德医生和布洛伊尔医生的《癫痫研究》，1895年，第1版（1922年，第4版）；或者参见弗洛伊德，《性学手册》第610页。（原注）

语言和意识的理智活动。这些宣泄口都封闭着。遭到各方挤压的（用弗洛伊德的话说，eingeklemmt受压抑的）、被隔绝的感觉，开始用非正常的、不能被意识察觉的方法来寻找出口：用体内任何健康因素的沉默，用无缘无故的恐惧动作，用某种无意义的活动等等。歇斯底里病症就形成于这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任务就是，了解患者这种故意遗忘并不肯承认的病因，迫使她回忆起病因。为了这一点，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利用了催眠术（全部或者局部）。医生在知道了病因之后，应该帮助患者克服恐惧和羞愧，承认被遗忘的感觉，不再把它“隐藏在歇斯底里的病症之中，并且让它进入意识的‘正常生活’”。这里，或者用同这一感觉的有意识斗争的方法，或者有时用合理让步的方法，医生给这一感觉以正常宣泄的机会。也许，我们的这位姑娘不得不忍受着沉重的生活痛苦和不快。然而，无论如何，这种痛苦已不是病症了。歇斯底里病症已不再要紧，并在渐渐减退。

弗洛伊德借助于亚里斯多德的一个术语，把用有意识的宣泄方法来抛弃恐惧和羞愧的这种解脱，称为“卡塔西斯”，即净化法。根据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悲剧使观众的心灵由于恐惧和怜悯的情绪冲动而达到净化。它迫使观众消极地去体验这些感情。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正是从这里取得了方法的名称，即卡塔西斯（净化）。⑩

称之为歇斯底里病症的这些被遗忘感觉就是“无意识”。弗洛伊德在其学说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理解它的。

“无意识”可以被确定为是潜藏在心理中的某种异物。它和意识的其它部分并没有被固定的联想线索联系着。所以它被

⑩ 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癔症讲习》第一14页。（原注）

坏了意识的整体性。在精神生活中，幻想接近于它。幻想也比现实生活感受更自由，把摆脱了联系着我们意识的密切的联想关系。催眠状态也接近于它。因此，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把“无意识现象”称为——催眠现象。^①

这就是早期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

我们指出并且强调它的两个特点。第一，弗洛伊德没给我们提供无意识的任何生理学理论，甚至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和布洛伊尔恰恰相反。布洛伊尔提出了自己方法的生理学基础。^②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故意不谈生理学。第二无意识的产物，我们只有在将感觉译成语言时才能把握到它。直接通过患者本人来处理无意识的其它方法并没有，也不可能有。

我们还要向读者指出，净化方法赋予语言反应以很大的意义。弗洛伊德本人就指出了自己理论的这种特征：他把自己治疗歇斯底里的方法和天主教的忏悔相比较。在忏悔时，教徒确实感到轻松和净化。因为他向外人，当时向神甫公开了，他自认为是罪孽的那些行为和思想，公开了他在其它场合决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东西。这样，他使压抑和封闭在他心理之中，并让其心理感到沉重的东西得以语言反应和语言宣泄。语言的净化力量就在于此。^③

① 同上注，第188页以后。（原注）

② 同上注，第161页以后。（原注）

③ 应该同时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在精神病学者实验中已不再用催眠术来达到净化的目的，而换用了自由联想法。医生事先使患者有思想准备，用启示的问题和长时间的观察，来探寻到被驱逐进无意识的“羞愧或恐惧”的感觉，并使它们进入意识，给它以自然的宣泄。

5. 现在，我们应该转入论述在精神分析的第二时期，即经典时期，无意识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它在许多新的最本质方面得到了丰富。

在第一时期，无意识表现为人心理中的相当偶然的现象：这是一种心病，是在任何偶然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下，渗入歇斯底里患者心中的某种异物。正常的心理机制在第一时期是一个完全静止、不变的东西。各种心理力量的斗争根本不是一种常见的，有规律的形式，却是非常特殊和不正常的精神生活现象。其次，无意识内容在这一时期完全未被解释清楚，并且也被看作是一种偶然的东西。由于人的各自特点及其生活的巧合环境，这种或那种的痛苦或羞愧的感觉被隔绝、被遗忘，而且成为无意识现象。弗洛伊德并没有把这些感觉按任何类型加以概括，性因素的特殊意义还未被提出来。这就是第一时期的概况。

在第二时期，无意识已成为任何人的心灵机制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心理机制本身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处于不停运动的状态之中。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被阐释为一种经常的，有规律的心理活动形式。无意识成为文化创作的一切方面，特别是艺术方面的心理动力和能量产生的源泉。

依照弗洛伊德这些新观点，无意识的形成过程是具有必然性的。从人的诞生之日起，它就在人的整个生活过程中逐渐实现。这一过程称之为“压抑”（Verdrängung）。压抑是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概念之一。

以后，无意识内容被加以类型划分。这已不是些偶尔、零散的感觉，而是某些类型的感觉，是基本上对所有人都一

样的，具有一定特性的，主要是性欲的感觉凝聚体（综合体）。

这些综合体（感觉凝聚体）在每个人的生活历程中重复着，在特定的阶段上，被排挤进无意识。

在本章里，我们将要了解压抑的基本心理“机制”和与其紧密联系着的“检查作用”概念。无意识内容，我们在下一章里涉及。

6. 在人格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心理不知道可能与不可能、有利与有害、允许与不允许的区别。它只具有一个原则，即“唯乐原则”（Lustprincip）。^①在人的内心发展的初期，心中自由而随意地产生着感情和欲望。这些感情和欲望在以后的发展时期中会以犯罪感和卑鄙感引起意识的恐慌。在儿童心中，“一切都是允许的”。对他的心灵来说，不存在不道德的欲望和情感。它不知道任何羞愧与任何恐惧。它广泛地利用这一特权来大量积累最不道德的形象、感情和欲望。当然，这种不道德是用以后发展的眼光来看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幻觉满足欲望的能力附着唯乐原则的这种不容分说的霸权。因为，幼儿还不知道现实和非现实的区别。任何想象对于他来说已经是现实。这种幻觉满足通过梦伴随着人的一生。^②

在精神发展的下几个阶段，唯乐原则在心理中失去了特

① 弗洛伊德：《论心理现象的两个原则》（《神经病学短篇论文集》，第3版），第271页。（原注）

②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388—391页，第403—405页。（原注）

殊的统治地位。因为和它一起出现的“现实原则”开始无视它，而成为经常活动着的心理生活的新原则。一切心理感觉现在都应该从这两个原则中的每一个出发，体验到双重感受。显然，欲望常常不可能得到满足，所以导致了焦虑。或者，在满足的时候，它会给自己招来不快的后果。因为，这些欲望本该受到压抑。某种表象能够密切地联系着恐惧感或痛苦的记忆。因为，这些表象本不该出现在心中。

这样，就出现了心理选择。只有从两种原则观点出发，体验双重感受的心理部分，似乎才是合法的，能获得充分的权利并进入心理活动的最高领域——意识，或者才有可能进入它，也就是说，成为前意识，那些没有体验的部分就成了非法的，被压挤入了无意识体系。

这一压抑活动在人的整个生活过程之中。它机械地进行着，不要意识的任何介入。意识则使自己处于充分准备好的、净化的形式之中。它不注意压抑现象，并且也许甚至完全没有一点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的内容。操纵压抑的是一股特殊的心理力量。弗洛伊德形象地称它为“检查员”。①检查员存在于无意识和意识体系之间。所有处于意识之中，或能进入意识的，都要受到严格检查。②

一切大量的经检查不准、被压抑至无意识的表象、感情和欲望，任何时候都不会消亡，不会丧失自己的力量。因为根除某种欲望或感情只能通过意识和意识操纵的活动和行

① 即检查作用，又可译为守门员。（译者注）

② 《梦的解析》第116页，439页以下；《自我和伊底》第1、2章。（原注）

为，首先要通过语言。而无意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它害怕语言。我们甚至独自用内心语言，都不能承认无意识的欲望。从而使它们没有任何出路，不能够变为行动。所以，它们总是潜藏在我们心中，却有着十分充沛、新奇的力量。①

压抑过程正是这样进行着的。

根据无意识形成的心理动态，我们现在可以把无意识现象确定为被压抑现象。这种被压抑的特性，换句话说，就是无意识的内容，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加以阐述。

① 弗洛伊德：《快感原则的彼岸》，第35—36页。《神经病学短篇论文集》第4辑：《无意识》。（原注）

第四章

无 意 识 内 容

- 1 本能理论
- 2 幼儿的性欲生活
- 3 俄狄浦斯情结
- 4 第二时期的无意识内容
- 5 第三时期的本能理论
- 6 “自我理想”

1. 我们已经知道了压抑过程。那么受压抑的材料从哪来呢？

究竟是哪些感情、欲望、表象被排挤进了无意识呢？

为了理解这一点，为了弄清无意识内容，就必须了解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Trieben）。①

心理活动的变化来自器官**内部和外部的刺激**。内部刺激有躯体的（身体的）源泉，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自己的器官之中。弗洛伊德称这些内部躯体刺激的心理代表为**本能**。

弗洛伊德按目的和躯体源泉，把一切本能分为两种：

① 《神经病学短篇论文集》第4署：《本能及其命运》，以及《自我和伊底》，第五章。（原注）

1) 性本能，其目的是延续种族，即使付出个体生命的代价。

2) 个体本能，或“自我”本能(Ich—triebe)，其目的是保存个体。

这两种本能互不相融，彼此之间常常发生各种冲突。

我们只论述性本能。因为它的主要材料部分属于无意识体系。弗洛伊德仔细研究了这种性本能。①根据某些人的意见，弗洛伊德的主要功绩就在于性理论方面。

2. 在上一章里我们谈过，幼儿在其心理生活的初期阶段，积蓄了意识以为是淫荡和不道德的大量感情和欲望。这一观点对于不熟悉弗洛伊德主义的读者来说，大概非常奇怪，也许不能相信。确实，幼儿的不道德和淫荡的欲望从何而来呢？要知道，幼儿——这是纯洁无瑕的象征！

性欲，或者按弗洛伊德的说法，里比多(Libido)（指性饥渴）是幼儿与生俱来的。它和他的躯体同时诞生，并在他的机体和心理中进行着不息的，只是有时较弱，但任何时候永不完全停息的活动。性成熟，这只是性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但这根本不是性欲的开始。②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一切皆允许”的唯乐原则还不容分说地占据着统治地位。那时，性欲表现为下列基本特征：

① 下面参见弗洛伊德“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性心理讲演录》1905，俄译本，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6年。（原注）

② 《简心理学概述》，第47—55页。（原注）

1) 生殖器(性器官)还没成为有机体的性欲中心。它们只是性欲区域之一(弗洛伊德称其为躯体的性激动部分),并且其它区域和它们进行着有力的竞争。例如,口腔(吮吸时),anus^①,或排泄粪尿时的肛门区域(肛门),皮肤,手或脚的大拇指等。^②可以说,幼儿的性欲或里比多并没有在尚未成熟的性器官中聚积起来。它分散到他的整个躯体。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性激动的躯体源泉。弗洛伊德把性的发展的第一时期称为性器前期。因为性器官(生殖器官)还未成为性欲的机体中心。必须指出,性激动在人以后的整个生活过程中,一直保存在各种性欲区域之中(口腔和肛门)。^③

2) 幼儿的性欲还不是独立的,不是毫无牵连的。因为,它密切地联系着机体的其它要求与满足过程,联系着摄食、吸奶过程,联系着小便、大便(解大手)等。它赋予这一切过程以性色调。^④

3) 在第一阶段,即“口腔”阶段,幼儿的性欲在自身获得满足,并不需要客体(另一个人)。这是幼儿自恋的缘故。^⑤

① anus一词来自英文,意为肛门。(译者注)

② 《性心理简述》,第43—45页、终页、61页。(原注)

③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幼儿的性欲发展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第一性器前期阶段是口腔阶段。这时,满足幼儿的最大利益而言,嘴起主要作用。随之是肛门阶段。最终,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生殖(性)器官占据首位。按弗洛伊德的意见,幼儿非常迅速地度过这一阶段,大约在出生后的四至五星期间。(译者注)

④ 《性心理简述》第55页、第75页—79页。(原注)

⑤ 同上,第56页—58页。

4) 因为生殖器官的主要作用（即它们在性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还不存在，所以本能的性分化还不牢固。可以说，性本能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两性同体的**（即雌雄同体）。①

5) 由于早期性欲的这些特点，幼儿表现出多方面的反常（Polymorph pervers）。他听命于受虐淫、②施虐淫、同性恋以及其它异常行为的摆布。③因为，幼儿的里比多分散在全身，并且能够和任何一个过程和机体触觉联系在一起。它从这一切中获得性满足。幼儿最迟领悟到的正是正常的性行为。弗洛伊德把成人的性行为反常，看成是正常发展的受阻现象，看成是向幼稚型（儿童）性欲的早期阶段的一种倒退。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就是幼稚型性欲的一些基本特征。

现在，显而易见，性欲及其表象和感情是一个如此巨大的蕴积物。他依凭儿童的里比多，产生于幼儿的心中。然后，它应该被无情地排挤进无意识。

我们可以说，我们心灵历史的一切早期阶段都处于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要知道，人通常在四岁以前不记事。然而，这一阶段的内容没有丧失其力量，并且常常活动在无意识之中。这一过去并未消亡，它仍保留到现在。因为它是不可能被根除的。

3. 在儿童的性欲生活中，这一受压抑历史的最重要内

① 同上，第93页—94页。

② 受虐淫指用自我折磨和痛苦来满足性欲。（原注）

③ 《注心理学概述》，第55页，第75页—79页。（原注）

容就是对母亲的性欲，以及与此联系着的对父亲的仇视。这就被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①关于这一情结及其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它的主要内容在于：按我们以上分析的幼稚型性欲的思想来看，当然，人的性欲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的母亲。从一开始，幼儿对母亲的态度就明显地表现出性欲。弗洛伊德的著名学生奥托·朗克认为，甚至胎儿位于母腹之中时，就具有了性欲的特性。特别是，从分娩活动开始（与母亲第一次和最痛苦的分离、与母亲机体联系的破坏），就出现了俄狄浦斯的悲剧。^②但是，里比多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冲向母亲，把母亲照料和关心的每一举动都性欲化了。如喂奶、洗澡、擦屁股，所有这一切，对于幼儿来说，都蒙上了性色调，同时，对各种性欲区域和生殖器官的触及，往往又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唤起了幼儿的快感，有时甚至出现第一次勃起。幼儿常常跑到母亲床边，依偎在她的身边。机体的模糊记忆把他吸引向母亲的uterus（子宫），使他希望回归这一uterus。所以，幼儿本能地渴求乱伦（近亲之间的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乱伦的欲望、感情和表象的产生就很必然了。

在这种性欲中，父亲就成了小俄狄浦斯的情敌。他激起了儿子对自己的敌意。因为父亲干涉幼儿和母亲的关系，不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196—204页。这类论著还有：荣格的“Die Bedeutung des Vaters für das Schicksal Einzelnen”，（《父亲的个人命运之意义》）、奥托·朗克：“Insest-motiv in Dichtung und Sage”（《诗与神话的动机》）、《生之创伤》（1924年）（原注）

② 奥托·朗克：《生之创伤》，（原注）

允许把他放到床上，让他独自一人，要他适应没有母亲帮助的环境，等等。因此，幼儿就滋生出杀死父亲的幼稚型欲望。只有父亲的死，才能使他独自占有母亲。因为，在幼儿发展的这一时期，在其心中，唯乐原则还占据着独裁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乱伦的，还是仇视的冲动、欲望，以及与之相连的各种感情和形象都不受任何发展的限制。①

在现实原则具备了力量的时候，当父亲的禁令之声渐渐变为自己的良心之声时，与乱伦欲望的沉痛、艰难的斗争开始了。这些欲望被排挤进了无意识。整个俄狄浦斯情结屈从于记忆缺失（遗忘）。恐惧和羞愧产生出来，取代了被压抑欲望。它们正是由于心中渴求对母亲性欲的思想所引起的。检查员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合法的（或说官方的）意识非常真诚地反对着俄狄浦斯情结的任何迹象。

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过程远非总是对幼儿无害的。它常常导致精神病症，特别是儿童的恐怖症。②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俄狄浦斯情结彻底说明了，为什么在不同民族之间都广泛流传着有关乱伦，子杀父，或相反，父杀子的神话，以及类似的传说。这还解释了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给所有人留下的强烈印象。不过，从官方意识来看，我们应该承认，俄狄浦斯的遭遇无论如何是虚构的，不是生活中的典型现象。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这部悲剧如同任何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决不是为了迎合我们的官方意识，而是为了反映整个心理，首先是无意识

① 对于幼女来说，正好是一种相反关系。（原注）

② 参见：弗洛伊德：《一个五岁男孩佛比耶的故事》（《神经病学短篇论文集》，第3编，第1页以后（原注）。

深层。①

俄狄浦斯情结，这是人的生活的第一个史前事件。按照弗洛伊德学说，它对人的生活具有巨大的、直接决定的意义。这一初恋和初恨将永远成为他生活的最不可分割的感情。较之这些感情，一切后来的，已经出现于意识之中的色情态度只表现出某种表面的，肤浅的现象，没有触及到机体和心理的最深层。朗克和费伦齐就干脆认为，一切后来的恋爱态度都只是第一次俄狄浦斯之恋的替代。而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便出现了和客体，即母亲的完全有机的结合。人的未来的 coitus（性行为）只是胎内的失去天堂的部分补偿。成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从这第一次，被压抑进无意识的方面，即俄狄浦斯情结，获取心理力量。在更后面的生活里，人（当然，自己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再三和生活的新加入者一起表演着这第一次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把被压抑的感情发泄到他们身上，然后把永恒的恋母和恋父感情移向他们。这也就形成了被称之为“移情机制”（Übertragung）的基础。

移情机制是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弗洛伊德用它来理解被压抑欲望的无意识转移，主要是性欲转移，从自己直接的对象转向另一替代者。例如，在每次用精神分析治疗时，恋母欲和恨父感常常移向医生。这样，病症就部分被根除了。这就是移情机制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的意义。移情是回避官方意识禁令的方法之一，是赋予无意识

① 这类心理学研究以精神分析为基础，力图深入人的心理活动的深层（无意识区域）。它在精神分析的文献资料中获得一个新的术语“深层心理学”（Tiefenpsychologie）。（编者注）

(哪怕部分地)以意志和表现的方法之一。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爱情生活在许多方面取决于他能把固定在母亲身上的里比多解放出来的程度。少年恋爱的第一个对象常常和母亲相象。

然而，在性欲的发展中，母亲形象会起到极其不幸的作用。因为官方意识把对母亲的爱变成了一种较高的精神之爱，也称之为敬爱。这就甚至不允许想到肉欲。乱伦的恐惧就由此而生。这种恐惧会在人的心中与任何敬意，任何精神方面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就常常导致不可能与精神上钟情和敬爱的女人进行性交往。这就使得性欲整体不幸地分裂为两股：即肉欲冲动和精神依恋。它们不统一在同一对象身上。^①

4.俄狄浦斯情结及其有关的一切构成了无意识体系的主要内容。在人的一生中，后天被压抑的心理活动在无意识中还是较少的一部分，尽管个人的文化和修养水平的提高总是不断要求新的压抑。然而，一般可以说，主要部分，也就是说，无意识的基本部分是由以性为特征的幼稚型本能所构成。在“自我”本能之中，应该提一提称之为侵略的（故意的）本能。在儿童心理之中，因为“一切皆允许”，这种侵略本能具有凶残的特性：幼儿强烈地希望自己的敌人至少要死去。这种“杀人的想法”甚至是针对最亲近的人。它们在幼儿生活的最初几年聚积得非常之多，随后，被排挤进了无意识。由于唯乐原则占统治地位，幼儿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

^① 弗洛伊德：《爱情生活心理学》（《精神病学短篇论文集》，第4辑）。

完全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对于这一利己主义，并不存在任何道德、文化的限制。在此基础上，无意识的大量材料已在形成。

这就是无意识内容的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扼要内容来表述它：只要有机体听命于唯乐原则的摆布，只要他不与现实和文化原则相联系，他所能做的一切就都属于无意识范围。这里包括，在生活的早年幼稚型时期，当现实和文化压抑还很微弱的时候，当人自由地表现出自己天生的机体的自我满足时，他公开期望和明确想象出来的（在极小程度上已完成的）一切。

我们上面涉及了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中各种基本因素的一切定义和特征：心理实现的两个原则，压抑，检查作用，本能理论，以及最后的无意识内容。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第二时期，即精神分析发展的良好时期，弗洛伊德对此进行了研究。在探讨这一时期时，我们主要立足于阐述。

然而，我们知道，在第三时期，这一学说经受了相当大的质变和补充。我们也知道，这些变化向何处发展。

我们将不仔细地涉及精神分析发展的第三时期本身所带来的一切新的内容。因为，在今天，这一时期发展的高潮正在到来。其中许多方面尚未形成，还没最后确定。弗洛伊德本人这一时期的两部代表作也存在着表述不清和许多地方不明确的缺陷。它们在这些缺陷方面不同于弗洛伊德以前的著作。他以往的论著，从清晰度、准确性和完整性上来看，可算是经典之作。因此，我们只限于扼要地分析最重要的部分。

5. 本能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本能分为性本能（延续种族）和“自我”本能（保存个体）。现在，取代它们出现了两种新的本能：

1) 性本能或性欲。

2) 死的本能。

首先，“自我”本能和自卫天性归入了性本能（性欲）。所以，性本能的概念特别扩大了。它囊括了过去划分出的两种本能。

弗洛伊德用性欲来理解机体的生的本能，来理解千方百计保存和发展生命的本能。它们或者以延续种族的形式（狭义的性欲），或者以保存个体的形式。死的本能的任务是：一切活的有机体回归到无机物的（即死亡物体的）无生命状态，力图回避生活和性欲的骚扰。

在弗洛伊德看来，整个生活就是这两种本能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在活的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中混杂着性欲和死亡这两种本能：前者符合于生理学的创造过程，后者是指有机物的衰亡。只要细胞活着，它就具有性欲。①

当不安的、求生的性欲在性方面得到满足时，死的本能就开始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因此，性欲充分满足后的状况和死相似，而在一些低级动物那里，授胎行为和死相一致。它们之所以死的原因在于：性欲满足时，死的本能就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并且要完成自己的使命。②

① 参见：《自我与伊底》，第39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47页——48页。（原注）

弗洛伊德的这一新理论反映出，他在生物学方面受到了著名德国生物学家、新达尔文主义者魏斯曼^① 的很大影响；而在哲学方面，受到很多叔本华的强烈影响。

6. 现在，我们要论述第三时期的第二个特点。它是指无意识内容的扩展，指这一内容从崭新和独特的方面所得到的丰富。

第二时期的特征是，从动力方面去理解作为被压抑现象的无意识。弗洛伊德在精神病现象的研究中主要涉及了这一点。^② 在这一时期，专门的精神病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压抑现象主要是由性欲构成。它与我们的“自我”意识为敌。在最近的一部论著《自我与伊底》中，弗洛伊德提出，把和我们的“自我”不相融合的、整个心理活动的这一部分，称为“伊底”。“伊底”——这是由性欲和本能所组成的内在混沌的自然力。我们有时非常敏锐地在自身察觉到它。它抗拒我们的理智和良好的意志。“伊底”是一股强烈的冲动力；“自我”是一种理智和控制。在“伊底”中，唯乐原则是至高无上的；“自我”则是现实原则的代表。一句话，“伊底”是无意识的。

到目前为止，在涉及无意识时，我们只提到“伊底”。因为被压抑的本能正是属于它的范围之内。所以，一切无意识都表现为某种低级的、模糊的和不道德的东西。所有崇高的、道德的、理智的一切都和意识相一致。这种观点是不正

① 奥古斯特·魏斯曼(1834—1914)魏斯曼主义的创始人。

② 弗洛伊德本人说：“病理学研究把我们的兴趣主要引向了被压抑方面。”（同上注，第14页）（原注）

确的。无意识不仅是“伊底”。即使在“自我”里，而且在它的高层次之中，也有无意识部分。

无疑，从“自我”出发的压抑过程是无意识的，为“自我”所实现的检查作用是无意识的。所以，相当的“自我”部分也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在后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一方面，“自我”的内容揭示，显然比开始更广泛，更深入，并且更接近本质。由于我们了解了作为被压抑现象的无意识，就可以得出结论：正常人比他所认为的要更不道德。这一结论是可信的。然而，我们应该加以补充说，他比自己对这一点的了解更道德些。^①

弗洛伊德说：“人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善的方面，还是恶的方面，都大大超出了他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的‘自我’是通过意识障碍来认识的。”（《自我与伊底》，第54页）

弗洛伊德把“自我”中的高层次的无意识部分称为“自我理想”（Ichideal）。

“自我理想”——首先是指那个检查员，它的检查完成着压抑作用。然后，它（“自我理想”）在一系列其它非常重要的个人和文化生活的现象之中自我表现出来。伊底表现于无意识的犯罪感之中。这种犯罪压迫着某些人的心灵。意识不允许这种犯罪，并同犯罪感作斗争，但是不能够克服它。这一犯罪感在宗教狂的残暴行为的各种表现之中，在与此相联系的自我折磨（禁欲生活、苦行、自焚等）的各种表现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下面，“理想自我”则表现为：被称之为“良心的突然发现”的现象、人异常的严格律己的表

参见：《自我与伊底》，第53页——54页。（原注）

现现象、蔑视自己、忧郁等现象。在这一切现象之中，“自我”意识不得不屈从于无意识深层的实际力量。然而，同时，这一力量又是道德的，常常甚至是“高于道德”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

这种力量是如何在人的心中形成的呢？“自我理想”是怎样产生于这一力量之中的呢？

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自居作用”（认同）的心理机制。人的本能在对待任何他人时都会有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渴望占有对方。例如，幼儿在俄狄浦斯情结时期，力图占有母亲。二是也能够把自己和另一强者认同，与他一致，成为象他那样，吸收他进入自身。幼儿对父亲的态度就是这样：他想成为父亲那样，并模仿他。这第二种对待客体的态度出现得更早，它联系着幼儿和整个人类发展的最早的口腔（嘴）阶段。在这一阶段，幼儿（和史前人）除了吸收以外，不知道对待客体的其它方法；所有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都立即想把它放入自己的嘴里，并且这样使它成为自己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模仿欲似乎是一种更原始的吸收的心理替代物。在人的生活中，自居作用有时取代了猎取恋爱对象的正常欲望。例如，在失恋时，在无法占有恋爱对象时，人要是把自己所爱之人的特征吸收进自身，他就与该对象相象，和他认同。^①自居作用（认同）就解释了“自我理想”在人心中的形成。

在经历俄狄浦斯情结的时期，就“自我理想”形成而言，与父亲的认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时，幼儿把父亲及

^① 参见：弗洛伊德：《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年，第68—77页。

其勇敢、威胁、指示和禁令一起吸收进了自身。因此，严厉和残酷的色调就出现在“自我理想”、良心、职责和绝对命令等本能之中。“你应该”，——第一次回响在人的心中，就象俄狄浦斯情结时期父亲的声音一样。与这一情结一起，它被排挤进了无意识。从那里，这一声音继续回响着，就如同内部的职责权威，如同崇高的、独立的“自我”和良心的嘱咐。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教师、宗教和教育的权威与父亲声音相呼应。然而，这些影响是较表面和有意识的。所以，他们自己应该从人和父亲及其意志的早年认同中获取力量。弗洛伊德说：“‘自我理想’保存着父亲的特性。俄狄浦斯情结愈厉害，压抑愈迅速，随之，‘自我理想’就象良心那样，也许，象无意识的犯罪感那样，将愈严厉地控制着‘自我’。”

这就是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理想”的理论。

在结束本章时，我们指出，弗洛伊德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把无意识确定为是非语言的；它借助于和相应的语言表象的结合，变成前意识（从这里往往可以进入意识）。①在这里，弗洛伊德较自己过去的论述来说，赋予了这一定义以更大的意义。可是，即使这样，它仍然没有被进一步展开论述。

现在，我们要结束无意识的描述。我们已知道了它的产生，了解了它的内容。然而，我们还不知道最重要的一点：弗洛伊德获得了这一切关于无意识的见解，究竟依凭了哪些材料，借助了哪些方法，也就是哪些研究手段？因为，只有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才能判断所有这些见解的科学根据和可信性。下一章将对此进行阐述。

① 参见：《自我与他我》，第15页、16页。在这里，弗洛伊德援引了较早的论述，这一论述首先提出了该定义。（原注）

第五章 精神分析方法

- 1 妥协的结构
- 2 自由联想法
- 3 梦的解析
- 4 神经机能病症
- 5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

1.当我们阐述早期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时，我们强调，弗洛伊德没有找到揭示这一概念的直接途径，而是通过病人本身的意识了解到它。至于他的成熟时期的方法，仍然必须重申这一点。正如弗洛伊德本人在最近的一部论著中就此所说的那样：

我们的一切知识常常和意识联系着。甚至我们能够认识无意识，也只是通过把它转换为意识的方法。（《自我与伊底》第14页）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实质在于解析（说明）特种意识的某些结构。

这些结构的形成根源于无意识材料的影响。

究竟这些结构是什么呢？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对于无意识来说，直接通往意识和前意识的大门是封闭着的。检查员在门槛上守卫着。然而，我们也已知道，一切被压抑的本能并没丧失其能量，所以，常常竭力冲向意识。

它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部分采用妥协和变形的方法。凭借这一方法，它们来蒙骗检查员的警惕性。当然，被压抑本能的变形和伪装在无意识区域中完成。它们一出现，就哄骗了检查员，从而进入意识。在意识中，它们是不被发觉的。研究者正是从这里，从意识之中发掘它们并且加以分析。

所有这些妥协的结构可以分为两种：

1) 病态结构：歇斯底里病症、呓语的思绪、恐惧症、日常生活的病态现象，如：遗忘名字、失言、笔误等。

2) 正常结构：梦境、神话、艺术创作，哲学的、社会的、乃至政治的思想等，也就是说，人的整个思想意识创作方面。

这两种结构的界限是不稳定的。因为常常很难说明，正常结构在哪结束，病态结构又始于何方。

弗洛伊德把最主要的研究花在梦境上。解释梦境形象的实际方法就成了整个精神分析的拿手好戏。

弗洛伊德把梦境区分为两个方面：

1) 显意 (manifester Inhalt)，指梦境的形象。它们一般来自最近几天的模糊印象。我们容易回想起来，并且希望把它们告诉别人。

2) 隐意 (latente Traumgedanken)，指那些害怕意识境界，并巧妙地用显梦的形象来加以伪装的欲望。意识常常料想不到其本质。①

如何揭示这一隐意，也就是说，怎样解析梦呢？

2. 针对这一点，弗洛伊德提出了“自由联想”的方法 (freie Einfälle) 或者由所析梦的显象而产生的自由联想 (freie Assoziationen)。应该让自己的心理获得充分的自由，应该减弱我们意识的阻抗和批评程度：无论什么，即使是最荒诞的、乍一看和所析梦没有任何关系的思想和形象都让它进入大脑。应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并给一切要进入意识的东西打开自由的通道，尽管它似乎是无意识，失去作用或者和事情不相关的；唯独必须竭力捕捉心理中无意产生出来的东西。②

我们一着手这项工作，就立即会发现，它受到我们意识的强烈抵抗。因为某种内在的阻抗滋生出来，反对进行梦的解析。这一阻抗有各种形式：有时我们认为，不用解析，显意就已经够清楚了，所以不需要任何解释；有时又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自己的梦非常荒谬和怪诞，以致于以为它不可能有任何意义。最后，我们往往谴责进入自己头脑的想法和形象，并把它们视作和梦境无关的偶然现象排挤进其发源

①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30页以后。隐意由于其和白天印象的关系，有时称之为“白天留下来的无用的记忆”。(Tagesreste) (原注)

② 同上注，第83页—87页。(原注)

地。换句话说，我们总是为图维护和坚持合法的意识观念，我们无论如何不想违背支配着这一最高心理境界的法规。

为了揭示愿意，必须克服这一顽固的阻力。因为它就是作为检查作用的那股力量。它使梦的真实内容（愿意）变形，把它变为梦境的显象（显意）。这股力量也阻碍着目前我们的研究。它正是梦和我们回忆时遇到的那些无意识的变形现象容易迅速遗忘的原因。然而，阻抗的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出现的地方必然存在着被压抑的“未被检查”的竭力冲向意识的本能，所以阻抗力集结在那里。**妥协的结构**，也就是指梦境的显象以检查作用唯一允许的形式取代了这一被压抑本能。

当一切表现形式的阻抗最终被克服时，那些经过意识、看来偶然并无联系的自由思想和形象，原来却是达到被压抑本能，即愿意的那根链条上的一些环节。这一愿意是欲望的隐蔽实现。①这种欲望在大部分情况下（但也不总是）②指性欲和一般幼稚型性欲。梦境的显象是欲望客体的换位表象，或者无论如何和被压抑本能有某种关系。

构成被压抑本能客体的这些替换象征的规则非常复杂。决定着它们的目的在于：一方面，要维护与被压抑表象的某种哪怕模糊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又要具有完全合法、无懈可击的意识形式所能接收的特点。这一点表现为，把某些形象融合成一个混杂的形象，确定许多无论与被压抑表象，还是与现存的梦的显象有联系的间接形象和环节，构造意义

①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101页以下。（原注）

② 参见：《袖珍字典》，第616页。（原注）

迥然不同的形象，把激情和冲动及其实际客体转化为其它模糊的梦的细节，把情感激动转化为其对立面等等。

这就是构成梦境象征的手法。

这些替换形象，即梦幻象征，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意识与无意识的、允许与不允许的（但总是所希望的）妥协是为什么而服务的呢？它们是为被压抑本能开辟通路。它们允许部分地铲除无意识，并且以此来使心理纯洁，摆脱其深处聚积的被压抑能量。

在现实原则的压迫下，有机体的一切本能和欲望的满足都遭到了拒绝，象征的创造是一种部分的补偿。这是妥协地摆脱现实的解放，是以“一切皆允许”和欲望的幻觉满足向幼白天堂的一种回归。在做梦时，机体本身的生物形态是部分地再现了胎儿的胎内状态。当然，我们是在无意识地重新玩味这一状态，玩味这一向母腹的回归。因为我们脱去了衣服，盖上了被子，跨起了双腿，歪斜着颈子，也就是说，我们再造了胎儿的状态；有机体与一切外界刺激和影响隔绝；最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梦境部分地恢复了唯乐原则的权力。

3. 我们现在以弗洛伊德本人分析梦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的一切。①

梦者刚在数年前死了父亲，其梦的显意如下：

父亲已死，但又被提出，他面有病容。他继续活着，而梦者则尽力阻止死者注意……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一卷，第195页以后。（原注）

其后梦及他事，看来，和这一问题没有任何联系。

他的父亲已死，我们知道这一事实。“但又被掘出”——这和事实不符。对于以后的一切来说，不应该注意这一事实。但是，梦者说，在他给父亲送葬回来之后，他的一牙齿开始作痛。犹太人的宗教学说中有一格言：“牙痛，可以将齿拔去。”他想要照格言去做，因此，去看牙医。但是牙医说：“这颗牙不需拔去，只要忍耐几天。我想用药杀死齿下神经，你过三天再来，我把放进去的药取出来。”

梦者忽然说：“这一取出，便就是掘出了。”

“难道他的话对吗？其实，这不完全对，而只是大概如此。因为取出的不是牙本身，而至多是牙已坏死的一部分。据我们通过其它分析的经验，梦的工作是可以有这种遗漏的。在这种情况下，梦者因压缩作用，将已死的父亲和已死、而尚保留着的牙合而为一。难怪显梦是如此荒谬，因为关于牙的一切话语显然不适用于他的父亲。然而，父亲和牙之间究竟有哪一种公比的成分①呢？”

“梦者本人对此作了回答。他说，他知道，梦中失牙，就是家内要死人的预兆。”

“我们知道，这种俗语的解释是不对的，或者最多也只是一种歪理。因此，我们在梦的内容的其他成分的背后，去发觉真意，便更感惊异了。”

“在没有追问的情况下，梦者开始细述他的父亲的病和

① 两个概念对比所依据的第三个概念。（原注）

死，以及父子之间的关系。父亲卧病既久，儿子对于病人的侍候和治疗费用很大。但他仍忍耐着，毫不介意，绝没有希望一切早点结束的念头。他自诩在对待父亲方面能不违背犹太人的孝敬观念，而且坚守犹太人的法律的一切要求。”

“然而，他的梦念难道没有向我们展示矛盾之点吗？他曾将牙齿和父亲混而为一。他一方面要以犹太法处置病牙，以为牙痛须即拔牙，另一方面又要以犹太法对待父亲，以为做儿子的不必顾惜金钱或精神上的损失，须承担整个负担，不要对父亲有所怨恨。假使梦者对于病父和对于病牙有同样的情感，也就是说，假使他希望父亲的病痛和费用因为他的死而早日完结，那么，二者情境的相同不更可令人信服吗？”

“我相信，这确是梦者对久病的父亲的态度，我又相信，他以孝顺自诩乃是想阻止这种念头的出现。人们在类似的情形下，往往不免希望病父快死，而在表面又装作善意的考虑。例如，以为这对父亲也是一种解脱。然而，请注意，此时我们已跨过了隐意上的樊篱。无疑其思想的第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只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只是当梦的工作正在进行时才是这样。然而，敌视父亲的心理运动大概早已在患者的“无意识”之中聚积，还可以溯源于儿童期。而在父亲生病期间，这些运动又一次胆怯地化装潜入意识之内。对于成梦的其它隐意，无疑，我们更可以作此主张。确实，梦中没有对父亲怨恨的表示。但是，我们若追溯到孩提时代梦者对父亲的怨怒，便可知他之所以畏惧父亲，乃是由于他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后有手淫为行（俄狄浦斯情结——沃洛希诺夫注），而他的父亲往往加以禁止。这便是梦者和他父亲的关系：他

对于父亲的情感略带敬畏的色彩。而敬畏则来源于早年的性的威协。

我们现在可由手淫的情结来解释梦中其他的说法了（各种感觉一起和儿童的手淫联系着——沃洛希诺夫注）。“他面有病容，”实暗指牙医的另一句话，这里没有牙就未免不好看了。但是同时又暗指青年在青春期内因性欲过度，而流露或害怕自己流露的病容。梦者在显梦里的病容由自己转向他的父亲——这是梦的工作的拿手好戏之一。^①

“他继续活着。”这句话一方面是指求父亲复活的愿望，也符合牙医保牙不拔的允诺。“梦者尽力阻止他（父亲）注意，非常巧妙地引导我们用他已死来完成这一句话，但句子的填补实际上又可指手淫那一情结。年轻人当然要设法掩盖自己的性生活，而不使父亲探悉。

你们由此可见，这个不可解的梦是如何形成的。它是由一种奇异而引人进入歧途的压缩作用所构成的。因为此梦的一切形象都来源于隐意，并且造成双关的代替物，以代表隐意……”

精神分析的释梦正是这样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联想法为揭示一切中间物（病牙及拔牙的必要性）提供了可能。这些中间物把显梦（父亲被从坟里掘出）和被压抑的无意识本能（杀死父亲的幼稚型欲望）联结起来。此类的隐意是仇视父亲并希望他死，只是在显梦里加以了伪装，以至于这一显梦完全满足了意识的最严格的道德规范。大概，弗洛伊德的病人难以同意这种对他的梦的解析。

^① 借助于弗洛伊德的阐释，梦的隐意转变为显梦并被揭示开来的过程称之为梦的工作。（编者注）

这一梦之所以有趣，在于其隐意（即暗藏的欲望）为患者一生蕴藏在无意识之中对父亲的敌视情绪提供了出口。梦浓缩了他一生三个时期的无意识的敌视本能：俄狄浦斯情结时期的，性成熟时期的（手淫情结的），以及最后，父亲生病和死亡时期的。无论如何，在这一梦方面，分析的探针深透到了最底层，即俄狄浦斯情结的幼稚型本能。

4. 在分析妥协的结构的其它形式时，弗洛伊德仍然运用这些方法，首先把它运用于研究各种神经病的病态症状。要知道，弗洛伊德是出于病理学的需要才去释梦的，他试图把梦当作病症。如果分析梦的方法被研究出来，得到完善和琢磨，那么当然，神经病症便成了无意识及其内容的结论的主要材料。

显然，哪怕是稍微深入一点这一有趣而专门的方面，我们都不能做到。所以我们只能有限地说一些弗洛伊德方法在精神病学方面的运用。

在每次精神分析时，患者应该向医生公开由于其病情症状而进入头脑中的一切。这时，就如同释梦一样，主要的任务是克服患者的意识表现出的阻抗。然而，这一阻抗同时为医生作出一个重要的提示：凡是在患者心中意识阻抗特别激烈的地方，恰恰正是“病原”所在。这一“病原”应该成为医生工作的主要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哪里有阻抗，那里就有压抑**。医生的任务是挖掘到患者心中被压抑情绪，因为一切精神病的根源在于没有成功地压抑住患者的某种特别有力的幼稚型情结（最多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说，在揭示出情结之后，需要让它消逝在患者的意识之中。要做到这一

点，患者首先应该接受（承认）情结，然后，依凭医生的帮助，全面地根除它，也就是说，把对这一情结的不成功的本能的压抑（Verdrängung）变为有意识的理智的斥责。这样，治疗就完成了。

5. 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一系列非常广泛的生活现象，如失言、笔误、遗忘词和名等等。在分析时，它们都是与梦境和病态属于同一类型的妥协的结构。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正是致力于这些现象的研究。我们从这方面举几个例子。

某个奥地利法院的院长在一次开庭时说：“先生们，我承认合法的出庭人数，所以我宣布闭庭。”

当然，他本应说“开”。如何解释这种失言呢？这次开庭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他在心灵深处希望看到闭庭。显然，这种希望，他无论怎样都不会承认。然而正是它不顾意志和意识，打断了他的语流并且歪曲了它。①

另举一例：

一位教授在发言中打算说：“我没有能力（Ich bin nicht geeignet）来充分评价尊敬的前辈所做出的一切成就。”但他没说这句话，却说了：“我不想（Ich bin nicht geneigt）评价一切成就”，等等。这样，在应该说“geeignet”（有能力）的地方，他误用了一个音很相似的词“geneigt”（不想）。这就完全得出了另一个意思。然而，这正好表明了教授在专业方面对前辈的一种无意识的不友好态度。

这种类似的过程也表现在忘记某个词或者名字本身的现象

① 参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原注）

象之中。当我们试图回想起任何被遗忘的名字时，我们的意识中总是会浮现出和被遗忘名字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某些其它的名字和思想。这些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的名字和思想类似于梦的替换形象。借助于它们，我们就可以找到被遗忘的。这种情况总是在于，遗忘的原因是联系着被忘却名字的，某些使我们不愉快的回忆。正是它把这个毫无过错的名字引向了“遗忘的深渊”。

弗洛伊德就曾举过一个这类的例子。他说，“一次，某个陌生人请我到饭店里和他同饮一杯意大利酒。但是，他却忘记了想要喝的酒的名字。他之所以遗忘，只是由于他对这种酒有某种特别愉快的回忆。有许多不同的代名相继引起，我从而推知他因一个名叫赫德维的女人，而遗忘了这种酒名。他不仅承认自己曾经在初尝此酒时遇见一位名叫赫德维的女人，而且由于我这个推测，而立即记起了酒名。那时，他已幸福地结婚了，这个赫德维则属于不愿回首的往事。”①

这样，意识与无意识的斗争和妥协构成了我们熟悉的心理活动，据弗洛伊德看，它渗透进一切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

精神分析方法进一步运用的方面是狭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神话、艺术、哲学思想、以及最后，社会和政治现象。至于这些，请见下一章。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115页。（原注）

第六章

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化哲学

- 1 文化与无意识
- 2 神话与宗教
- 3 艺术
- 4 社会生活形式
- 5 生之创伤

1. 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一切思想意识创造都根源于梦和精神病之类的心理本能。无论其整体，或其形式和内容完全可以归结于这些根源。思想意识体系的每一因素都受生物心理的严格制约。它是机体内部各种力量斗争相调和的产物。它标志着这类斗争中各种力量间所达到的平衡，或者一种力量战胜了另一种力量。如同神经机能病或呓语的思绪，思想意识体系从无意识深层汲取力量。然而它又不同于精神病现象，它包含着对意识和无意识双方同样有利的，更持久、更稳定的和谐。因而它有益于人的心理。①

① 弗洛伊德主义者荣格指出，病人臆想Dementia praecox（少年痴呆）和原始时代各民族的神话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编者注）

在弗洛伊德的文化哲学中，我们涉及的是一切都已经很清楚的“心理机制”，因此不必花更多的时间来分析它。

2.用神话塑造形象完全类似于做梦。神话是民族集体的梦。神话形象是无意识中被压抑本能的替换象征。在神话中，与忍受和压抑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主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则著名的希腊神话就是这类典型例子之一：克鲁纳斯^①吞食亲生的孩子，宙斯的母亲救下宙斯，暂时把他藏入肚中（收回母腹），后来宙斯又阉割并打死了克鲁纳斯。显而易见，这个神话的所有象征形象都来自俄狄浦斯情结。一切民族中流传最广的关于父子之争的传说都属于这一类：日耳曼史诗中的希尔德布兰特和古蒂布兰特之争，^②波斯史诗中的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之争^③，我国勇士歌中的穆罗姆人伊里亚和儿子之争。这一切总是描写同一个永恒的主题，即为占有母亲而斗争。

宗教体系就更加复杂些。在这里，无意识的“自我理想”和被压抑的性欲情结一起具有极大的作用。然而，就宗教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而言，俄狄浦斯情结仍然是主要的依据。弗洛伊德主义把宗教分成母亲宗教和父亲宗教，正是根据宗教忍耐中哪一种因素占上风：恋母还是禁欲和父亲毅

① 克鲁纳斯是宙斯的父亲。（译者注）

② 参见：日耳曼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流传于八世纪）。（译者注）

③ 参见：菲尔多西（伊朗诗人940—1020）的史诗《王书》（10世纪至11世纪之交）中的悲剧故事《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译者注）

志。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东方宗教中的阿斯培特^①教、巴尔^②教等。父亲宗教最地道的表现是犹太教，它有着各种禁律、戒条、甚至割礼（父亲禁止儿子性欲的象征）。

现在我们来谈艺术。

3. 弗洛伊德本人把释梦和分析病症的方法首先运用于研究笑话和俏皮话的审美现象。^③

俏皮话形式正是取决于构造梦幻形象的形式结构的那些规律，即替换表象形成的规律。这些规律就是指用一定方法来合理迂回的方式，即表象融合和词义融合，形象替换，词义的二重性、由一方变为另一方的转义，移情等等。

笑话和俏皮话的意向在于：回避现实性，从生活的严肃性中解脱出来，并宣泄被压抑的幼稚型本能、性欲或侵略本能。

性俏皮话出于猥亵，作为猥亵的一种审美替换。什么是猥亵呢？它是性行为和性满足的替代物。猥亵以女人及其出现为对象，哪怕是想象的。它试图让女人来进行性刺激。这是一种犯罪的手段。猥亵对象的名称常常是些幻象、呈象或触觉的替代物。猥亵披上俏皮话的外衣，就更隐蔽了自己的意向，使它更能为文化意识所接受。好的笑话需要听众。它的目的不仅在于回避禁戒，而在于赢得听众，用笑去赢得，在笑中造就同盟者，似乎这样能使罪孽社会化。

在艺术形式的遮掩下，攻击性俏皮话有独特的表达方

① 吉腓尼基丰收女神和爱神。（译者注）

② （腓尼基日神）古代东方的神名。（译者注）

③ 弗洛伊德：“Der Witz und seine Beziehung zum Unbewussten”（《笑话及其无意识关系》），（1921）第3版，有俄译本。（原注）

式，即由对父亲和父权的无意识态度（俄狄浦斯情结），到最终对任何其他人的仇视（幼稚型独立），转变为对任何规则、法令、国家、婚姻的幼稚型敌意。

所以，俏皮话只是泄露出被压抑的无意识能量，也就是说，俏皮话最终为这种无意识服务并控制它。无意识的需求构造着俏皮话的形式和内容。

弗洛伊德本人就艺术问题没有更多的专门论述。这方面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已是由他的学生进行的，主要是奥托·朗克。

按照弗洛伊德主义者论艺术的意思，任何艺术形象总是在泄露出无意识，只不过是以蒙骗和稳定意识的形式。这是一种有益的蒙骗。因为它在不制造和意识重大冲突的同时，可以解开一般人的情结。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性欲象征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实际上，似乎最无辜和普通的艺术形象，如果加以揭示，原来都是某种性欲对象。我们从俄罗斯文学方面来举一例。莫斯科教授叶尔马科夫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解释果戈理的著名中篇小说《鼻子》。据叶尔马科夫认为，“鼻子”竟然是penis'a（男性生殖器官）的替换象征。与俄狄浦斯情结（父亲威胁）紧密联系着的名为“阉割症结”的内容，即害怕丧失penis'a或者性能力，是丧失鼻子的整个题材及其展开动因的基础。①

我们认为不必再多举例说明。

然而，艺术不仅从无意识的“伊底”中汲取力量，而且无意识的“自我理想”也可以成为艺术的源泉。例如，陀斯

① 叶尔马科夫教授：《果戈理创作的心理学概述》，（原注）

妥耶夫斯基的基本动机之一就是无意识的廉耻感；后期的托尔斯泰则是对人的强烈的道德要求等等；出自“自我理想”范围的类似动机能促进艺术创作，尽管这些动机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艺术，而在于哲学。

因此，一切艺术内容方面都以个性心理为出发点；它反映人的个别心灵中各种心理力量的变化，却不反映客观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各种力量与冲突。我们在艺术中常常遇到来自社会和经济关系领域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具有的仅仅是替换意义：就象柯瓦辽夫少校^①的鼻子那样，在它们身后一定隐藏着某种个人的性欲情结。

至于艺术形式和技巧问题，精神分析者或者完全用沉默来回避，或者从旧的原则观点出发来解释形式，即花最少的气力。形式艺术在于欣赏者花力最小而收效最大。这种经济原则（确实，在较细腻的形式方面）由弗洛伊德用来作为分析俏皮话和笑话的技巧。

4. 现在，必须扼要地谈谈精神分析理论关于社会形式起源问题。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由弗洛伊德后期专著《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群众心理学和自我分析》）奠定的。

整个这一社会心理学体系的中心是我们已熟悉的自居作用机制和无意识方面的“自我理想”。

我们看到，“自我理想”（无意识欲求、责任嘱托、良心等的综合体）是通过和父亲以及其他控制自己早期恋爱对

① 索发理小说《鼻子》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象的不可及者的自居作用（自我认同），而形成于人的心中。“自我理想”表现有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现在还无须说明。众所周知，在一般情况下，恋人热衷于用对象其实并不存在的一切优点和理想来装饰自己的恋爱对象。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说，人把自己的爱物理想化了。这一理想化的过程是无意识的。因为，显然恋人完全确信，所有这些优点确实属于对象本身，并且不怀疑仅在他心中实现的理想化过程的主观性。进一步说，不仅狭义的性爱物可以理想化，而且我们还常常把自己的老师、领导、喜爱的作家或艺术家理想化（过高地评价其优点，而忽视其缺点），最终甚至可以把某一机关或思想理想化。一句话，可能的理想化范围极其广泛。

什么是理想化的心理机制呢？我们可以说，理想化过程和“自我理想”的形成是逆向的。因为，那里我们把客体吸收进自身，用它来丰富自己的心灵。这里却恰恰相反，我们把自己本身的部分，特别是“自我理想”注入客体。我们丰富着客体，同时使自己贫乏。在一般的性爱中，这一过程大多数是不完全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为客体而让出“自我理想”，或者换句话说，把外部客体放到“自我理想”的位置，我们会失去任何可能反抗这一客体的意志和权威。显而易见，既然它占据着“自我理想”的位置，我们良心的位置，我们怎么能反对它呢？这种权威的意志是不容争议的。这就形成了领导、神甫、国家和教堂的威信和权势。①

这样，在俄狄浦斯情结时期，父亲声音进入人的内心并

① 《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第81页。（1921年）（原注）

成为人的良心的内在声音。现在，通过逆向过程，重新外露，并成为绝对和崇敬的外部权威之声。^①

据弗洛伊德看，催眠现象正是依据于用他人人格来替换“自我理想”这一过程。作催眠疗法的医生掌握患者的“自我理想”，占据这一“自我理想”应有的位置并以此便容易控制人的弱意识的“自我”。

但是，社会组织本来就还不限于人对权威者，如领袖、祭司等个人关系。显然，除了这种关系之外，还存在着部落、教会、国家一切成员之间密切的社会关系。如何解释这种关系呢？这还是自居作用的机制。由于这一机制，部落的所有成员都把各自的“自我理想”移到了同一个客体身上（领袖），他们在相互等同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相互平等，消除差异。这样就形成了部落。

弗洛伊德本人总结的定义就是：蒙昧无知的群众（集体）是一些个人的总和。他们把同一个外部客体放在自己“自我理想”的位置上，因此，他们把各自的“自我”互为等同。^②

正如读者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完全用心理机制来解释社会组织。心理力量促使并形成交际，赋予交际以稳定和持久性。大多数情况下，同一定社会权威的斗争，社会和政治的革命，在“伊底”那儿有自己的根基：这一“伊底”是对“自我理想”，更准确地说，对替换它的外部客体的一种反抗。在文化创作的一切方面，我们的意识“自我”具有最小

① 同上书，第83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87页——88页。（原注）

的意义。这一“自我”坚持现实性的（外部世界的）利益，它以此企图缓和“伊底”的欲望和冲动。在“自我”上又压着具有自己绝对要求的“自我理想”。这样，意识“自我”就为三个敌视的主人服务（外部世界，“伊底”和“自我理想”），并且竭力调和它们间常常发生的冲突。在文化创作中，“自我”起着形式与警察的作用，而“伊底”和“自我理想”造就了文化的激情、力量和深度。

5.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主义发展后期出现的倾向在奥托·朗克的《生之创伤》一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似乎是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哲学的总结。我们应该在结尾加以阐述。

必须指出，朗克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该书是赠予老师并献给他的诞辰的。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看作是个偶然现象。它完整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弗洛伊德主义精神。

据朗克看，人的一生和一切文化创作不外乎是在不同道路上，借助于不同方法的帮助，根除和克服生之创伤。

人降生于世就已受创伤：在分娩过程中，从母体挤出的机体经受着可怕和痛苦的震荡。能和它相提并论的只有死的震荡。这一创伤的恐怖和痛疼就是人心理活动的开端，这是心灵的底景。生的畏惧成了第一个置换心境，随之逐渐出现了一系列置换。生之创伤是无意识和一切心理活动的根源。人在此后的一生中不可能摆脱生的恐惧。

然而，伴随恐惧一起也产生了回归的向往，即回到逝去的胎态天堂。这种回归的欲望和恐惧是人对待母腹的二重性

态度的基础。它即吸引人，又排斥人。这一“生之创伤”即决定着个人生活，也决定着文化创作的任务和思想。

胎态特征是没有欲望和满足间的不平衡，也就是说，没有机体和外在现实间的不平衡；显然，狭义的外部世界对胎儿来说并不存在。因为，这是母亲的机体，是直接养育他的个体。神话和史诗中的天堂与金色时代的一切特征，哲学体系和宗教启示中的未来世界的和谐特征，以及甚至政治上的乌托邦的社会经济天堂，这一切都明显地表现出那些来自这种渴求回归人曾体验过的胎内生活的特点。关于确已逝去天堂的混沌的无意识记忆是这些特点的基础。所以，它们如此强烈地影响人的心灵；它们不是被杜撰出来的，但它们的实情不存在于未来，而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过去。当然，天堂的大门由一位严厉的卫兵把守，即生的恐怖。它不允许记忆彻底醒悟，并且用各种置换形象和象征来遮掩回归母腹的欲望。

生之创伤重现在病症之中，在儿童的惧怕之中，在成人的神经机能病和变态心理之中。这里，它震动着病人的身躯，不生产地重复着（当然，以较弱的形式）分娩时经历过的、真正的震动。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伤不会被根除。彻底克服创伤只能通过文化创作的途径。朗克把文化确定为是各种努力的综合，即努力使外部世界为替换物，为母腹的代用品。

整个文化和技术都具有象征意义。我们生活在象征的世界中。象征归根结底只指一个，即母腹（原义uterus，指子宫——译者注）以及入腹的途径。原始人藏身的山洞意味着什么？我们感到舒适的房间是指什么？家乡、国家等等呢？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安适的母腹的代用品和象征。

朗克试图通过分析建筑形式的途径，来揭示它们和uterus的隐蔽的相似之处。他正是从这一源泉，即生之创伤，推出艺术形式。例如，身体弯曲、坐着的古老塑像明确地表示了胎儿的姿态。只有希腊人塑像（在外界自由戏耍的大力士）才标志着克服创伤。希腊人首先在外部世界中感到自己美好。因为他们不向往黑暗和胎态的舒适。他们解开了狮身人面像之谜，按朗克看，这谜正是人的诞生之谜。

这样，一切创作无论从形式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都是由诞辰活动所决定的。然而，朗克认为，性生活是天堂的最好替代物，是最彻底的生之创伤的补偿。Coitus（性交）是部分地回归uterus（子宫）。

朗克以为，死也被人看作是回归子宫。和死的思想联系着的恐惧是重复生的恐惧。最古老的安葬形式有：挖地（“大地母亲”），死者盘着双腿成坐的姿态（婴儿姿式），埋葬在小船里（暗示子宫和羊水），坟墓的形式，最后安葬的仪式——这一切都表现了对死的无意识理解，即回归母腹。希腊人烧掉尸体的方法就意味着最成功地克服了生之创伤。根据朗克的意思，濒临死亡的痉挛就是重复出生机体的第一次痉挛。

朗克的这一研究方法完全是主观唯心的。他不试图客观地从生理上分析生之创伤及其可能对机体以后生活的影响。他只在梦境、病症、神话、艺术以及哲学之中来寻找创伤的记忆。

朗克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把第一次精神分析看作是分娩活动的再现（精神分析的使用本身一般要持续九个月

左右）。因为，开始时病人的里比多固定在医生身上。病人把半明半暗的诊室（在亮处只站着病人，医生在昏暗处）想象成母亲的子宫。治疗结束时通常再现生之创伤；病人应从医生那里解脱出来，并且用此反应出从母亲那里创伤性地分离出来。因为生之创伤是一切精神病的最后根源。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结束弗洛伊德主义的阐释。朗克的论著为我们的批判部分做好了铺垫。这本书充分暴露了弗洛伊德主义某些方面的错误本质。

第三篇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

第七章

弗洛伊德主义是 主观心理学的变种

- 1 弗洛伊德主义和当代心理学
- 2 心理和“无意识”的元素
- 3 主观主义的心理“动力学”
- 4 性情感理论批判
- 5 弗洛伊德主义和生物学

1. 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我们已经说明了当代心理学的两个基本流派的特征，即主观和客观。现在我们必须努力作出准确和详尽的回答：应该把弗洛伊德主义归入这两大流派中的哪一个。^①

① 关于弗洛伊德的批判文献不多。除了已经提到著作外，还有：Dr. Mang, "Geschlechtsleben und seelische Störungen" (Beiträge Kritik der Psychoanalyse), [马克博士，《性生活与心理紊乱》(对精神分析批判的贡献)]，1924；Ottolinritsheen, "Sexualität und Dichtung"，(奥托·欣里希斯：《性兴奋与诗创作》)1912；Edgar Michaelis, "Die Menscheits-Problematik der Freudschen Psychoanalyse, Urbild und Masse"，Leipzig，(埃德加·米夏埃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人性问题.原始图景与假象》莱比锡，1925。(原注)

弗洛伊德本人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们认为，他们完成了对旧心理学的根本改造，他们为崭新的，客观的心理现象科学奠定了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们，从未力图怎样准确和详尽地表明自己对同时代的心理学及其实践方法的态度。这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一大缺陷。精神分析学派在形成的初期就遭到整个学术界的批评。因此，它自我封闭，染上了一些完全不适合于科学的、工作和思想上的宗派主义习气。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只引证和相互引证自己的东西，在较后的时期，他们还开始援引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而整个其它的领域对于他们来说，几乎不存在。^①

所以，弗洛伊德从来没有认真地努力怎样深入细致地把自己与其它心理学流派和方法加以区分。他对下列方法和学派的态度不明，如：内省法（自魏观察）、实验法，符茨堡学派（麦塞尔^②等），分析心理学（B·斯特纳）^③，以及被称之为美国的behaviorism（行为主义，即关于行为的科

① 应该说明，正宗的科学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允许弗洛伊德主义合法化，而在科学哲学界只要谈到它，就甚至被视为是异端邪说。参见：Wittel：“Z·Freud, der Mann, die Schale, die Lehre”（维特尔：《西·弗洛伊德，男人，外表，理论》），1924。有就斯纳教授的俄译本，傅雷出版社。在1923年出版的维利·莫格的三才世纪德国新学派中，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根本没有提及，而在Meyer-Friebeis（麦耶·弗里恩斯）的概评中也只是几笔带过。（原注）

② 麦塞尔（1867——1937）“三重心理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译者注）

③ 这都是与弗洛伊德主义发展第一、第二阶段同时代的主观心理学流派。（原注）

学的客观主义方法的新尝试）。在弗洛伊德的同时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心身平行论和心身因果论的著名论战。而在这场论战中弗洛伊德却立场不鲜明。①

当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把自己的心理学思想凌驾于一切其它的心理学之上时（甚至不花一点气力来分析其它的心理学），他们从一点上来指责它，即把心理和意识混淆。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意识只是心理体系中的一个部分。②

也许，精神分析和其它心理学的区别确实很大，以致于他们之间已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不可能有资料统计和界限划分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语言。事实是如此吗？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大概对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然而，果真是如此吗？

其实，**弗洛伊德主义把同时代的主观心理学的一切新弊病都搬进了自己的体系**。这一点是容易说明的。只是不要被其宗派的，但一般说来还很明确的术语所蒙骗。

2.首先，弗洛伊德主义教条地照搬了渊源于提顿斯，并经过康德所确定的，心理现象的旧分法，即把它们划分为意志（欲望、冲动），感情（情绪、激情）和认识（触觉、

① 弗洛伊德本人赞同心身因果论，但同时在每一步上又都表现出平行主义者的特点：除此而外，他的整个方法以隐蔽的、模糊的出发点为基础。这种方法以为，一切肉体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心理等价物（在无意识心理中）。因此，可以直接抛弃肉体，只研究其心理的替代物。（原注）

② 参见：《梦的解析》，第440页——448页；《自我与伊底》，第7页——12页。（原注）

表象、思想）。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主义维护这些现象的本来定义和它们的本来区别。确实，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弗洛伊德主义者所认为的心理组成部分，我们就能看到，它是由触觉、表象、欲望和感情所构成，即正是由结构旧心理学的“心理生活”的那些因素所构成。其次，弗洛伊德不加任何批判地把所有这些心理因素搬进了无意识领域，并保留了它们的本意。在无意识中，我们看到欲望、感情、表象。

然而，必须知道，这些心理生活的因素只是为了意识而存在着的。因为把心理分为各种成分的做法来自旧心理学，借助于自我观察的一般方法。而自我观察（正如弗洛伊德本人主张的那样）就其一般形式来说，完全不能够使我们超出“正宗的意识”的界限。

无疑，自我观察完全是有意识的。即使作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某些主观主义心理学家本身早在弗洛伊德以前就曾认为，自我观察一方面具有偏见（不能摆脱主观评价），而另一方面又太使心理生活合理化了。所以，自我观察法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是，无论如何，自我观察只能属于意识的领域。旧心理学还不清楚其它的领域。因此，它把心理和意识相混淆。

不言而喻，不是其它别的，正是意识迫使旧心理学把心理分成感情、意志和认识因素。意识方面是奠定主观心理学这些基础的主导方面。

然而，我们有权用和意识的类比法，来建造无意识体系吗？我们有权假定在无意识之中存在着我们在意识里所发现的那些因素吗？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这种权利。只要排除了

意识，保留感情、表象和欲望就变得毫无意义。

当人用主观意识来说明自己本身的行为时，显然，他不可能说不出自己的欲望、情感和表象的原因。可是，在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些行为时，在我们努力彻底说明外部经验方面时，我们无论在哪也找不到行为的这些因素。因为，外部客观经验应该完全依赖于另一种东西，即行为的物质成分。它和欲望、感情和表象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所以，只从主观主义的自我意识出发，我们的心理生活图画就仅仅表现为欲望、情感和表象的冲突。究竟哪些真正的客观力量是这一冲突的基础呢？至于这一点，自我意识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把一些欲望和情感贴上“无意识”的标签，而另一些则贴上“前意识”和“意识”，我们就只能陷于自我的内在矛盾之中，却不能够走出主观主义的自我意识范围及其所展示的心理生活图画的范围。要否认自我意识方面，就必须否认整个这一图画以及构成因素，必须重新探索认识心理的另一基本方法。客观心理学正是这样去做的。弗洛伊德就用旧的主观主义的砖瓦，企图盖起似乎全新的客观主义的人类心理学大厦。“无意识欲望”难道不是这种旧砖瓦吗？只是变换了一种模样！

3. 可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做法还要笨拙些：他不仅把意识元素搬到了无意识中，而且在无意识中也还为意识元素全盘保留它们的实物差异性和逻辑清晰性；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无意识原来是一个非常清晰和五光十色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观念和形象完全准确地和一定的实物相对应，所有的愿望有着一定的指向，而感情则保持自己的细微差异和最微

妙的转变的全部丰富性。

我们现在来看看检查是如何进行的。弗洛伊德认为，检查是一种完全无意识地（读者记得，意识不仅不控制检查的工作，甚至也没有想过有没有检查这回事）工作着的“机制”。但是，这个“无意识的机制”是多么灵敏地猜测思想在逻辑上的所有细小差异和感情在道德上的所有细微差别！检查员表现出他在思想观念上见多识广，明察秋毫。他在各种感受之间进行纯粹逻辑的、伦理的和审美的选择。这是否能同他的无意识的、机械性的结构相容呢？

弗洛伊德所有其它的“心理机制”（例如，读者知道的转移机制）也全都表现出这样一种高度“意识的”和思想观念的特性；它们的机械性确实最少。它们完全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思想观念性的。

4.这样，无意识丝毫也没有使心理接近物质的自然；引进无意识丝毫也没有帮助我们把心理规律同整个自然的客观规律联系起来。在精神分析里，主观——内在和物质之间的脱离依然和意识心理学里的那种脱离一模一样。与这种脱离一致的和不间断的外部客观经验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方法论上出现的矛盾。

当然，对弗洛伊德来说所有这些困难也出现了。站在主观的立场上，精神分析便失去了直接对待物质的方法。他对物毫无办法：只得要么完全不理它，要么把它溶解在心理中。

事实上，弗洛伊德及其弟子们从来没有直接地同身体有机体的物质成分和物质过程打过交道，他们只是寻求身体在

心理中的反映，就是说，归根到底他们使一切有机的都听命于自我观察的方法，把它心理化。

弗洛伊德关于性感带（即人体在性欲上易受刺激的部分）的著名学说正是身体心理化的典型。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不依据任何生理学理论，对这些感带的化学反应过程，它们与身体其他部分在生理学上的联系他完全不感兴趣。弗洛伊德所分析和全面研究的仅仅是它们的心理当量，即从人的内部的自我观察的观点来看，与这些性感带相关联的主观观念和愿望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作用。

这一或那一性感带（例如，生殖器）在身体整个机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性腺内分泌，它对其他器官的工作和形式的影响，它与身体结构的联系等等——所有这些在外部的物质世界里展开的过程，弗洛伊德完全不加以确定，并且根本不加以考虑。

性感带在机体的物质结构中的作用同它在孤立起来看的主观心理中的作用是如何相关联的，——对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没有给我们作任何回答。结果，出现了性感带的某种重复（加倍）：它们在心理中的命运成为完全自主的、不取决于它们在物质有机体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命运。

弗洛伊德在他的性感带学说基础上开始建立人格理论时，精神分析的这些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关于这个理论我们只提一下最明显表现出它的主观主义的一个方面。

弗洛伊德断言，哪种肛门带幼稚型性欲（即大便时通道特殊的性感刺激）占上风，就会导致哪一种性格特点的形成，这些特点人将保持一生。这样，肛门性欲通过以下途径形成俭省和吝啬的特点：幼年时为在排便时得到最大的满足

而阻留粪便和延长排便过程的激情到成年时（成年人的肛门性欲被排出到无意识中）转变为阻留和积聚与粪便相像的黄金（钱）的激情。

在这一理论中，既没有谈到人身体结构中性格的任何物质基础，也没有谈到周围环境的物理的和客观社会的影响——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性格形成的整个过程是在孤立起来看的主观心理范围内进行的**。在阻留粪便和阻留金钱之间，在粪便与黄金之间只有十分牵强的客观上的相似，可以说是印象相似——而没有任何能在机体本身的物质结构及其周围环境中，即在客观经验中把它们联结起来的物质的、现实的线索。这样，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性感带决定性格和人的行为（要知道，性格完全不能脱离它在人的行为中的物质表现），**但完全不涉及身体和身体结构，也根本没有涉及任何物质环境**。

弗洛伊德这样对待有机体的物质构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通过自我观察而得到的内在感受也不可能和客观外在经验的根据直接相关联。可以完全一贯到底地运用的只有一个观点，要不就是另一个观点。最终弗洛伊德也就倾向于始终一贯地运用主观主义的观点：整个外在现实对他来说归根到底只是现实的心理“原则”，而他又是把这个原则和“唯乐原则”一起放到同一个范围里去的。

某些弗洛伊德主义者（朗克、普菲斯特、格罗德克）断言，精神分析已经能摸索到一个完全独特的存在领域——不是物理的，也不是心理的，而是似乎是中立的，通过分化，从这个中立的存在中，既可能产生物理的，也可能产生心理的存在。

无意识深层也属于这种中立存在，只有在它的最上几层（离前意识较近）才开始心身分化。

诸如此类的论断，从哲学上来说当然是极其幼稚的，它完全避开方法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这一场合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问：这一“中立的存在”及其分化过程是处在和发生在这个经验中——在内部的还是在外部的经验中？

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弗洛伊德主义者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外部经验中诸如此类的存在我们是找不到的。在客观的经验中我们发现物质组织极其复杂化的过程，而物质组织在一定的阶段上导致心理（作为物的新质）的出现；当然，在这个经验里，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不会发现物体和心理是从某个第三者那里分离出来的。这是一个幼稚的形而上学的论断，它从内部的主观的经验中吸取材料，但又给它包上虚假的中立形式。

5. 弗洛伊德的某些支持者们主要在谈该主义的“欲望理论”时指出，精神分析的客观基础是生物学。

这一论断是毫无根据的。可以十分肯定说，弗洛伊德已把生物学加以心理学化和主观主义化。弗洛伊德主义把机体的所有客观生物的形式和活动过程全部溶解到主观心理之中。精神分析著作中五花八门的生物学术语在这里全都失去了客观稳定性，完全溶解在主观心理的范围之中。

为证实这一点，只要指出弗洛伊德是如何对欲望进行分类的就足够了。

除了性欲之外，他把所有的欲望都集拢成一组——“自

“我”欲望 (Ichtriebe)。这一分类的赤裸裸的主观主义原则是一清二楚的。自不待言，从旧生物学的观点来说，诸如此类的分类是不允许的。即便是活力论者，他们也从未公开承认生物学在什么地方会与“自我”有关系。

至于欲望的第二种分类（后期），那么它已经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性质。“爱罗斯”，既然失去任何特定的身体本源，并无一例外地包罗着有机生命的全部现象，它也就比柏格森的“生命冲动” (*elan vital*) 或叔本华的“意志”好不了多少，而对死亡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对涅槃的向往好。

这样，精神分析在一切方面都忠于内部主观经验的观点。从方法论原则来说，他和意识心理学没有任何本质区别。这是另外一种主观心理学，仅此而已。归根到底，精神分析也是依据自我观察的材料。确实，他对此另作解释，力图用它们来拼凑另一幅人的生理图画；但是，只要还站在内部经验的基地上，对主观材料不论怎么解释，也是解释不清的，从中不可能得到任何客观的东西的。要想得到客观的东西，就必须变换观点本身，而这一点恰恰是弗洛伊德没有做的。

第八章

心理动力是思想观念动机的斗争 不是自然力量的斗争

- 1 弗洛伊德主义的新颖之处
- 2 “心理动力”是各种动机的斗争
- 3 社会动力向个人心灵的投射
- 4 意识的现在向无意识的过去的投射
- 5 事实与结构
- 6 “心理动力”的客观因素

1.这样，我们确信，弗洛伊德主义只是诸种主观心理学中的一种。我们也同样看到，他和所有主观论者的共同立足点是什么。然而，事情不仅限于此：我们还应当清楚地划分和正确地评价他和其他主观主义流派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要知道，凡是初次接触弗洛伊德主义的人，无不为其中有着某种近乎离奇的新颖的和独特的东西感到惊讶。当我们的读者读着有关精神分析的东西时，或许也产生过这种印象感到颇为新鲜。这是需要认识清楚的。

在接触到弗洛伊德学说时使人注目并保持下来的第一印象，同从其整个结构中所得到的最后的和最强烈的印象一样，当然是我们心理生活的斗争、混乱和不安，它们以一条红线贯穿于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而他本人则称之为“心理动力”。

这确实是弗洛伊德同其他所有的心理学派的本质区别之所在。旧心理学的心灵生活——“既非常安宁，又极其美满”。一切都井然有序、各得其所、没有任何灾祸、没有任何危机。由生至死都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心灵平静而合理地演进，逐渐地成长。童年的天真纯朴为成人的自觉理智所替代。这种幼稚的心理学的乐观主义是弗洛伊德之前的所有的心理学的特点。只不过在一些人那里它表现得突出些，而在另一些人那里以比较隐蔽的形式渗透在人的心灵生活的整幅图景里。

这种心理学乐观主义是达尔文以前在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生物学乐观主义的遗物。这是一种幼稚的观念，以为生物有机体具有绝顶聪明的合目的性，然而这一观念终于被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学说所取代。自然的必然性这一严格概念弥漫在达尔文之后的生物学的所有领域里，其他所有领域里被逐出的合目的性、和谐等等概念却栖息在心理避难所中。心理，作为和谐与有序的王国，和天然与自发相对峙着。

在如何看待心理的这些观点中，弗洛伊德主义好像进行了一场最激进的变革。

“心灵的天然性”，“心灵生活的自发性”——这是广大读者从弗洛伊德整个学说中最先了解和牢记的东西。然而，那些倾向于尼采学说的人（在弗洛伊德崇拜者中间这样

的人很多),却宁可说“心理生活的悲剧性”。

关于“心理生活的悲剧性”一说,现在必须要指出,尽管天然必然性确实是同合目的性与和谐是格格不入的,但它离悲剧也同样遥远。其实,这一说法也并没有表明整个弗洛伊德主义的特点。

弗洛伊德果真已经能摸索到我们心灵的本质吗?“自我”、“伊底”和“自我理想”、“对死亡的欲望”和“爱罗斯”果真是自发力量的斗争吗?也许,所有这一切只是人的个体意识中各种动机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自发力量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一杯水中的波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需要从稍许不同的方面来重复一下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展开的一系列想法,

2. 弗洛伊德的整个心理学结构,其基础是建立在人的言谈之上的,只是对它们作了独特的解释。所有这些言谈当然是在心理的意识领域里构成的。的确,弗洛伊德不相信意识的表面动机,他力图深入到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然而,他不是从其客观方面把握语言的,他不去寻找它们的物理学和社会学的根源,他力图在语言本身中发现行为的真正动机;病人本身应该把深层“无意识”告诉他。

这样,弗洛伊德主义的结构也就处在这个范围里:根据自己的内部经验,人本身关于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所能说的东西。诚然,弗洛伊德把自我观察引到新的道路上,使之深入到心理的其他层次中,但是对于自我观察,作为证明心理现象现实性的唯一方法,他是不加拒绝的。连“无意识”也能够和应该进入自我观察的范围里。病人本应自己承认“无意识”的

内容（例如，某种被排出的情结），回想起它，借助自我观察来证明它的存在。唯有如此，某种被排出到“无意识”中的感受才获得心理学事实的价值。

正是为了自我观察，无意识的所有产物获得愿望或意念的形式，找到言语的表现，并已经是以这种形式，即以动机的形式，而为人所意识。

很清楚，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屈从于准确的客观考虑的，两种物质力量的关系完全不相似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争论不休，占支配地位的是相互不承认和不理解，想方设法互相欺骗。要知道，诸如此类的相互关系可能存在两种思想、两种思潮、两个敌对的人之间，而决不可能存在于两种自然的物质力量之间！比如，难道在两种物理现象之间可能有互相欺骗或不承认吗？

当然，只有已经进入到意识中，具有了意识的形式（具有了特定内容的愿望、思想等等的形式），无意识的产物才能和伦理要求发生矛盾或者才能被理解为欺骗“检查员”。

这样，弗洛伊德的整个心理动力是由意识从思想观念上加以说明的。可见，这不是心理力量的动力，而只是意识的各种不同动机的动力。

在心理斗争连同实行这一斗争的全部机制这一弗洛伊德的整个结构中，我们只听到对人的行为作解释的主观意识发出的偏心的声音。无意识，这仅仅是这一意识的诸多动机中的一个动机，是从思想观念上对人的行为作解释的诸多方式中的一个方式。

个别人的意识不是他行为的思想观念又是什么？在这方

面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同本义上的（是阶级意识的表现）思想观念作一番比较。但是，对任何思想观念，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阶级的，都不能信以为真，都不能信其所言。谁不善于识破隐蔽在思想观念之下的客观物质力量的游戏，那末思想观念就要对他说谎。

例如某种宗教学说，只有相信它，天真地信以为真的人才被它引入迷途。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即便是这个学说也能成为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文献，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特定集团的某些社会矛盾和利益。它揭示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这一学说的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客观主义心理学家也是这样做的：他不相信任何语言、任何理由和解释，因为人本身总是要根据自己的内部经验为他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的。客观主义心理学家力图揭示人的一言一行的客观根源。这些语言已经不能对他说谎，对于他来说，这些语言将是行为的客观的——生理学的和社会经济的条件的忠实反映。在“心理动力”后面，在动机斗争后面，客观主义心理学家揭示出自然和历史的物质辩证。

弗洛伊德并不是这样做的，他让自己卷入意识的主观理由的斗争。事情却完全不因他而改变，尽管他比较喜欢特殊的一组动机——无意识的动机，并通过特殊的途径获取它们。动机毕竟是动机：物质现象的实体性他是得不到的。弗洛伊德的结构不能把我们引到客观经验的沃土上。

3. 可是，弗洛伊德使之落户在人的心理中的“自我”、“伊底”、“自我理想”和其他“力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动机斗争并没有为承认这些力量提供任何根据。动机斗争，这是客观经验中发生的现实现象——动机斗争本来就表现在语言中。而心理力量却是一种任意的结构，弗洛伊德就是力图用它来解释这一斗争的。同大多数主观心 学 结 构 一样，弗洛伊德理论是外部世界的某些客观关系向心理的投射。**病人和医生的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首先就表现在外部世界中。**

这些关系是什么呢？

病人想对医生隐瞒自己在生活中的某些感受和事情，想把自己对病因以及感受的特点的看法强加于医生。而医生本人则力图维护自己的，作为医生的权威，力图要让病人承认，极力让病人对病情和病症有个正确的看法。与这些相交叉的是其他一些因素：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可能有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的区别，最后是职业的区别——所有这些都使他们的相互关系和斗争变得复杂起来。

就这样，在这一复杂和特殊的社会气氛中进行着弗洛伊德将其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的言谈——病人的叙述和在同医生谈话时他的对答。我们能否承认这种言谈是病人的个人心理的表现呢？

任何一次言谈，根本不能把它只归在言谈者一人份上：它是说话的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广而言之，是发生言谈的整个复杂的社会情境的产物。（在另一处地方）我们已经极力指出，人的言语活动的任何产物，从最简单的生活上的言谈到复杂的文学作品，在其全部重要因素上，完全不由说话人的主观感受所决定，而是由发生这一言谈的那个社会情境所决定。语言及其形式乃是一定语言集团长期社会交往

的产物。言谈基本上是现成地利用它。它是言谈所需的材料，言谈的可能性受这材料的限制。而一定的言谈有它自己的特点：选择一定的词语、有一定的语句结构、有一定的说话语调——所有这一切都是说话人和进行谈话的整个复杂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而说话人的“心灵感受”——我们往往认为它们在这种言谈中有所表现——事实上只是一种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作的片面的、简单化的和在科学上不正确的解释。这是我们用它来把社会关系的复杂总和放置(投射)到“个人心灵”中去的一种特殊的“投射”。在与己关系最密切的交往过程中产生出言语，语言又似乎是这一交往所用的“剧本”，而这一交往本身又是说话者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的，更为广泛的交往的一个因素。由于一定的言谈只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的折射，所以，为了理解这个剧本，就必须把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恢复起来。

如果说的不是外部言语，而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结构所依据的(口头反应)，事情也仍旧不变。口头反应就是这样的剧本，首先是产生口头反应的那个与己关系最密切的小小的社会事件——一次精神分析的“剧本”。在口头反应中表现出我们上面说过的那种医生和病人的斗争。在这些言谈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心灵的动力，而是医生和病人相互关系的社会动力。由此便产生说明弗洛伊德结构特点的那种戏剧性。由此也产生我们指出过的那种心理力量性格化：实际上在这儿进行斗争的是人，而不是自然力量。

心理“机制”很容易向我们泄露自己的社会经历。“无意识”不是和病人的个人意识相对立，但首先是和医生、医生的要求和观点相对立的。“反抗”，同样也是首先反抗医

生、听者，一般说来是另一个人。

俩人相互关系的这一动力，弗洛伊德心理学结构全都把它投射到一个人的个人心灵中去。诸如此类的投射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主观心理中的普遍现象。心灵感受在大多数场合仅仅是重复外在事物和社会关系的世界，主观唯心主义只是在他断言说整个世界仅仅是主体的感受时才是始终一贯的。当现代心理学力图在感受和对象之间划出一条准确的界限时，他最终不得不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认为这样的界限是没有的，认为一切取决于观点。同一对象，根据我们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在什么样的背景中去理解它，时而成为心灵感受（我的感觉、观念），时而成为物体或社会现象。在这方面，得出最激进的结论的是主观心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詹姆士。在一篇著名的文章《意识是否存在》中，他得出结论说，事物和思想是用同一物制成的，意识并不把任何新的现实性带进世界。意识仅仅是对同一事物和现象的另一个观点。

这样，弗洛伊德的心灵动力及其机制结果只是社会关系向个人心灵的投射。这是一个复杂的戏剧化了的形象，弗洛伊德力图用它来解释人类行为——人的言语反应的各个方面。

4. 弗洛伊德结构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无意识的内容，即各种被排出的情结，首先是俄狄浦斯情结，被弗洛伊德归入到人的过去，归入到人的幼年。但是，这一关于人在发展中最初的前意识时期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成人口述的基础上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所能引用的那

些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儿童行为和言谈的经验，①对于弗洛伊德结构的建立没有、也不可能有本质意义。弗洛伊德结构并没依赖这些经验，它在这些经验之前就已形成了，并且这些分析本身就已经要求以经验为前提，完全以经验为依据。这样，儿童情结的整个结构是通过回顾的方法而得到的；它是建立在解释成人的回忆和解释可以用来搞清这些回忆的那些折衷构成物（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引用过的梦的分析，这一分析深入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隐秘回忆）的基础上的。

是否可以承认这种回顾的、恢复幼年感受（其实，情结就是感受的总和）的方法在科学上是有根据的？

我们认为，用这种方法不可能搞清任何现实的、客观的东西。事实上，这里有一种非常普遍和典型的现象：从现在的观点去解释过去。根本谈不上什么客观地回忆我们过去的内心感受。我们在过去中看到的，只是对现在来说、对我们回忆我们的过去的那个时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东西。我们从现在转移到幼儿的前意识的过去的东西，首先是只有对现在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上有价值的色彩。所有的评价、观点、联想——在人生的意识时期它们同诸如“爱”、“性欲”、“母亲”这样的概念连结在一起——用它们自身来敷色渲染这些概念，为了我们而去领悟这些概念，然后我们利用它们转而去解释幼年生活事实，并通过这种途径用这些事实建造有条有理的和被领悟了的、同成年生活事件相似的事件。

① 弗洛伊德本人的一篇最重要的分析儿童神经病的著作：《Geschichte der Fobie eines 5-jährigen Knaben》。（原注）

“对母亲的性欲”、“父亲即情敌”、“憎恨父亲”、“盼望他死”，这是一些“事件”，而这些“事件”只有在我们“成年的”意识时期的现在这一背景下才获得有意味的内涵、有价值的色调、在思想观念上的整个分量；如果从所有事件中把后面所说的一切排除掉，那末它们还剩下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凡是能够使人郑重地去谈论俄狄浦斯情结，即重复幼年生活中的俄狄浦斯悲剧故事的东西——几乎一无所剩了。正是赋予这一悲剧以深刻而可怕的含义的东西，使目睹者心惊肉跳的东西——恰恰是这东西也不会有了。

究竟还剩下什么呢？对幼儿行为可以作一系列零星分散的客观观察：早期易受刺激的性器官（幼年性器官勃起）和其他性感带，难以使幼儿不再经常亲近母体（首先是乳房）等等。对这一系列事实，当然无须争辩，而且它们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但是，从这一系列事实到庞大而又出乎意料的俄狄浦斯情结结构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否定观点、评价和解释（它们是属于现在的）向过去投射，那么就永远谈不上什么增俄狄浦斯情结，不管引以证实这一情结的客观事实怎多。

5. 弗洛伊德主义者们经常对批评他们的人声称说：要推翻精神分析理论，首先就得推翻这一理论所依据的事实。

诸如此类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它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弗洛伊德主义决不是一系列的事实，决不是为事先收集这些事实并加以分类所必需的、起码的工作假设。弗洛伊德主义是一座建立在极其大胆而独特地解释事实这一基础之上的庞

大建筑物，是一座不断以其意外性和离奇性（即便是承认所有这些为证实它而引用的外在事实的话）令人惊讶的建筑物。

事实本身是由反复观察或检查经验加以检验、证实或推翻的。但是，这不可能影响到对结构基础的批判。就拿朗克的《生之创伤》这个完全是又大又怪的结构来说吧。难道为了解定它至少是难以置信的，就得推翻生孩子时身体在生理学上的震动（挤出、因气入肺而窒息、环境影响等）这一事实吗？这一事实是无疑的（尽管它尚未得到详尽的科学的生理学上的研究）和人所共知的。但在读朗克的书的时候毕竟还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切是“当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幼儿性欲这些事实同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结构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这些事实不可能证实这一结构，因为它们所处的范围和所衡量的尺度与它不同。这些事实处在外在的客观经验中，而这结构却处在幼儿心灵的内在感受范围内。况且，为了大体上有权谈论幼儿性欲，就应该把“性欲”这个词的含义仅仅理解为严格限定的生理学现象的总和。如果我们说的是与这些现象相关联、饱含评价和观点、发生在内部经验中的感受，那么我们已经是在建立一种任意的结构了：我们不是取性欲的生理学事实，而是取这一事实在思想观念上的外形。这种纯粹是思想观念上的、被投射到幼儿心灵中去的外移物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构。这完全不是客观生理学事实的纯而又纯的表现。

无意识内容的其他因素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一切对现在来说都仅仅是具有代表性的、从思想观念上对行为作的解释。

向过去的投射。弗洛伊德一步也没有超出主观结构的范围。

6. 除了这个我们不能接受的结构之外，“心理动力”究竟还剩下什么呢？

冲突存在于人的口语之中。这是各种动机斗争，而不是物质力量的斗争。

在它后面，正如在任何思想观念的斗争（不论其规模有多大）后面一样，隐藏着某种客观的物质过程。但是，弗洛伊德主义没有去揭示它们。本来，要暴露它们，就得超出主观心理学的范围，超出人本身根据自己的内部经验（不论对这一经验作如何宽泛的理解）所能说的一切范围。

行为的这些客观因素中有一些因素具有生理学的（归根结底是物理化学的）特性。对这些因素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或者是成为巴甫洛夫院士及其学派反射学说基础的方法，或者是由前不久去世的扎克·列布在其著名的向性理论中①卓越而有充分根据地制定出的方法，或者是其他各种在其基础上是统一的生理学方法。但是，要解释人的行为，所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弗洛伊德使我们碰到的，口头化了的行为的冲突，为了理解这些冲突首先就需要严密地、全面地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唯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灵活方法我们才有可能阐明这些冲突。

我们称之为“人的心理”和“意识”的东西，较之自然的辩证在更深的程度上反映出历史的辩证。心理中的自然已经受

① 参见：H·列布：《动物的被迫运动、向性和行为》，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向性对于心理学的意义》，载文集《哲学新思想》，第8期。

到了经济的和社会的折射。

人的心理的内容、思想、感情、愿望的内容产生在意识使之定形的过程中，因而也就产生在人的语言使之定形的过程中。语言（当然不是在其狭隘的语言学的，而是在广泛和具体的社会学的意义上）就是反映我们获得心理内容的客观环境。行为、思考、目的和评价的动机在这里形成并得到外在表现。它们之间的冲突也在这里产生。

我们的概述，任务是批判，当然也就不能包括关于口头化了的行为的动机和冲突的正面理论。我们所能指出的，仅仅是一个流派，在这个流派中人们有可能客观地理解和研究这些现象。

第九章

作为思想观念的意识内容

- 1 语言反应的社会学特征
- 2 意识内容的研究方法
- 3 “日常思想观念”的概念
- 4 “日常思想观念”的不同层次
- 5 性
- 6 结论

1.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主义的出发点是不相信意识，是从根本上批判人往往完全真诚和善意地用来对自己行为作解释的动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伯恩海姆的经验）。意识是任何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每一行为所作的注解。依弗洛伊德之见，这一注解是不可信的。以它为基础的心理学也是不可信的。

只要弗洛伊德批判意识心理学，我们是能够完全同意他的：确实，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有意识地、科学地解释自己行为的理由。然而，我们再进一步看：无意识动机也丝毫不不能解释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同意识在原则上没有任何区别；这仅仅是意识的另一种形

式，仅仅是意识在思想观念上的另一种表现。

在用“自由联想”方法进行精神分析时附带提出的无意识动机，也是病人的语言反应，如同所有的一般的其他动机一样，无意识动机和意识动机的区别，可以说不在于存在的种类，而只在于内容，即思想观念上的区别。在这一意义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可以称之为“非正宗的”意识，以区别于一般“正宗的”意识。

从客观上来看，动机，无论是正宗的还是非正宗的意识，在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中是完全一样的，也同样都不是行为的原因，而是行为的一个成分，一个组成部分，而完全不是它的原因。可以说，人的行为分解为运动反应（狭义的“动作”）和伴随这反应的内部和外部语言（语言反应）。人的整体行为的这两个成分都是客观的和物质的，都要求用同样是客观物质的事实（不论是人的机体本身，还是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事实）来解释。

行为的语言成分在其内容的一切基本的、本质的方面都由客观社会的因素所决定。社会环境为人提供语言，并将语言同一定的评价和意义结合在一起；社会环境也继续不断地决定和控制人在一生中的语言反应。

因此，人的行为中的全部语言（外部语言和内部语言都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在孤立起来看的单一主体的份上，它不属于这单一主体，而是属于这单一主体所属的社会集团（它的社会环境）。

在上一章里我们指出过，任何具体的言谈总是反映出它直接从中产生的那个与己关系最密切的小小的社会事件——人们之间的交往、谈话。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的“动

力”反映出精神分析过程及其斗争和波折，反映出产生病人言谈的社会事件，但是，在本章中，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言谈的这个与己关系最密切的背景，而是：1）更广泛的长期和稳定的社会联系，我们的外部和内部语言的内容和形式的所有因素是在这种联系的动力中形成的；2）评价、观点、态度等等的全部蕴积，我们是凭借它们来向我们自己和向其他人说明我们的行为、愿望、感情、感觉的。

我们的意识和全部心理的这一内容以及它用来在外面表现自己的那些个别的言谈，在各个方面都是由社会经济因素所决定的。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特定的单独的语言的真正的本质根源，如果我们只是在单独的个体范围里（甚至在言谈涉及到看来完全是人生中私人的、隐秘的方面时也是如此）去寻找这些根源的话。为自己的行为所提出的任何理由，对自己的任何意识（本来，自我意识始终是语言的，始终归结为寻找一定的语言的综合），就是使自己处在某种社会规范、社会评价之下，也可以说是使自己和自己的行为社会化。在意识自己的时候，我就极力要用我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那个阶级中的另一个人、另一个代表的眼光来看我自己。这样，**自我意识**，归根结底，总是把我们引向**阶级的意识**，因为在其所有的基本的、本质的方面，自我意识也就是阶级意识的反映和特殊化。甚至是在个人方面最隐秘的语言反应，其客观根源也在这里。

如何才能理解这些根源呢？

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为分析各种思想意识体系（法律、道德、科学、世界观、艺术、宗教）而制定的客观——社会学

的方法。

2. 在资产阶级哲学中过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而且现在也还相当普遍的信念是，如果已经能够把文化创造的作品归结为创造该作品的人的一定的个人心情和心理感受，那么就可以认为该作品是完全解释清楚了的。

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主义者们也持有这一信念。而事实上，在个人心理的内容之间，在定了形的思想观念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区分。不论怎么样，个人心理的内容丝毫也不比文化创造的内容更明白、更清楚，因此它不能解释文化创造的内容。被意识到了的个人感受已经是思想观念性的，所以从科学的观点来看绝对不是什么第一性的，因而也不是什么不可分解的客观现实；不，这已经是从思想观念上对存在所作的一定的修改。野蛮人意识的最模糊的内容和最完善的文化作品只是思想观念创造这个统一链条的两个极端环节。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间断的阶段和中间环节。

自我的想法越清楚，它就越接近科学创造的定了形的成果。况且，如果自我替这一想法找不到准确的语言表达方法，不使它和涉及同一事物的科学立论发生关系，换言之，只要自我不把本身的想法变成重要的科学作品，自我的想法就不可能达到完全清楚的程度。如果某种感情替自己找不到外在的表现，不用自己去使词语、节奏、色调获得活力，即不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就不可能达到完全成熟和确定的程度。

这条由个人心理内容通向文化内容的道路是漫长的，艰难的，但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并且自始至终，在所有的阶

段上它都是由同一个社会经济规律所决定。

而且，在这条道路的所有阶段上，人的意识要运用语言——社会经济规律的最细致然而也是最复杂的折射来工作。研究最简单的日常形式的语言反应，应该运用像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复杂的思想意识形态而制定的那些方法，因为客观必然性在语言中的折射规律在这两种场合都是一样的。

人的任何语言都是一个思想意识的小体系。说明自己行为的理由是法律和道德的小型创作；因欢乐或悲痛而发的感叹——简单的抒情作品；对现象因果的日常看法——科学和哲学认识等等的萌芽。科学、艺术、法律等稳固和定形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从一种模糊的自发思想观念中产生和结晶出来的，这种自发思想观念以内部和外部语言的泱泱波涛流经我们的每一行为和每一知觉。当然，定形了的思想观念本身又反过来对我们的全部语言反应发生影响。

3. 我们把贯穿我们全部行为的内部和外部语言称作“日常思想观念”。这一日常思想观念在某些方面较之定形了的、“正宗的”思想观念更敏感、更富情感、更神经质和更活跃。在日常思想观念的深处也积聚着矛盾，它们达到一定程度最终会炸毁正宗思想观念体系。但是我们可以一般地说，日常思想观念也和本义上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一样地与社会经济基础相关，一样地服从发展的规律。因此，日常思想观念的研究方法，如上所说，也应当基本上是与之一样的，只是根据材料特点的不同而稍有差别和变更而已。

现在我们回到精神分析所依据的以及它力图用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来解释的那个“心灵”冲突吧。从客观上来看，

所有这些冲突都是在自发的内部和外部语言中（当然，不包括它们的纯生理学的方面），也即在自发的日常思想观念中激烈起来的。这不是“心灵的”，而是思想观念的冲突，因此，在个人机体和个人心理的狭隘范围里它们是不可能理解的。它们不仅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超出意识范围，而且也超出整个个体的范围。

梦、神话、俏皮话和挖苦话以及病态构成物的所有语言成分都反映出在日常思想观念内部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倾向和潮流的斗争。

4. 与弗洛伊德的经过检查的、正宗的意识相对应的那些日常思想观念领域表现出阶级意识中最稳定的和占支配地位的成分。这些领域和这一阶级的定形的思想观念，和这一阶级的法律、道德、世界观相距很近。在日常思想观念的这些层次上，内部语言很容易整理就绪，并自由地转入外部语言，不论怎么样，它不怕成为外部语言。

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相对应的其他层次则与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的稳定体系相距十分遥远。这些层次表明这个统一的和严整的体系在解体，表明一般的思想观念上的理由具有不稳定性。当然，使统一的日常思想观念消散的那些内在动机，它们的积聚情况，可能具有偶然性，并且只是证明个别人的社会性的阶级蜕变，但更经常的却是证明分化正在开始，如果不是整个阶级的分化，那么就是这一阶级的某些集团的分化。在健全的集体中和在社会性上是健全的个性中，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日常思想观念是严整的和牢固的；在正宗的和非正宗的意识之间没有任何分歧。

日常思想观念的非正宗层次的内容和成分（依弗洛伊德之见，即无意识的内容和成分）与日常思想观念的“经过检查”的层次以及定形的思想观念的体系（道德、法律、世界观）同等程度地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制约。例如，古希腊属于统治阶级的那些人，他们的同性恋本欲在日常思想观念里完全引不起任何冲突，这些性欲自由地转移到他们的外倾语言中，甚至在定形的思想观念上得到表现（可以回想一下柏拉图的《会饮篇》）。

精神分析所涉及的全部冲突，对于欧洲现代小资产阶级具有更高程度的代表性。弗洛伊德的“检查”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日常思想观念性的观点，因而当弗洛伊德主义者们将其搬到古希腊人或中世纪农夫的心理中去时，就给人以一种有些可笑的印象。弗洛伊德主义出奇地过高估价性因素，这在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分化背景中也是极其显眼的。

正宗和非正宗意识之间的分裂越是深广，内部语言的动机转移到外部语言中（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在狭小的、广大的社会范围里）——以便在那里成形、显得清晰、巩固——也就越困难。这些动机将会开始衰弱，失去自己的语言面目，并且确实是一点一点地转变成心理中的“异体”。各组有机表现都可能这样被最后逐出口头化了的行为范围，可能成为非社会化了的。人身上的“动物”，人身上的“非社会”的区域就是这样地在扩大着。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类行为领域都能这样完全地脱离语言在思想观念上的定形。其实，也并不是每一个和正宗的思想观念发生矛盾的动机都会退化成模糊不清的内部语言并死亡——它可能和正宗的思想观念发生斗争。这样的动机，

如果它在整个集团的经济现实中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这不是蜕变的单个人的动机，那么在未来它将是社会的动机，这也许是胜利的未来。这样的动机没有任何根据成为非社会的，脱离社会交往的。只不过在开始时它将在小的社会范围里发展，走入地下，但不是走入心理的、被排出的情结的地下，而是走入在政治上健全的地下。一切文化领域中的革命的思想观念正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5. 人类行为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要组织语言联系十分困难，因此这个领域非常容易脱离社会背景，失去自己的思想观念外形，退化到起初的动物状态。这一领域就是性。正宗思想观念的分化首先就反映在人的行为的这一领域里。它成为积聚非社会、反社会力量的中心。

这一私人生活领域最容易成为社会退却的基地。“一对”情人，作为某种社会单元，最容易孤立起来并成为一无所求的小宇宙。

社会处于衰落和瓦解之中的时代全都有一个特点：在生活上和思想观念上过高地估价性，同时又是极端片面地理解性，提到首位的是抽象地看待的性的非社会的方面。性极力要去代替社会。人首先分为男女。所有其他的区分好象都不是本质的。为人理解并为人珍视的是那些可以性化的社会关系。剩余的一切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

现在，弗洛伊德主义风行全欧，这表明正宗的思想观念体系完全瓦解了。结果，“日常思想观念”自行其事，七零八落，没有定形。对于阶级的和社会的评价所依据的每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背景来说，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种现象

和事物也不再井然有序了。每一事物似乎翻转过来，不是它的社会的一面，而是它的性的一面朝着人。艺术或哲学作品的每一个字中都开始露出赤裸裸的性象征；所有其他的方面，首先是每一个字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评价，现代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听不出它们，它们只是成了性基调的泛音。

弗洛伊德主义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和极其有趣的特点——家庭和全部（无一例外）家庭关系（俄狄浦斯情结）的全盘性化。对于家庭——资本主义的基础和堡垒——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人们显然变得一知半解，很少扪心自问。因此家庭就有可能全盘性化，似乎是（我们的“形式主义者们”也许会说）新的理解、“陌生化”。^①俄狄浦斯情结确实是家庭单位的出奇的陌生化。父非一家之主，子非后任；父即母之情夫，子即父之情敌！

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变得无法理解，正是对家庭所作的新的和尖刻的“理解”才把广大读者招引到弗洛伊德主义上来。性欲是显然的和无可争辩的，其余所有的社会的思想观念的评价则是可疑的和可争辩的——它们在这里分庭抗礼。性被宣称为现实、本质之最高标准。而人的精神蜕变越发严重，他就越发敏锐地感到自己身上的“赤裸裸的天然性”、“自发性”。

6、弗洛伊德主义（蜕变者们的心理学）成为欧洲资产阶级最广泛阶层的一股为人们所公认的思潮。对于凡是希望

① “陌生化”——一种语言手法，使一般的和熟悉的事物看起来好象是离奇的和新鲜的。（原注）

了解现代欧洲精神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具有深刻征兆性的、可据以判断的现象。

当前哲学的基本趋势是建立社会和历史的彼岸世界。人智说的“宇宙主义”（斯泰纳），柏格森的“生物主义”，最后我们所分析的弗洛伊德的“精神生物主义”和“性欲主义”——这三大流派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中的每一个流派都按自己的方式效劳于最新哲学的这一趋势。他们以自身来确定现代“Kulturmensch”（“文化人的”）面目：斯泰纳主义者、柏格森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及其信仰和崇拜的三大祭坛：魔力、本能、性欲。凡是在创造性的历史之路被封锁的地方，那里就只剩下一条死胡同：用个人的力量去根除失去意义的生活。

第十章

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 为弗洛伊德主义的强辩

- 1 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 2 Б·贝霍夫斯基的观点
- 3 А·Г·卢里耶的观点
- 4 Б·Д·弗里德曼的观点
- 5 А·Б·扎尔金德的反射学化的弗洛伊德主义
- 6 总结

1.除了各种批判分析之外，大概读者在认真地阅读了本书第二编《弗洛伊德主义阐释》以后，就已经感到这一学说在本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不难感到，弗洛伊德主义的世界观迥然不同地散发出另一种气息、带有另一种色调。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竟然有一些人热心地为弗洛伊德主义强辩。在本书进行初步阐释的头几章里，我们就已经提起过。在此，在本书批判部分的结尾处，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事——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为弗洛

伊德主义所作的强辩进行批判分析。

我们当然不能讨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弗洛伊德主义所发表的“可以接受的”和“善意的”全部言论和意见。这种言论常常带有偶然的性质，阐述不详尽，论证不充分。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同志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声称精神分析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接受，他的这一看法也属于上述这类言论。这些言论，我们就不去讨论了。我们的任务仅限于考察四位作者的文章。我们将考察：

1) Б·贝霍夫斯基的文章：《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方法论基础》，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3年。

2) А·Г·卢里耶的文章：《精神分析，作为一元论心理学体系》，载文集《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莫斯科实验心理学研究所，1925年。

3) Б·且·弗里德曼的文章：《弗洛伊德心理学基本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上。

4) А·Б·扎尔金德的文章：《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红色处女地》杂志，1924年，及其最后一部书《有机体生活和暗示》的相应章节，1927年。

上述文章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弗洛伊德主义辩护，它们的观点发挥得最充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了

这些作者的强辩性论据，我们大体上也就把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替弗洛伊德主义辩护的所有论据考察得相当清楚了。

2.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先分析Б·贝霍夫斯基的文章。

精神分析学说被紧裹在主观主义的外壳里，而且在介绍精神分析时经常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把主观主义的内壳翻转了过来。可是我却极力要剥出精神分析的健全的内核，我想，它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我极力表明，在其方法论前提上和在基本的原则性结论上，精神分析（无意识地）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重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所宣扬的原理。精神分析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使他们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广阔而又牢固的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认为自己又取得了一个胜利。（第176—177页）

这番话是Б·贝霍夫斯基在总结自己对弗洛伊德主义所作的分析时所说的。

他所认为的精神分析“无意识地重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健全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呢？

Б·贝霍夫斯基力图证明，精神分析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客观主义、唯物主义一元论、唯能论，最后是辩证法。

我们现在逐一分析贝霍夫斯基所阐明的弗洛伊德方法论的这些特点。

对弗洛伊德的客观主义方法，贝霍夫斯基提出的论据十

分怪异。我们引用他自己的话：

当你对精神分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你不仅确信它是和反应论一致的，而且也开始怀疑它是否真是主观主义的。主观主义似乎是使本质变得模糊的外壳。事实上，精神分析乃是关于无意识，关于在主观的“自我”的范围之外所发生的某种东西的学说。无意识现实地作用于有机体的反应并经常指导着它们。对无意识，不能通过意识，主观地加以研究。弗洛伊德之所以研究无意识（症状、错误等等）的客观表现，探寻意识（梦、童年）最低限度参与的条件，其原因也就在这里。这一切无疑是反应论所能接受的。（第166页）

贝霍夫斯基的这些论断是和弗洛伊德主义方法论基础本身相矛盾的。弗洛伊德说：“关于无意识，我们只有通过意识才能了解。”“自由联想”的整个方法只有一个目的：将无意识引导到病人的意识。照弗洛伊德的看法，只有具备了一个必要条件，精神分析才能在治疗上取得成功，这个条件就是：病人在他自己的内部经验中看出并承认自己的被排出的情结。”^①如果被排出的情结对病人来说仍然只是外在的客观事实，没有为他获得内心感受的主观真实性，那么它们就不会有任何治疗作用。比如，受伤的肺在爱克司光片上的

① 这一点贝霍夫斯基本人也是很清楚的，在文章的另一个地方，他说：“意识到无意识——这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口号。”如何把这一点同本文所引用的他的论断调和起来呢？（原注）

形象，或者咳嗽过程的生理机制，我们都把它们看作是客观事实（处在主观心理之外）。而无意识，我们只有在内心感受的主观道路上才能遇上它，人本身应该在内部经验中，在心灵底层里摸索它。于是，整个精神分析仅仅是对无意识的内在意识，如此而已。完全不可理解，贝霍夫斯基竟然敢于断言说，“对无意识，不能通过意识，主观地加以研究”？！对于他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研究方法，连弗洛伊德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还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再说，贝霍夫斯基断言弗洛伊德主义研究无意识在症状、错误等中的客观表现，这一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当然，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是从外在的客观现实——错误、身体症状等出发的，但是他所研究的恰恰不是这一客观的物质现实，他对身体症状比如咳嗽的生理机制完全不感兴趣，使他感兴趣的只是它的里面——内在的主观心理。精神分析方法是从症状、错误、梦和所有其它事实出发的，这些事实对它来说似乎失去了客观的、物质的肉体；精神分析同它们的关系好象只是具有替代作用的构成物、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折衷物——因此，好象只是同特定组合的心理力量的关系一样。进入精神分析症状公式的是纯主观心理的因素。

时时处处在寻找唯一的珍珠（被排出的愿望）的精神分析方法，最后是怎样成为对于反应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客观方法的呢——仍然很不清楚。贝霍夫斯基的“论据”最多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论断。别的论据他也是提不出来的。

关于精神分析的第二个特点——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论证，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问题上，贝霍夫斯基的基本论据是，弗洛伊德主义方法造成了心理经无意识到身体的不

断转移（可以这样排列：意识——前意识——无意识——身体）。他援引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性功能不是什么纯心理的，正如它不是什么纯身体的一样。它影响着身体的和心灵的生活”（第164页）。相似的引文可以从弗洛伊德那里摘出不少，但是也可以更多地在他那里找到相反的论点。贝霍夫斯基自己没隔多少行就援引了其中的一个论点。这就是：

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个别的心灵表现是否直接产生于物理的、机体的、物质的作用，如果是，那么研究它们就不是心理学的事情；或者，现象的发生是和其他心理过程相关联的，而在这些过程后面更远的什么地方却隐藏着一系列的机体的原因。我们始终只是把“第二类”的过程称之为心理过程。（第165页）

在这里，在弗洛伊德的这一论断中，一切机体的东西被排斥在心理学之外。精神分析学家只研究纯心理系列，他不涉及其余的东西。可是，因为毕竟允许“在更远的什么地方”有一系列使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机体原因，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典型的心身平行论观点。一般说来，从理论上解决心身相互关系问题时，弗洛伊德本人的立场是模棱两可，而且是故意含糊的。他的与此相关的所有言论全都是矛盾的，不确定的。更经常的是他完全回避这个问题。但没有必要收集这些言论：方法本身以它的实践，以它的工作说明了问题。精神分析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向我们表明过像贝霍夫斯

基所想的那样，身体对心理的作用。精神分析所知道的只是纯心理系列，而身体仅仅是这一心理系列的非独立因素。彻底的精神分析学家如朗克和格罗德克从理论上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地表述了自己方法的这一特点：按照他们的主张，**一切机体都是第二性的**，而第一性的只是心理。这已经纯粹是一元论，但只不过是唯灵论的一元论。

实际上，精神分析在其基础上是一元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的唯灵论一元论。即便是谨慎的弗洛伊德也模棱两可地在心身因果论和心身平行论之间保持平衡，但方法本身却不是这样犹疑不决的：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和不可测知的物质因素，一切都溶解在无止境和摇摆不定的自发的主观心理中。

现在我来谈唯能论。让贝霍夫斯基自己说吧。

精神分析和反应论的一致性并不限于上述所说。这一致性要深刻得多，遍及到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心理过程的唯能论。心理过程的唯能论的认识自始至终贯穿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弗洛伊德那里，唯能论的别称是“经济观点”。可以深信不疑地加以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快乐以某种方法同心灵机构中刺激量的减少、降低或消退相关联，而不满则同它们的升高相关联。关于人所能享受的最本能的快乐，在现实性行为时的快乐的研究使人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因为在这样的快乐过程中，事情涉及到注意心灵刺激量或能量，所以，这种论断我们称之为经济的……我们可以说，心灵

机构的目的是要克服并从它的内外刺激中解放出来。（第166—167页）

这样，在引证弗洛伊德的话的时候，贝霍夫斯基力图证明精神分析是唯能论的。引文确有代表性，但它所证明的却不是贝霍夫斯基所想的。

弗洛伊德的这个“经济观点”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把“能量最低消耗”这个陈旧不堪的原则全盘搬到心理中罢了。然而，应用于主观心理原料，这一原则——它本身就是空洞的，言之无物的——只是成了比喻、词藻，如此而已。这一原则只有用在能够加以精确和客观计量的材料上才能够成为有成效的工作假设。主观心理，脱离了一切物质，当然不能作任何计量，在这里可能作的只是任意的、思想观念上的评价。弗洛伊德的说法正是这种至少是令人怀疑的评价，他厚颜无耻地声称说人所能享受的最本能的快乐是实现性行为时的快乐。

没有一个为精确计量所需要的支点，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唯能论。弗洛伊德理论的特点是在于，它不知道客观的物质刺激；它只知道内在的心理刺激（诚然，弗洛伊德谈到欲望的身体本源，但他没有对它们进行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的整个libido(里比多)理论所利用的仅仅是这种内在刺激。说实在的，只是从刺激开始出现在内在心理舞台上并在这里同已经在场的心理力量相遇之后，弗洛伊德主义才对它感兴趣；至于这刺激是怎么跑到那里的——这已经不使他感兴趣了。欲望(die Triebe)，整个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弗洛伊德将之确定为身体刺激的心理代表。于是弗洛伊德始终一贯

地只同这些代表，只同他们之间的斗争打交道：对母亲的欲望遇上畏怯和羞愧并被排出到无意识，“自我”欲望遇上性欲，对死的欲望遇上“爱罗斯”等等。这样，精神分析就一直处在内在心理的刺激和反应的圈子——感受对感受起反应，感觉对愿望，愿望对感觉起反应，心灵畏怯地对近亲爱恋起反应，迫害躁狂地对同性恋性欲起反应等等。位于外在世界的物质刺激和在有机体身上物质地表现出的刺激始终处在精神分析理论之外。然而，恰恰是这些可计量的因素才是心理学客观方法的支点。

心理能的转变也同样如此：爱变为恨，对一个对象的欲望变为对另一个对象的欲望等等。怎样在数量上测定这个不断转换形式的能呢？要知道，只有测定能量，我们才可能不靠比喻地去谈论唯能论。但是，为此，就必须超出描绘这些转换的主观心理图画，走进物质刺激和反应的客观世界。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断言说，如果这样做，那末也许就是勉强敷衍，而唯能论和经济原则最后证明是正确的。

末了应该指出，经济观点是在外表上添加到弗洛伊德学说上的。弗洛伊德只是顺便地把这个观点引来，它并不触及他的学说的本质。贝霍夫斯基所说的唯能论是精神分析的基础这一断言是错误的。看来，贝霍夫斯基把整个心理动力学归到唯能论上，这当然是完全荒谬的。至于心理动力学，我们在一个地方已经指出过，这完全不是力量的斗争（或许，可以唯能论地进行这种斗争），而是日常思想观念动机的斗争。

最后，谈谈辩证法。

这个问题我们不打算多说。人的一切思维是辩证的，人在内部和外部言语里客观化了的主观心理是辩证的，神话和疯子的谵语是辩证的。不仅如此，蠢话蠢事是辩证的，谎言是辩证的，不由自主地落到辩证法轨道上的，有空话废话和谣言谤语（可以回想一下果戈里的谣言辩证法，它基本上决定着他的极度夸张的怪诞风格的结构）。辩证是一切运动，甚至是人的无聊脑袋里的虚构运动的灵魂。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既然弗洛伊德展开的那幅日常思想观念动力图画结果也是内在地辩证的。然而，这个辩证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所探求的那个自然和历史的物质辩证本身呢？

当然不是！这是反映在头脑里，在思想观念上折射和扭曲了的，某些现实物质力量的辩证。可是，弗洛伊德恰恰没有去揭示这些物质力量；他不考虑他自己的“心理动力”——动机的动力，而不是力量的动力——是思想观念性的，因此就不考虑它是第二性的，特殊地折射和扭曲了的。根本谈不上弗洛伊德学说里有什么唯物主义辩证法，因为这一学说根本没有超出主观心理的范围。

贝霍夫斯基文章的总的缺点（此文和有关弗洛伊德主义的其他的——需要加以分析的——类似东西都有这个缺点）是：没有把精神分析方法本身当作客观事实来看待。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抓住方法本身并且搞清楚，它在做什么，它往哪里去，而不要引用弗洛伊德本人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们在方法问题上偶尔说的和自相矛盾的言论。应该抓住自由联想法并直接提出问题：在这一方法中自我观察起什么作用，客观观察又起什么作用？这种直接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问题恐怕不是难于回答的。然而，无论是贝霍夫斯基，还是其他一些

替弗洛伊德主义作强辩的人都没有对方法本身这样直接地提出问题，他们宁可去搜罗宣言式的引文和摘录。

我们对贝霍夫斯基文章的分析就到此为止。他那关于弗洛伊德主义无意识地重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论题还是没有得到论证。这种无意识看来不会导致意识。

3. 现在来看看A·P·卢里耶的文章《精神分析，作为一元论心理学体系》。

这就是卢里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看法：

他说：“精神分析在把关于心理现象的学说搬到完全是另一个范围里，即关于整个人体中的有机过程的学说里时，它就同旧心理学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彻底决裂（和关于人的反应和反射学说一起），奠定了对整体个性的心理持肯定态度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心理学的牢固基础。

心理分析正是以此回答了摆在现代心理学和时代的最伟大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面前的第一个课题：唯物主义地对待整体个性及其心理动力的课题。

精神分析对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次迈出了二大步：确立诸种个别心理功能的复合性和把整个心理引进到器官及其受生理制约的活动的一般系统中。”（第79、80页）

弗洛伊德主义是整体个性心理学，卢里耶通篇文章之令人振奋，就在于这一论断。

这位作者认为经验论心理学的主要缺点正是在于心理原子论，在于不善于对待整体个性。他说，“由于不可能沿着‘科学地解释’心理现象这条道路走，实验心理学便把自己

的材料分解成细小的、孤立的单位——‘原子’，并对这些假定的心理‘元素’单独地进行研究。实验心理学走的就是这条路。”（第53页）

精神分析，依卢里耶之见，也就是对此所作的反应。

与正宗的“原子化”心理学相反，精神分析一下子，从第一步起，就从个性问题开始；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研究整体个性和形成个性行为的那些机制。（第58页）

接着，卢里耶指出，研究整体个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个性看作“是不可分割的和积极的历史因素。”

这就是卢里耶的观点。

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确实要求研究整体个性并为这一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也只有它一个提供这些基础）。

然而，我们知道，“整体个性”的思想完全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主义的财产，特别强调“整体个性”并把它提到首位也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我们知道，“整体个性”的思想是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谢林的同一哲学、费希特的学说）的顶点，最后也是浪漫派的纲领性口号。可是在哲学史上整体个性的思想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表现得最彻底。单子是封闭的，独立自在的，同时又反映整个世界，使它归于自己的内在统一。能否找到整体个性思想的更彻底的体现呢？何况，可以说，没有也不曾有过一种不把这个整体

个性思想提到首位的反历史的和反社会的世界观。

这样，这个思想就是把双刃刀：对它要格外谨慎小心。马克思主义从未讲过整体个性，从未只是一般地谈个性而不加上特别的和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它高度辩证地运用这些概念。

在这里，基本的危险是，整体个性通常是以把它孤立起来和简单化这个代价换来的。把个性从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并封闭起来，个性就是这样被确定的。个性最后就不是客观的历史因素，而是主观的统一体、独立自在的感受世界的一个中心。这样的“整体个性”当然比实验心理学的心理原子论离马克思主义更远。

马克思主义对整体个性研究的要求决不是要求特殊地、独立地研究，象个人主义、浪漫主义或者比如现代差异（结构）心理学（威廉·斯泰纳及其学派）所提出的那样；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仅仅是他的基本要求的一个部分，他要求在个性研究中坚持辩证一元论。这一基本的方法要求，我们可以这样发挥：在个性中没有绝对孤立的因素——一切都是相互联系，一切都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个性本身也不是孤立的，它本身也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就像没有孤立的心理元素一样，也没有孤立的个性。这两个论断同样都是正确的：个性是整体的（对于孤立的因素而言），个性不是整体的（对于周围的存在而言，个性就是这一存在所不可分离的一个因素）。

但是，这一辩证一元论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得以贯彻，这个条件就是在个性问题上纯粹地、不带杂质地坚持客观主义。理解和确定个性的方法应该同理解和确定它周围物

质世界的方法一样。进入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及其行为的公式中的因素，应该和进入关于它周围的社会历史和自然现实的公式中的因素一样。

弗洛伊德主义的整体个性心理学是否满足这个条件呢？一点也没有！

无意识比唯心主义心理学的意识更多更好地促进这一倾向：把个性孤立和封闭起来，把个性生活驱赶到主观心理自我消退的狭小和没有出路的圈子里。个性有它自己的小历史、小自然，分解成若干内部人物（“自我”、“自我理想”、“伊底”），并成为独立自在的小宇宙。

卢里耶的论据，说得确切些是从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们那里引来塞满他整篇文章的引文，不能改变这里的任何一点东西。可以同意卢里耶对经验心理学的指责，即指责心理原子论。但是，弗洛伊德是用哪些因素来建立他的整体个性的呢？同样是用经验心理学的那些“原子”：观念、感情、愿望。引进无意识丝毫也没有使事情发生变化。其实，一般说来“无意识”概念比经验心理学的“意识”概念更主观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是否象卢里耶说的那样果真是把心理引进到有机体系统中去了呢？他是否相反地把物质的有机物引进到了心理系统中去了呢？

正确的当然是后者。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有机体是第二性的现象。把性感带学说描绘成客观生理学理论是根本错误的。按照这一理论，恰恰是身体被引进到个性的心理系统中，而不是相反；当然，不是作为客观的外在身体，而是作为身体的感受，作为内在的欲望、愿望和观念的总和，可

以说——是作为内在的身体。

企图把客观的性质强加到精神分析的“欲望”概念上去是完全错误的。

卢里耶说：“欲望，对于精神分析来说，不是纯粹心理学方面的概念，而是更宽泛些——是心身之间的边界概念，是生理学概念。”

当然，没有一个生理学家会同意象身心边界这样的古怪的生理定义，甚至活力论者杜里舒也不会同意的。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主观心理和客观物质之间的边界概念。因为在经验里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向我们揭示这样的独特的混合种。这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唯灵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之一。

这样，没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它能把整体个性归附于周围的物质自然现实中）会进入到精神分析的整体个性公式中去。把它归附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历史过程中，情况也不会更好些，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客观的、历史的构成物（家庭、部族、国家、教会等等）都被弗洛伊德从同样那些主观的心理根源里抽了出去，它们的存在还是限于那种内在主观力量游戏（权力是自我理想，社会团结是在共同的自我理想之下的互相认同，资本主义是肛门性欲的升华等等）。

在作小结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作为整体个性心理学，弗洛伊德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是这一个性的孤立和封闭公式，是个性主观感受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中的客观行为的公式。

4.我们现在简单地考察一下Б·Д·弗里德曼的文章。

在他的文章里重心转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另外几个方面：对于他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观念形成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思想观念形成的观点，作者是这样表述的：

人类活动动机或根源的不正确的反映的体系就是思想观念。（第145页）

稍后，在援引恩格斯的话来加以证实之后，作者接着说：

因为任何活动都是借助于思维来进行的，由于推动人从事活动的一切都是通过他的头脑，所以思维被看作是动机的根源。‘思想观念’的错误是它容许思维（‘意识’）独立于其他现象，因此它也就不探究这些现象。这里的全部问题在于，真正的动力、动机对‘思想观念’来说依然是隐蔽的。

作者断言，马克思主义对思想观念形成的这个观点和弗洛伊德对同一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说：“从弗洛伊德学说的观点看，‘思想观念’的起源方式要用理性化机制来解释，因为任何理性体系的形成过程都是由这一机制所决定的。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我们已经指出，其目的是用更崇高的、‘理想的’、出自于最初似乎是‘意识’的动机去掩盖意图的真正动机。意图的真实根源对个性来说依然是没有觉察到的，这种情形要用这一过程和无

意识体系的联系来解释。形成‘体系’或理性化的条件就是必须逃避指责，逃避出自于‘意识’方面的一定倾向：为什么必定要替它们辩护。”

按照弗里德曼的意见，对于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是相同的，但它们研究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因此而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观念现象的根源，而弗洛伊德则是研究方式本身、它们形成的心理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意识”看作是历史进程，即社会中各种“愿望”（利益）的斗争的产物和反映。弗洛伊德学说解释了下面的问题：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下，人们“头脑”中愿望的形成和愿望斗争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第152页）

确实，在思想观念形成机制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之间在外表上有着大致相似的地方。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相似：讽刺性摹拟作品同原作总是如此地相似。

事实上，对弗洛伊德主义来说，思想观念也是上层建筑，可是这一上层建筑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是无意识，即被排出的主观欲望，主要是性欲。这就是精神分析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那个东西！在弗洛伊德看来，整座文化大厦就是耸立在被排出的欲望这个特别的基础上。不仅如此，对于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本身——经济——也只是矗立在那个主观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比如，我们所举的弗洛伊德主义的资本主义定义）。在弗洛伊德主

义那里，与使思想观念扭曲的阶级斗争相符的，是意识同无意识的斗争。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像讽刺性摹拟作品吗？

思想观念形成机制本身被精神分析塞进个体主观心理的狭隘范围里，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一机制是社会性的和客观性的：它必须以个体在经济上组织起来的集体内的相互作用为前提。因此，无论是生理学还是心理学都不能揭示思想观念形成这个复杂的客观过程；在这方面，主观心理学是最无能为力的。我们已经谈到，甚至关于人最简单的言谈（它的口头反应）也不能放到个体的框架里。

再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使思想观念扭曲的因素决不是主观心理：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不仅最高表现形式的意识，而且一切主观心理，一切以人自己的内部经验形式为着人而出现的东西都是思想观念性的；这一内部经验的语言本身是思想观念性的。使思想观念扭曲的因素具有社会的、阶级的性质，而完全不是个体心理的性质，思想观念的隐秘动机——客观的社会经济力量，当然不在思想家的意识之外，但是完全不在他的无意识里。

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观念学说其精神本身与马克思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弗洛伊德通体有股典型小资产阶级市井之徒的味道，那就是：揭露“崇高”和“理想”的办法是把它们贬为卑鄙的“动物”。弗洛伊德主义中的特殊之处就是，这一卑鄙的动物因素被说成是全能的、超时空的无意识世界，即纯粹是从唯灵论方面被理解的。不过，在这里弗洛伊德主义并非是孤家寡人：还有唯灵论虚无主义（或者称唯灵论犬儒主义）——现代资产阶级的特有现象。敌视理性和文化形态的柏格森唯灵论的“生命冲动”学说，以及它对本能·

的赞美在本质上都有好多虚无主义的东西。正是这种实质上是唯灵论的虚无主义揭露精神才使得弗洛伊德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圈子里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对“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公式的理解与这种唯灵论虚无主义犹如天壤之别。

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观念形成机制（我们知道，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一机制也形成梦和神经机能病症）是主观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和唯灵论的。这是孤立地、独立自在地、主观地根除生活的机制。它完全不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的阶级斗争机制，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机制决定意识在思想观念上是如何折射存在的。

文章作者认为，为了决定意识，存在就需要有弗洛伊德主义的机制，这一论题是经不起批判的。

5.现在只剩下考察 A·S·扎尔金德的立场了。扎尔金德企图用反射学来解释弗洛伊德主义，他的这个观点是相当典型的。反射学的科学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无可怀疑的。可以看到，许多人认为，反射学应当成为考验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一切心理学理论的试金石。

关于反射学，在这里必须说几句。反射学方法的巨大科学价值，当然是无须争辩的。但是，这一方法的应用范围远非象某些反射学家所想的那么广：这是诸种生理学方法中的一个方法，是统一的生理学方法诸多分支中的一个分支，如此而已。**反射学方法的基本概念决定着具体的实验方法**，这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没有这种细心和耐心，极其缓慢然而又是正确的具体实验方法，反射学方法就成为

空洞的反射学的辞藻。运用反射学方法，这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实验课题，为此就要求大量工作，花大量时间。运用这种方法，如蜗牛爬行，然而这一步一步是对头的。但是当反射学的基本概念（条件反射，抑制等）不再用于实验，而开始用于世界观之类什么的，当它们纯粹是投机取巧地转到不能进行实验加工的领域里时，这些概念就失去任何科学价值，这样的反射学也就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脱离具体实验方法，反射学的一套概念就变成言之无物、任人随心使用的东西。例如，为什么不可以从反射学角度阐释康德学说：康德的*a priori*——这是无条件反射，*a posteriori*——是条件反射等等。这样一来，从反射学方面也可以证明康德是正确的了。诸如此类的主意之荒谬，任何人都是清楚的。然而，我们却并不以为，译成反射学或任何纯心理学理论的语言就是件比较有成效的工作。

还是来谈谈扎尔金德吧。他是怎么把弗洛伊德主义加以“反射学化”的？在现有一些理论的相反两极上把弗洛伊德主义和反射学联结在一起，结果弗洛伊德主义还剩下什么，反射学还剩下什么呢？

扎尔金德首先就放弃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

大多数人——A·Б·扎尔金德写道（大多数是指广大读者）——深信，弗洛伊德主义的“灵魂”精髓是他的性理论，对它进行批判就从根本上置整个弗洛伊德主义于死地。……而事实上，现在猛烈席卷整个心理一生理学的弗洛伊德主义，它的真正核心完全不在性欲理论。

(《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第165页)

我们应当首先指出，这大多数人中也有弗洛伊德和所有正统的和彻底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没有性“灵魂”的弗洛伊德主义就已经完全不是弗洛伊德主义了。

接着扎尔金德又用反射学方法（不是在它的实验应用上，而是在它的辞藻应用上）把弗洛伊德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清除出去。

反射学方法拯救了我们。它的纯客观主义和生物学一元论砍倒弗洛伊德学说大厦周围的形而上学树林，把真正的，而不是被歪曲的弗洛伊德主义的经久不变的唯物主义本质显露了出来。

扎尔金德是这样把弗洛伊德的满足原则译成反射学语言的。

应该把满足原则理解为生理学基础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既是和有机体能量的最低消耗相联系的，又是沿着内部反抗最少的方向积聚和显露出来的。换言之，这是有机体的先天的、遗传的定势（无条件反射），也是获得的、它个人的经验的变体，这些变体直接地和最早地在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生成，为了生成就要求最低限度地消耗能量。这种早期的和最易形成的东西，当然就是幼儿的（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幼稚型的”）动作反应，这些动作

反应一般是在成人（父母，兄弟等）想方设法协助，不使机体能量多余地消耗在集中注意（专注反射）、确定方向（定向反射）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第171页）

排出机制也被用类似的方法反射学化了。当然，~~排出~~后只是成了抑制。

精神分析学家有一个基本概念，他们的后来的结构全都建立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的，这就是“排出”，它是一个反射学的概念。反射学家称之为抑制。有机体的反射活动就是显现或形成一些反射，抑制（排出、排挤）或消退其他一些反射。各种反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互相竞争着，他们中的一个（或一批）靠排挤（抑制）其他反射而取胜，而胜利是由其他反射周围高度生理学紧张的积聚（照巴甫洛夫的说法，最宜刺激源）所决定的，当然，取胜的完全不是最合目的的反射。狗对怪诞的声音信号的食物反射有什么合目的性？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反射取胜了，成了现实的、突出在前，其他的被抑制、被排挤了。对精神分析学家也可以这么说。当把反射排挤掉的那些刺激的抑制作用减弱时，被排挤的、被排出的反射可以在某种新的刺激作用下重新显现，“突破”出来。而在此之前它就处于潜在的、被抑制的状态，处在现实的、反射的区域阴处，或者，用旧主观主义的话来说，处在意识的阴处，处在下意识中。于是，我们一看，就

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发现了完全是条件反射学说里的概念。

(A·B·扎尔金德：《有机体生活和暗示》)

(国家出版社，1927年，第58页)

弗洛伊德那里的复杂的做梦和暗示机制（弗洛伊德用好几页的篇幅来分析这机制），在反射学化时成了十分简单的机制，扎尔金德叙述它，确实只用了三言两语：

做梦、暗示因素机制的分析同样得到了反射学的解释。

在梦中，外在刺激——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常常具有抑制作用——活动中止，而这一外在的平静本身又是抑制解除方面的刺激。

(文载《红色处女地》，1924年第4期，第175页)

在把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机制反射学化以后，精神分析的中心概念——无意识概念——当然成了完全多余的。

这样，下意识地独立存在，下意识地脱离其他反射而孤立，下意识地服从特殊规律，弗洛伊德的这些断言也就是没有根据的了。我们所了解的精神分析学家的“下意识”，是整个反射的一个暂时被抑制的部分，如此而已。丝毫也没有偏离反射学说。

(《有机体生活》，第59页)

在把弗洛伊德主义反射学化以后，扎尔金德采用算术的反验方法——把反射学弗洛伊德主义化（应用在狗的身上，弗洛伊德的机制显得十分特别）。

在这一意义上，巴甫洛夫用狗作的实验十分有趣（当然，弗洛伊德完全没有打算从实验者这方面来解释这些经验），由于一系列长期的强性组织的（光的、声的或痛的）刺激，狗失去了反应能力，它虽然已经饿了好长时间，但在端给它香喷喷的肉末时，如果这时没有相应的条件“信号”（声、光等），它就不会有像平时那样起、抓、捕、流涎和其他的反射。当然，在起初对这一新的刺激产生强性抑制（“满足原则的抗议”）：狗扑向肉末，流出口涎等等——但在送食时必定事先相应地发信号（“现实原则”）。没有得到“许可”，没有条件信号，在生物化学上它就“无力”吃（无唾液和其他液），没有“胃口”，“不想”吃。

（第173页，文载《红色处女地》）

现在要问，在扎尔金德动了这些手术以后，弗洛伊德主义还剩下什么？

是没有无意识范畴，没有性欲说，没有欲望论，从而也没有无意识的内容；没有俄狄浦斯情结，没有去势情结等等；没有梦的解析，没有自我和伊底的弗洛伊德主义，一言以蔽之，没有弗洛伊德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这就是反射

学化的结果。

反射学方法剩下了什么呢？

三个言之无物的概念：无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抑制，即剩下了反射学的 *facon de parler*，但完全不是反射学了。

就这样，既无弗洛伊德主义，又无反射学！

扎尔金德立场的基本错误是，他把另一种理论反射学化了（一般说来，不能把一种理论译成其他一种理论的语言）。反射学方法不可以应用另一种理论，但可以应用于事实，应用于物质现象；而应用于事实，这就意味着使这一事实的研究服从于一定的实验方法。

但是，一般说来，对弗洛伊德加以理论化的人类行为事实，是否能运用反射学方法呢？

不，不能运用。反射学方法，作为纯生物学的方法，只能把握抽象出来的人类行为成分（组成部分），但是这个行为整体，反射学方法是不能加以说明的：因为它不只是生理学上的事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了（参见第八、九章）。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些人类行为冲突不是生理学上的，而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在思想观念上经过折射了的。因此，在我们看来，扎尔金德的基本理论信念是完全错误的，他相信，“人的心理是他的社会存在的生理学反映”

（文载《红色处女地》第163页）。心理的所有主观方面，也就是弗洛伊德所研究的那个方面，是社会存在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生理学反映”这一词组本身，我们觉得在哲学上是荒谬绝伦的，扎尔金德的最后一部书的基本思想是，企图把有机生活中的心理学上的因素解释为条件反射的总和——这在

我们看来是根本错误的。①意识和任何心理因素，应该从其质的特点上来认识，而不应该归之于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机制可以在从纯生物学上理解的单个机体和纯物理环境的范围内展开。在应用于人时，这一机制就是空洞无物的东西。心理的基础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构成物，而心理本身则需要特殊的思想观念的材料；语言、示意姿势等材料。

只有在这种材料中，主观心理才作为客观事实。所有这一切，扎尔金德根本没有考虑过。

属于本书篇幅，我们当然不可能更详细地批判分析扎尔金德的“心理因素”理论，同样也不可能更详细地论证我们对心理所持的观点。我们打算在别处去完成这一工作。但扎尔金德为弗洛伊德主义作的强辩，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已经向我们充分显示出它是毫无根据的。

6. 现在做一下总结。

精神分析是内容广泛、别出心裁、深思熟虑、有机统一的学说，它同现代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基本前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精神分析与瓦解着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血肉相关，我们看到了：它进入到现代欧洲思想的基本轨道上。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为弗洛伊德主义作强辩，他们在毫无指望地连结不可连结的东西时不得不把这有机统一体（即便是病灶）搞得七零八瓣，从中抽出一些个别的因素和动机，尽管它们脱离了整体就变形或失去自己的意义。他们之中的一些

① 参见扎尔金德《有机体生活……》一书第九章：《从反射学说看心理学上的正義》，第43——72页。（原注）

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回避对方法本身的客观分析，而去搜罗弗洛伊德主义者们一些个别的宣言式言论；其他一些人则抓住弗洛伊德主义理论的一些个别因素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外表上的大体相同之处不放；最后，象扎尔金德那样的第三种人用残缺不全的反射学偷换弗洛伊德主义。

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所有方面平心静气地进行客观分析，未必能使人对我们关于这一学说所作的以上的总的评价的正确性有任何怀疑。

附录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

安娜·塔马尔琴科

我们的子孙将会感到惊讶，当他们从我们的文化史家那里得知，巴赫金这位廿世纪俄国文艺理论界的巨擘竟相当费难地被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因一篇颇有几分才气的论述拉伯雷的学位论文）评为低级的**哲学副博士**（他的一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在这次应考前二十年就已经出版了）……

巴赫金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也就不再去力争（和其他人一起）“应考”下一个“级别”——博士。就这样，在学术界，他一直是个可怜巴巴的‘老副’。也许，只是因为这一点，尽管重病在身，他还活到了八十岁！①

这话没有丝毫的夸张。确实，巴赫金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俄国文艺理论家，不仅是文艺理论家，而且也是大思想家，

① H·列平：《作用与备忘》，载《结构》，巴黎，1980年，第7期，第104页。（原注）

他在道德哲学和美学、文化史和语言哲学的领域里都有独到之见，提出了具有长久生命力和行之有效的思想。确实，年愈五十的人，总算是被“授予”了低级学位，可是任何一个研究生，只要他肯耐心坐着，按照“下达的课题”用打字机打出一百五十页的东西都能得到这一学位的。

然而，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的学术道路和生活经历中这远非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离奇事。他一生中尽是诸如此类的离奇事。比如，说一说下面这件事就足够了：他少年时身上多处得了严重的骨髓炎，而且病势逐年加重（结果，在1938年由于这病截去了一条腿），这一沉重和经常的痛苦，在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关头，竟使他免遭更痛苦的灾难。1929年，他被逮捕，判处五年徒刑，要放逐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北方气候恶劣，他自己在体力上既不能应付集中营里的劳动，也不能适应集中营里的生活，这本来是注定他要在磨难中死去的），但他恰恰因为这病才免遭此难。虽然重审案件的要求已经被拒绝，但经妻子和朋友们的奔波，最后根据专门的医生委员会的结论，免除了去北方集中营服刑，改为流放南方，去哈萨克斯坦。

另外，（1930年前出版的四本书中的）三本书不是用他的名字，也不是用他的笔名，而是用他朋友们的名字出的，这难道不离奇吗？要弄清此事真相，就得要做专门研究和找出证据了。倘若这些书和文章是在作者被捕和流放之后出的，那么在当时的俄国谁也都不会感到奇怪的。怎样解释才更合乎情理呢？由于书刊检查制度，真正的作者的名字是不可能出现在刊物上的，但书已写成，在内容上又是“过得过的”。究竟为什么朋友们不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不按稍

“付酬”，让流放者得到这笔稿费呢？①

况且，这在镇压变本加厉，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又是保护著作本身免遭毁灭和遗忘的最好办法！常言谓：“文稿烧不着”，此话只是在抽象的玄学的意义上才是对的，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一上印刷机，印出了一些，即便份数很少，也就算很有保障的了。

可是，巴赫金的这些署名 I·H·梅德韦杰夫 和 B·H·沃洛希诺夫而发表的著作全都与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年）一书同时或比该书更早出版。这已经不只是离奇了，而且是个谜，是个秘密，要得到无可争议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可能的仅仅是推测和猜想而已，或许多少能猜出七八成。

为了把所有这些事的生活内幕揭出来（哪怕是揭出一部分），就得从头到尾地叙述巴赫金的生活道路。何况，这样做也是很适时的，因为目前只有一篇十多年前写的关于他的《生平和活动简述》②，其中词意未尽和叙述不详之处颇多，可话又得说回来，这也不全是作者们的过错。同时，自

① 从“与世界主义作斗争”时起直至斯大林逝世，以别人的名字写剧本、小说、文章，尤其是学位论文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是失业的“世界主义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件“各分一半”的事，除了在成功时还有笔职业和经济上的“捧场费”以外，直到目前还保留着准备论文时的脑力劳动“黑市”，这种“黑市”是一般“黑市”中的一种。（原注）

② B·科日诺夫、C·孔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生平和活动简述》，载《诗学和文学史问题》论文集，萨兰斯克，1973年，第5—15页。（简述的基本部分——1945年前的M·M·巴赫金传记，由B·科日诺夫撰写）。（原注）

那以后甚至在刊物上也登出了不少材料和报道，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弄清和解释他一生中的某些事。

这些年也公布了自1919年起巴赫金本人在不同年代所写的著作中的许多从前难于得到的材料。这就使我们更有证据判断他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以其他人名字发表的著作的写作。

二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于1895年11月17日出生在奥勒尔城。虽然他父亲是个普通银行职员，但先祖却是很古老的、在十四世纪就已起家的贵族。在上一世纪末，俄国知识界中就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贵族出身的平民”，他们当然是具有结构最佳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

在巴赫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家居住在维尔纽斯，后来迁居敖德萨。1913年他在那里中学毕业，进入诺沃罗西斯克大学（今敖德萨大学），不久又转入彼得堡大学。

1918年在彼得堡大学历史哲学系毕业之后，巴赫金来到涅维尔，在不久前的一所普通中学，而现在的统一劳动学校里任文学教师。在白俄罗斯边界这座小城度过的二年（1918—1920）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环，因为正是在这里有了第一次组成小团体的朋友，他们后来结为终身的好友。在经常的对话和知识交流中每个人都形成了独自的（而不是现成接受过来的）世界观和创造性的治学态度，诸如此类的频繁紧张的思想交往形成了比血缘关系更为牢固的精神上的亲密关系，虽然它不要求思想完全一致。

具有创造性思维的青年们在这样的小组中完成了自己的教育（就此词的本源和本意而言）。这种类型的小组是俄国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之一。这一传统发端于上一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大学和大学之外小组，也许是在更早的十八世纪大学附属寄宿中学或是 H·诺维科夫和 A·库图佐夫共济会小组里形成的思想上的友谊。

在国内战争的大饥荒和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在涅维尔同时出现了一小批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在首都或德国的一些大学和音乐学院里才受过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为了“大辩论和晚间的交谈”——谈人生、谈艺术、谈哲学和道德价值——他们怎么能不相遇、不结交呢？

这是巴赫金在涅维尔生活的第一年的事。除巴赫金之外，那里还有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列夫·瓦西里耶维奇·蓬皮扬斯基（1891—1940）和知识十分渊博的年轻哲学家和新康德主义者马特维·伊萨耶维奇·卡甘（1886—1937）。在这三人周围还聚集了一些人，组成一个称之为“康德研讨小组”的联谊会。参加的人还有玛丽亚·韦尼阿米诺芙娜·尤金娜（1891—1970），她后来成为负有盛名的钢琴家；瓦连京·尼古拉耶维奇·沃洛希诺夫（1893—1936），他是音乐学家和诗人，后来也还从事心理学和语言问题研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祖巴金（1894—1937）——即兴诗人和雕塑家。我们只是举了一些后来较有名望的小组成员。看来，参加涅维尔的“康德研讨小组”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但他们的名字目前尚未查明。

小组成员的积极性远远超出了小组本身的范围。成员们是文化的（哲学的和艺术的）积极传播者：例如，卡甘负责美学

研究小组；祖巴金负责自我教育和艺术伦理；巴赫金主持艺术讲座，后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文艺班”。当地报纸《大锤》曾报道说，“文艺班招收十四岁以上的必须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男女公民”。^①这些朋友们还参加学术辩论。当时全国所有大小城市都经常举行这种辩论，这在我们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多次得到反映。例如，蓬皮扬斯基和巴赫金不仅去听，而且还在“上帝和社会主义”学术辩论会上发了言（他们俩人都赞成宗教）。^②

小组的思想活动十分活跃，到小组成立一周年时竟出版了一日文集《艺术节》，所注日期是1919年9月13日。巴赫金在文集中刊登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艺术与责任》（可能是他在“康德研讨小组”里的一次发言，后整理成文）。一日文集是对小组成立以来情况的总结：大约在这时，大多数成员各奔东西，到其他一些更大的城市里去寻找范围更广的活动或者去完成学业。

尤金娜第一个到彼得格勒，在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到维捷布斯克去的有蓬皮扬斯基，半年之后沃洛希诺夫也去了，祖巴金也到了那里，后来他又去斯摩棱斯克，在考古学院工作，卡甘不久之后也走了，先是到彼得格勒，在犹太大学讲课，后又到奥勒尔，指望在刚成立的（一年后关闭）奥勒尔大学里找到个长期工作。一年之后，1920年秋，巴赫金也去维捷布斯克了。

① M·M·巴赫金、M·И·卡甘，（根据家庭档案材料）K·涅维尔斯卡娅发表的，《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莫斯科，1979年；巴黎，1981年，第273页。（原注）

② 《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74页。（原注）

就哲学观点而言，这些年月的特征是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看来，马特维·伊萨耶维奇·卡甘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不但在年龄上，而且在专业经验上，他都是小组中的长者。在返回涅维尔（他也是在这里出生的）时，他已是三十岁的人了；他已经在马尔堡大学师从科根完成学业（1914），还在两三所德国大学里学习过（其中，也曾受业于纳托尔普），用德文发表了二篇新康德主义的论文，甚至准备了长达十五印张的专著，只因手稿遗失而未能问世。^①

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涅维尔小组是研究新康德主义的。例如，众所周知，1919年在维捷布斯克音乐学院，蓬皮扬斯基除了讲授其他课程以外还主持——已经是正式的——“康德研讨小组”。二十年代在列宁格勒的涅维尔和维捷布斯克友人聚会也取此名，他们保持和发扬了“涅维尔光荣传统：一杯浓茶便谈到天亮”^②——互相讨论新作，无休止地争论人生和理论的根本问题，虽然康德主义的主要人物卡甘已离开他们，他居住在莫斯科，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工作。

证明巴赫金受过新康德主义熏染的，还有他自己的从那时起保存下来的著作，比如他的长篇论文《语言艺术创作中的内容、素材和形式问题》。^③在分类学任务，按照“方

① 关于M·И·卡甘生平和活动的更详尽材料，参见：М·М·巴赫金、М·И·卡甘，（根据家庭档案材料）К·涅维尔斯卡娅发表的，《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749—281页。我们从中吸取了许多关于巴赫金的，在B·科日诺夫和C·孔金的《……简述》中没有提到的重要资料。（原注）

② В·Н·沃洛希诺夫给M·И·卡甘的信（1921年秋）。载《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73页。（原注）

③ М·巴赫金：《文学和美学问题》，莫斯科，1975年，第6—71页。（原注）

法”明确区分科学学科等方面都有一股很浓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二十年代中期巴赫金的这篇文章和其后的著作还没有独到的见地。我们是说，这些著作完全是独具匠心的，至今也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但对于巴赫金本人来说它们仅仅是形成独自的、完整的世界观的途径和手段。然而，与此同时，有机地并永远地进入他的完整的世界观里的，是对待生活和文化的一切现象的价值态度（价值说态度），诚然，已经是改造过了的，——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精神。

可是，“康德研讨小组”全体成员共同遵循的新康德主义方针（它对确立思维分类和学科是极其有益的）根本不要求在自我确定专业以及在一般世界观方面完全取得一致。

卡甘对犹太文化及其在革命后的俄国命运问题甚为关注，①尤金娜1919年受了洗礼，并且至死也从未隐瞒过自己的宗教信念，——甚至在最严峻的岁月里也是如此；自涅维尔时期起始终忠于东正教会的还有蓬皮扬斯基，祖巴金热衷于通灵术②，沃洛希诺夫比其他人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是，精神志向有着深刻的共同性；另一方面是，创造性探索各有各的方向；在这二方面如此结合之中形成了对话的习惯，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对话就是争论，而争

① M·И·卡甘在涅维尔凡所犹太学校里任教，组织过犹太学校师资培训班（一年制）；1913—1923年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犹太大学讲课。他的著作《犹太和文化危机》（至今未发表）也是当时所撰的。参见：《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74—275页。（原注）

② 通灵术：一种神秘论，宣扬超自然的灵物的存在，并认为少数人能与之心灵相通。（译者注）

论之中出真理。蓬皮扬斯基（已经是在1926年，从列宁格勒）写信给卡甘谈到巴赫金圈子里友人交往的气氛：

……自己观点的深化与严肃的、思考再三的忍耐性并不矛盾，这种耐性的基础是尊重思想、尊重思想劳动、尊重思想者的个性。①

在每个时期，巴赫金的同仁们都始终在促进着这种富有成效的思想交流，即思想的公开对话。尽管交往的圈子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主要是圈子扩大了，因为涅维尔和维捷布斯克“小组”成员们虽各奔东西但没有退出圈子，他们天各一方，长期以来靠书信往来，却仍然密切关注着友人的命运和思想。

向维捷布斯克的转移扩大了交往圈，同样也发挥了巴赫金的研究能力。当时城里有音乐学院、艺术学校、人民教育高等学校、无产阶级大学。有《艺术》杂志。除了涅维尔的友人（蓬皮扬斯基和沃洛希诺夫）之外，进入友好交往圈的还有一些新人：年轻的伊凡·伊凡诺维奇·索列尔京斯基（1902—1944），他后来成为著名的音乐学家、戏剧史家，自1936年起任列宁格勒音乐协会艺术指导；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892—1938），他在那几年里担任维捷布斯克市执委主席并执教于无产阶级大学，后来成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是布洛克档案的第一批行家之一，发表了布洛克的笔记和戏剧作品创作史资料。

① П. В. 蓬皮扬斯基给 М. И. 卡甘的信（1926）。《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66页。（原注）

巴赫金在维捷布斯克同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奥库洛维奇(1901—1971)结婚。五十年间，她不仅是一个与丈夫相亲相爱的妻子，而且在丈夫竭尽劳苦的生活和活动中，不论多么艰难坎坷，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助手和志同道合者。

维捷布斯克年轻思想家小组的活动，从全体成员在一起的时间来看，也是十分短暂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了彼得格勒，因为那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学术活动、出版事业和日常生活很快就正常了起来。蓬皮扬斯基和索列尔京斯基在¹921年也先后到了那里，次年是梅德韦杰夫，最后沃洛霍夫也去了。这样，到1922年底，在维捷布斯克只剩下巴赫金自己，他由于健康原因很难在彼得格勒找到合适的工作。问题是在维捷布斯克时期，他的慢性病（还是在少年时代就得的全身性骨髓炎）正在恶化，染上伤寒之后，骨髓炎更加严重，在1921年他就已多次卧床不起，甚至进医院动手术：

“在维捷布斯克，我是倒霉透了”，他在这年年初写信到莫斯科告诉卡甘说，“——我几乎一直都躺在床上，真想早早离开这里。”①但他不得不在维捷布斯克又呆了三年半。1923年，终于因病成残，只得放弃作息严格、活动频繁的长期工作。

然而正是由于这病，在维捷布斯克的最后几年里他呕心沥血，争分夺秒地研究了涉及范围很广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是在小组活动时期，在他对生活和语言艺术作哲学思考时就产生的：

“现在，我利用不得已的闲暇时间对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尤其是美学和心理学”。②在1921年3月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

① 《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57页。（原注）

是就在那年秋天他告诉同一个人说，他又在研究另一个问题了：“在生病期间，我很难工作，可是早在乡下我就开始搞一个选题，《道德的主体和法权的主体》，现在打算继续搞下去。这一选题我希望能最近圆满完成，它会使我建立我的道德哲学。”^②

但是，这一课题的难处在于严格区分道德和法权的界限，于是巴赫金又一次改变选题，在1922年就已经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研究。

我现在正写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希望能尽早完成，那篇《道德的主体和法权的主体》暂时搁下。^③

看来，早在维捷布斯克他就开始，也许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语言艺术创作美学的长篇论著。

同时研究几个涉及哲学和一般人文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这是学识广博的独特表现）已经在那时就在巴赫金的学术研究方法中确定了下来。他经常在人文学科的交叉点上进行研究，因此他往往必须“顺便”掌握这一或那一交叉领域的（根据当时的水平）知识。

三

1924年年底，巴赫金才得以回列宁格勒。他在国家出版

① 同上注。第260页。（原注）

② 《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62页。（着重号本文作者所加）。（原注）

③ 同上。第263页。（原注）

社找到了编外的（也许是合同的）工作，并在著名的艺术史研究所（伊萨基耶夫斯基街上的祖布科夫旧居）谋得某个“职务”。这个研究所当时已成为艺术理论思想的摇篮和“形式主义学派”以及这一学派最有才华的代表人物的支柱。

巴赫金来到列宁格勒后，长达数小时的聚会、阅读新作和彻夜的争论又重新开始了。确实，成员和聚会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除涅维尔和维捷布斯克旧友（尤金娜、蓬皮扬斯基、祖巴金、索列尔京斯基、梅德韦杰夫）之外，“康德研讨小组”里又出现了新的成员或常客，他们是一些学者和作家：东方学家米哈伊尔·伊兹赖列维奇·图比扬斯基（1893—1943）；生物学家伊凡·伊凡诺维奇·卡纳耶夫（现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诗人尼古拉·安列克谢耶维奇·克柳夫（1887—1937）；诗人和散文家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瓦吉诺夫（1899—1934）等等。交往的特点转向纵情欢乐和举办“游艺活动”。对于这一代从事艺术和科学活动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许这是最顺利的年月。但是好景不长。似乎是预感到压力和灾难即将来临，他们急不可待地及时行乐，嬉笑玩耍，抽彩游戏，你开我的玩笑，我开你的玩笑。不仅在文学界里如此作乐，而且在文学作品里也是如此反映。

Б·科日诺夫说得对：

这次人所特有的“狂欢”气氛在康斯坦丁·瓦吉诺夫的长篇小说《山羊之歌》（列宁格勒，1928）和《斯维斯托诺夫的事业和生活》（列宁格勒，1929）中得到了反映；顺便说一说，在这

些长篇小说里，以捷普捷尔金和库库之名塑造了Л·В·蓬皮扬斯基的讽刺性的摹拟形象。①

除此以外，在小说的第二个主要人物（无名诗人）的身上也完全可以看出诗人瓦吉诺夫本人的某些特征，在他身上还有祖巴金（诗人兼作曲家、雕塑家和神秘论者）、诗人沃洛希诺夫（比如，他总想在官方思想体系中寻找合理的内核，在新制度里寻找真理和正义）的某些影子。这是一位不被人承认的，然而却是真正的诗人代表的形象，这位诗人所处的文化环境是注定要消亡的。作者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两个人物，虽然他们无所顾忌地狂欢作乐和冷嘲热讽。这些形象富有喜剧性，他们命途多舛，毫无疑问，这本身又充满了悲剧性：他们的毁灭乃是文化和崇高精神的真正价值的毁灭。

也可以猜到其他一些（次要的）人物的原型，作者并不喜欢他们，他以极其犀利的笔触描写了这些人。例如，在米沙·科季科夫身上可以看出Д·И·梅德韦杰夫的某些特征，尽管这一形象写得更细致，故意地写得“隐秘”。

应该说，知识界热衷于狂欢和玩乐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特征”。例如，1923至1928年间由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Д·М·安德里耶夫斯基（女诗人М·М·什卡普斯卡娅的兄弟）指导的一个学生青年小组在活动，与小组所有成员的外号（假名）相对应，小组的浑名是“宇宙科学院”。《山羊之歌》中的一个人物（“哲学家安列克谢·安德里耶夫斯

① 《诗学和文学史问题》论文集第7页。（原注）

基”）取用同名可能并非出于偶然。

1928至1929年，在巴赫金及其友人的生活中是条分界线。那时，这小组的成员几乎都在表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27至1929年，蓬皮扬斯基和索列尔京斯基发表了首批大作（前者在秋切夫文集和《十八世纪》一书里；后者在《舞蹈书简》一书和《论戏剧》文集里）。1928年，祖巴金出版了唯一的一本诗集《林荫道上的熊》，瓦吉诺夫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山羊之歌》。与巴赫金直接相关的著作有：沃洛希诺夫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1927）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最后，1929年巴赫金以他自己的名字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不论是在列宁格勒的所有旧派文人的生活中，还是对巴赫金及其友人们来说，这两年都是转折关头。当有人根据莫斯科指示在列宁格勒开始制造学院知识分子案件和其他一系列不太重要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案件时，巴赫金周围的一些人也开始遭到逮捕。1929年，大约是春天，巴赫金自己被逮捕并受到审讯；当时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炮制了一批侦破“案件”的计划，逮捕和审讯巴赫金是根据其中的哪一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大概是拼凑了一桩“专案”，正象“宇宙科学院”所遇到的那样。“宇宙科学院”一案恰恰是因于“游戏的缘故”，其实这些缘故是同这一小组的完全是严肃的科学和哲学志趣结合在一起的。在意外地逮捕并搜查小组某成员时，在他那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有“宇宙科学院”“成员”的全部名单以及他们的外号——“职务”。这些外号当然被定作是：

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参与者的匿名。这些游戏竟使它们的参加者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名单是在大学生伊凡诺夫的笔记本里发现的。朋友们蒙冤，伊凡诺夫便认为自己有罪，在索洛韦茨基时就有意染上伤寒病而死亡。还有人在审讯时发了疯，喜滋滋地“任命”自己的熟人和老师为“将来的俄国政府”的成员，于是又把一批人牵扯到“案件”里，使他们遭到逮捕。^①

1928年底，在巴赫金的好友中，“捉拿了”蓬皮扬斯基，但很快就释放了。三十年代初，祖巴金被捕，流放到北方。巴赫金也遭逮捕，并在1929年夏就被判处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服刑五年。可是，巴赫金患有重病，他的身体连列宁格勒审讯时的监禁也经受不住。他的髋关节炎症复发并恶化，很快就进了医院。关于此事，我们是从巴赫金向卫生人民委员部递交的一份声明中得知的：

6月17日这一折磨人的病又因肾上腺发炎而加剧，7月10日在乌里茨基医院做了手术，可是我还是感到难受，左髋骨还是有大面积浸润。目前我在埃里斯曼医院接受主治医生的观察。^②

声明所注日期是1929年9月2日，末尾只提出一个请求：

从我目前的身体状况看，如果对我的判决依然有效，无疑就等于判我立即惨死。因此，我请你们指定医生委员会检查我的身体。^③

① 参见：H·H·安齐费罗夫：《回忆录中的三章》，载《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35—144页。

② 《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87页。（原注）

③ 同上。（原注）

这份声明是通过当时还存在的，由 E·П·佩什科娃和 M·Л·维纳韦尔领导的政治红十字会转到有关部门的。十月中旬，重新审理的要求被拒绝，但是，由于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朋友们（M·Н·卡甘和M·Б·尤金娜）的拼命力争，医生委员会（对此后人会感到惊奇）竟然“起了作用”。假刑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判决改为流放库斯塔奈，这是西伯利亚和哈萨克交界处的一座小城镇，那里虽说气候干燥炎热，然而搞学问无疑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假如巴赫金晚五年被“捉拿”，那末改北方集中营为南方流放就成了不可想象的事了。他根本不可能在什帕列尔活到判决的那一天，不会进医院，不可能让妻子及时知道他自己情况和判决一事。对五年以后被捕的人来说，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政治红十字会已经不复存在，更没有卫生人民委员会干预和改北方集中营为南方流放的可能。枪杀基洛夫以后的“大恐怖”把列宁格勒的这一切扫得个精光！

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自由主义”时期，极权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真的能独揽一切。关于这一点，至少有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书，在他被捕时不仅出版了，没有被没收或查禁，而且，（已经在巴赫金被定罪和判处集中营服刑之后）甚至还有人写了评论。1923至1930年（从1929年8月到1930年3月）间，报刊杂志上登出了六篇评论，E·Б·维诺格拉多夫在《论艺术散文》（1930）一书中用十页的篇幅谈到了这本著作。

至今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完全是称赞此书的，他支持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结构的看法。这篇评论刊登在《新世界》第十期上，正是在那一

个月里，判处已经作出，重审的申诉被拒绝，而因身体情况集中服刑的改判问题还尚未落实。不仅如此，在押送去流放之后还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那是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Л·Н·托尔斯泰选集第十一卷（戏剧作品）和第十三卷（长篇小说《复活》）中的两篇序文，这对后一代被镇压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肯定是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在保护着巴赫金，如果不是保护他的身体，那末至少是保护他的生命和他的高风亮节。也许，正是高风亮节才是他的生命力的源泉？不论怎样，在偏僻的外省城镇库斯塔奈（按照纯粹是书刊检查“所删去的部分”来看，巴赫金从那时起是“定居”^①在那里的）度过的六年帮了他的忙，没有使他在后来的变本加厉镇压的十年里丧命。北部哈萨克斯坦气候干燥炎热，这对患有肾脏病和骨髓炎的人来讲，与其说是有害的不如说是有益的。他和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形影不离。实际上他不受行政当局的限制，可以收到幸免于难的友人们寄来的包裹、钱款甚至新书。

当然，“时代的喧哗”，常常是很刺耳、很令人心痛的，也传到了那里。在三十年代，巴赫金失去了许多朋友。1936年，沃洛希诺夫在列宁格勒去世；当时已被遣送北方的

① 由于书刊检查的禁止，巴赫金被捕一事本身、判处服刑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改判流放库斯塔奈，在B·科日诺夫和B·孔金的《……简述》中甚至都未提及；只是说“在论陀恩妥耶夫斯基一书出版后不久M·M·巴赫金定居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交界的库斯塔奈城。他在这里度过了约六年头，在当地机关里供职。”（《诗学和文学史问题》，论文集，第8页。）（原注）

涅巴金，要赶来参加葬礼而没有得到许可，又被逮捕，这次被放逐集中营，一年后就在那里死去。瓦吉诺夫在二年前去世。二年后，尼古拉·克柳耶夫在纳雷姆边区去世。M·H·梅德韦杰夫在1936年从列宁格勒“消失”，也死在劳改营管理局系统的某地，如果“平反证明”是可信的话，是死于1938年。1937年底，在绝望和惧怕之中（等待逮捕）M·H·卡甘因心绞痛而死亡。

四

在流放期间，巴赫金继续研究“语言创作美学”问题，已经不再远远离开为专门的“顺便的”研究所选定的领域。1936年夏来到莫斯科时，他带了一大本书要和卡甘讨论：

我现在要看M·M·巴赫金的一本书《论长篇小说中的语言》。他给我的是份手稿，从开头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想法同我过去在论屠格涅夫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是相近的……我的这一看法是顺便提起的，虽然它很重要，可以根据它写篇短文。M·M·巴赫金谈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展开了的。我对M·M·巴赫金的这部书很感兴趣……①

这个城市里的大学生和所有的知识分子真是幸运之极，他们能听到M·M·巴赫金关于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关于启蒙主义时代、关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那些演讲。他学识渊博，不仅擅长文学，而且通晓哲学、美学、语言学。他的演

① 自此以后的文字，疑系原版本脱漏。（译者注）

讲不同凡响，才气横溢。

他的一个学生很久以后告诉我说，全城的人都跑来听流放的教授为萨兰斯克教育学院学生作的演讲，市党委负责人起初对此有些感到难办和困惑，但是，没有得到有关的专门指示，他们自己却跑来听他讲演，并且被他的博识所征服，所迷住，犹如久旱突逢甘雨。确实，人们没有为此再去酬谢他，他住在旧教堂的陋室里，饥寒交迫。①

如果说这里有民间故事的成分，那末，第一，它们用幻想形式加以改变的，与其说是巴赫金教学富有魅力、学识经天纬地，还不如说是“市党委的负责人”；第二，把现实的一个人的形象加以“民间故事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本身就对这个人作了很多说明。引人注目的是，M·И·卡甘的文献证据和一些口头“叙述者”讲的回顾过去的事，在这一点上是相吻合的：巴赫金精神上的胜利是他个人魅力和才华的胜利，同时，也竟是他实际上的失败：最后丢掉了工作。“他不得不离去”，或者，“确实，人们没有再去酬谢他”——这里的区别是不大的；莫非是细节上童话般地不真实吧，一个被免职的、官方不准其讲演的人，在1937年竟然被允许在任何地方向公众演讲？

1937年秋，巴赫金一家回库斯塔奈两个月，显然是想彻底结束他们在那里的移民流放生活。无论在列宁格勒，还是在其他什么城市，巴赫金想在大学里找个工作，但怎么也没有找到，因此，他在基姆列城（离莫斯科较近）定居下来（这

① H·亚涅维奇：《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笔记》，手稿，1979年第68——69页。（原注）

次确实是，至少一半是“定居”，由自己选定的）。他显然不能住在莫斯科市里，因为没有房子、没有户口（也得不到），最主要是因为一个“有”，有一份“打上横道”的东西，那就是一张城名表，表中注明不准刚获释的流放犯居住的城市。

在基姆列，巴赫金只是在一所中学（那里只有这一所）谋得了方学教师的职务，但他能够（通过朋友）从莫斯科的几个图书馆里借书，并且与莫斯科一些研究所和大学里的同行交往。战前几年，他在那里写了二部长篇著作。

《教育题材长篇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意义》一书包括了自古希腊罗马晚期起欧洲长篇小说史的广泛问题，基本上是论歌德的，论他的三部关于个性形成的书（《诗与真》、《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书已写完，并“交给了出版社，但未能在战争开始前出版，书稿在战时遗失了。”①

论拉伯雷的那部长篇论著也完成了，并提交出去了，但不是给出版社，而是作为应考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提交的，这样就会有在大学任教的资格。当时，巴赫金已经同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取得联系，1940年底和1941年初研究所讨论了他提交的两篇文章《长篇小说中的语言》和《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1940年向该研究所提交的还有他的学位论文《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弗朗索瓦·拉伯雷》。战争开始前没有来得及“安排”答辩。

① M·M·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莫斯科，1979年第395页。（原注）

在整个战争时期，巴赫金一家依旧住在小城基姆列。只是在战后才出现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和重新提出论文答辩的问题。

五

1945年秋，莫尔多瓦教育学院（自1957年起改为莫尔多瓦大学）再次邀请巴赫金到萨兰斯克工作。不久便任命他为共同文学教研室主任。1946年秋，终于安排了他的学位论文《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答辩。

在研究所里原封不动地搁了六年多，只是为了应考哲学副博士才拿出来的这部论著以其无限广阔的科学视野、独特的方法和独到而丰富的学术思想使评委们大为惊讶。三位评委委员一致作出结论：建议学术委员会立即授予应考人哲学博士学位。这样授予学位的先例已经有过，因此评委们一致提出的建议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办不到！

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就已经出现了障碍，事实表明，这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关于这次答辩的简短的，但完全是实事求是、表示肯定的总结半年之后刊登在《苏联科学院学报》上；在此得大段引用，因为“三言二语说不清”：

论文是为应考哲学副博士学位而提交的。评委委员哲学博士A·A·斯米尔诺夫和И·M·努西诺夫以及艺术学博士A·K·古韦列戈夫对论文作了极高的评价并建议授予M·M·巴赫金博士学位。在辩论时，Д·Е·米哈科奇、В·В·戈尔嫩克

等生发了言。肯定了论文的某些部分。他们指出，M·M·巴赫金的论文对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具有重大的和原则性的意义。M·M·巴赫金不仅阐明了拉伯雷创作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且他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特殊类型的现实主义、拉伯雷在欧洲思想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论文阐明了文艺复兴历史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关系、关于中世纪文化发展的两条路线问题和其中一条路线与古代世界人民生活的直接联系……

但是，论文作者的一系列观点，尤其是他所用的术语引起了异议。辩论持续了七个半小时。在原则上反对论文作者基本观点的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Н·К·皮克萨诺夫、教授Н·Л·布罗茨基和В·Я·基尔波金。于是，三位评委委员又都作了第二次发言，许多与会者也发表了新的看法。论文作者在最后发言时竭力坚持自己的观点。

一致决定授予M·M·巴赫金哲学副博士学位。然后，就授予博士学位问题进行了表决，结果是：7票“赞成”，6票“反对”。此事转交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裁夺。①

授予副博士学位的决定在答辩后立即生效，这在当时的生活中是件很重要的事。首先，副博士学位已经表明取得了在高等学校任教，甚至是主持教研室的正式资格（当时博士不多，即便是现在，连外省大学教研室主任职务所需的人数也不能满足）。其次，从1946年春起决定大幅度提高具有副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的工资（两倍多）（根据同一决定，具有教授职称的博士工资再多一倍）。由于全国所有高等学校统一实行这种工资体系，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得到保障”

①（无作者名）《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拉伯雷》载《苏联科学院学报》，1947年，第5期，第123页。（原注）

的”，因为地方领导不能擅自更改。

后来，这一特殊待遇导致了坏的风气。高等院校的知识和道德水平急转直下，营私舞弊的不正之风广泛地渗透到学位和学衔的准备、答辩和审核体系中，也同样渗透到学校本身的一切活动中。但是，在当时（战后头几年，还是饥荒时期），这使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免受贫困和饥饿之苦，何况，同时又给同样级别的大学教师发放“定额本”，作为对一般购物卡的补充。这一“贵族餐桌上的残羹冷炙”当时还没有被看作是对知识分子采取的“鞭子和糖饼”政策中的一个新步骤。

由于通过了论文答辩，巴赫金在萨兰斯克担任教研室主任多年。教育学院改为莫尔多瓦大学以后，他所领导的教研室采用俄国和外国文学教研室这一名称（当时，“共同”文学的概念是作为“世界主义”的概念而毁誉的，并到处被“外国”文学所代替）。

是否将授予巴赫金博士学位，这取决于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取决于速度，取决于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何时审议批准的问题。为了使国家的文化生活趋于完全的和强制的一致，战后的“拧紧螺帽”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几乎是在巴赫金答辩的前一天，公布了著名的《联共（布）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决议》中的第一个，这也是最严厉的一个决议。1946年8月14日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的决议》，实际上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两位极有声望的（不是靠来自上面的指示和奖金的）作家——安娜·阿赫玛托娃和米哈伊尔·左琴科。

对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关于授予巴赫金博

士学位的决定，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对于象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这样的工作拖拖拉拉的机构来说也是慢的。一年过后仍没有眉目。而在1947年11月，《文化与生活》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其矛头是针对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领导和成员的。文章的题目是《克服文艺理论迫切问题研究的落后状况》，文章没有署名，也就是说被认为是“编辑部”文章，在“联共（布）中央文化局机关报”里这等于是这个具有无限权力的中心的直接指令。可是，在莫斯科的人知道，文章是出自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维克多·尼古拉耶夫之手，而此人前不久申请进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预备部，但遭到了拒绝。

文章在列举其他一些不正之风（丧失“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精神”等等）时，也还讲到了论文答辩时常有的恶劣行径。

“该所学术委员会在授予学位问题上常常表现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态度”。

B·尼古拉耶夫这样写道，并恰恰举了巴赫金论拉伯雷的论文的答辩作为例子。他断章取义，信口雌黄，宣称论文是“反科学的”和“弗洛伊德主义的”。自此之后，所有出版社见了巴赫金的名字又都摇头，而授予不授予博士的问题实际上是预先定好了的。

但是，要否决掉还得等四年，看来要等到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彻底蜕化变质，德性败坏、科学上的良知丧失到极点的时候。说实在的，正是为了把整个知识界搞得乌烟瘴气才在战

后开始搞“思想斗争”——起先是批艺术文化和人文科学思想，而后是批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创造性思想。

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哲学博士学位授予问题，到1949年5月才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巴赫金本人当时被邀往莫斯科出席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会。要他出席只不过是“照章办理”而已，实际上纯粹是在捉弄人，因为在有各学科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之前，委员会总是先搞“黑检查”和审理，委员会里的“专家们”已经作出结论并通知了应考人：

同时通知您，初步鉴定表明，论文中的一系列观点是错误的：您对拉伯雷的分析，脱离了整个时代，脱离了当时法国和整个欧洲的人道主义运动。在分析《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时完全忽视了小说的构思、小说的思想方面，这就使论文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①

说得简单些，现在已经找到了“黑检查官”，他们写评语的原则就是“见风使舵”，使“科学性的”论据趋附于党报党刊的大批判文章。至于实事求是，那是丝毫也不讲的。

尽管如此，这还不是结束。又过了二年，才传出否决的消息（答辩之后几乎过了五年）。下面的文字摘自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1951年6月9日的会议记录：

会议听取了：

第4. 关于授予M·M·巴赫金哲学博士学位的决议。该决议

① H·涅涅维奇：《1930年至1970年间的世界文学研究所》，载《回忆、历史文集》，第5册，莫斯科—巴黎，1982年，第99页。（原注）

是根据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946年11月15日副博士学位论文《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拉伯雷》的答辩作出的。

会议决定：

鉴于提交答辩的论文不符合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拒绝接受关于授予M·M·巴赫金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①

我们看到，这纯粹是“文牍”：官腔十足，机械刻板，空洞无物。“初步鉴定”只不过是在人数众多、名位最高的办公室里依样画葫芦搞出来的东西。

这没完没了的戏总算这样收场了。

巴赫金在莫尔多瓦大学主持教研室直至1961年，当时由于健康原因他想退休。但他并未中断教研室的工作、与学校同事、学生和研究生的联系以及与萨兰斯克作家们的联系。1969年，因为（他本人以及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体力不支，必须要去莫斯科。萨兰斯克的朋友们以为，这是暂时的，治愈后他们就会回来的。

可是，身体没有康复，元气大减。巴赫金一家又在莫斯科附近住了二年多，时而在作家创作之家，时而在克利莫夫斯克城（在敬老院，自1970年5月至1971年12月）。1971年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就是在那里离开人世的，就在这一年，在莫斯科市里分到一套合作制的房子，而她却没有来得及住进去……

受到这一打击，巴赫金的身体已经再也不能恢复了。他继续工作，他的最后的一些著述，是在1974年写的。他身边聚

① 同上注，第6页，第100页。

集着很多人——中青年文学家。他们全都准备好去帮助整理档案，为文集和杂志组织发表新的材料，为文学出版社准备他的旧作选集。文集《文学和美学问题》收录了1924年至1940年间的最佳之作，这些文章以前由于某种原因未能问世，但文集在1975年，巴赫金去世后马上就出版了。

六

巴赫金的名字及其著作回到“书刊流转”中，只是在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揭露“个人崇拜”之后才成为可能。即使是在那时还需要许多年时间和许多努力才能克服“作风的惰性”：只是到六十年代才出版和再版了他的新旧著作。

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书刊上第一次提到巴赫金，是叶·平斯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现实主义》一书（1961）。继此之后（在1962年），他的名字出现在B·科日诺夫几乎同时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发表在《文学与生活》报和《文学问题》杂志上）。①最后，苏联作家出版社在1963年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增订补充版，并取用了新书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此书引起了普遍的兴趣，不但经年不减，而且与日俱增。这不是偶然的：二版之后不久又出了三版（1972），然后是四版（1979）。对于一部文艺理论著作（不是出自于某位高级官员之手）来说这是件极为罕见的事。

① B·科日诺夫：《文学与文艺学》，载《文学与生活》，1962年3月16日；《科学性即是同生活的联系》，载《文学问题》1962年第3期。
(原注)

的确，也有人想搞“大批判”，结果是独家在批：A·迪姆希茨的《独白与对话》^①一文引起了反击，反击论据充足，具有摧毁之力，结果提出搞“大批判”的人反而陷于困境。驳文《探究问题的本质》^②把迪姆希茨的荒谬之说、逻辑矛盾、歪曲原意，甚至是“不知”所论就强作解释等一连串的东西全都揭了出来。

不但如此，一星期之后，以《致〈文学报〉编辑部》联名信的形式又刊登了第二篇文章，^③署名的人是些各种各样的完全合不一起的人，但他们在苏联“文坛”的不同圈子里都是些有影响的人物。结果，发起争论的人只得寻思怎么溜之大吉，同时又“丢面子”，就是说至少要保持作者的声誉，因为那位作者颇有“身价”，他可以在刊物上作回答，甚至可以在报刊上的争论中作裁决——在苏联报界能如此作为几乎是难以相信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之所以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其原因完全不是对这些问题有着同样如此强烈的兴趣。凡是关注巴赫金命运及其著作的都清楚，给报纸的联名信不可能是“联合”写的。可以推测，巴赫金的狂热崇拜者中有人只是在为巴赫金的下一部书的命运担心，因为这部书

① A·迪姆希茨：《独白与对话》，载《文学报》，1964年7月11日。
（原注）

② И·瓦西里耶夫斯卡娅、А·米亚斯尼科夫：《探究问题的本质》，
载《文学报》，1964年8月6日。（原注）

③ В·阿斯穆斯、А·叶尔米洛夫、В·佩尔佐夫、М·赫拉普钦科、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致〈文学报〉编辑部》，载《文学报》1964
年8月13日。（原注）

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里束之高阁二十五年以后现在正在“编辑”中。

论拉伯雷一书很早就开始慢慢地准备出版。还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第二版出版之前，由于出了《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新译本，刊登了一篇短小的文章，但署名的却是大名鼎鼎的人：除了译者H·柳比莫夫以外，还有院士维诺格拉多夫和康斯坦丁·费定。文中谈到希望出版巴赫金的学位论文，他们说这篇论文

得到了评议人E·B·塔尔列和M·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A·A·斯米尔诺夫通讯院士、B·B·托马舍夫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但是，在个人崇拜时期的条件下，这篇研究性著作，尽管充满深刻和创新的思想，却未能问世。

文章最后建议说：

我们建议国家出版社领导采取措施尽快出版M·M·巴赫金的《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弗朗索瓦·拉伯雷》一书。①

而现在——整整过了两年，在书的出版看来是有保证的时候，迪姆希茨的文章可能导致“撤销”，不能出版。应该认为，写完《致〈文学报〉编辑部》这篇文章后，匿名作者就急忙征集签名，找那些对于国家出版社领导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可以说，从各种不同参数来看也是具有权威性的人

① B·维诺格拉多夫、H·柳比莫夫、康·费定：《一部人们所需要的书》，载《文学报》，1962年7月23日。（原注）

物。结果，“同寓一舍”的竟是些很不相同的人：一方是B·叶尔米洛夫和M·赫拉普饮料，另一方是B·阿斯穆斯。

论拉伯雷一书终于在1963年出版了。这两部书（还是在作者在世时）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学者巴赫金驰誉世界，与此同时他在国内人文科学界中的名望却完全是自发而起的。

为纪念巴赫金诞生五十周年，一些机构和各大城市专门举行了集会。1971至197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已经不是论述巴赫金的个别几本书，而是论述他全部著作的学术意义了。但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这一意义的估价明显不足，不理解象巴赫金这样的现象对于人文科学和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文章的作者常常把巴赫金放在这种或那种合乎他们心意的河道里，把他的活动摆在最合乎他们兴趣的背景中。例如，科学院的一些权威人物从二十年代的巴赫金评论这样一个背景上去分析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认为巴赫金的几乎是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于既克服了改头换面派（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又克服了“形式主义方法”。①人们仍然完全不注意、不理解这一点：这部书早在六十年代就震动了思想界，其影响所及远不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学”（顺便说一下，此书的基本思想——复调也是这样。复调不仅是主人公之间或主人公和作者之间，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全新形式）。诚然，论拉伯雷一书被放到了稍许广阔的背景中，被认为是文

① Г·М·弗里德连杰尔、Б·С·海拉特、В·М·日尔康斯基：《М·М·巴赫金著作中的诗学和长篇小说理论问题》，载《苏联科学院学报》，文学语言集，第30卷，第1分册，第53—61页。（原注）

艺复兴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阶段。

主张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研究语言和文学现象的那些人，只是把巴赫金看作是现代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预言家和先驱者，还是把他的意义看作是过时的，同时又忽略了他的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的思想——他作为一位独树一帜的思想家所具有的意义。①

在巴赫金著作收集和研究中还开始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例如，将巴赫金生前没有发表或散见于各种期刊、现在的读者不可能见到的文章汇编成集，在选编和注释的工作中就采取了这种方法。②这本文集总括了思想家在五十五年中科学和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第一次使人感到他的世界观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以及他思想演变的特点和范围。

至于涉及面极广的注释，这本集子在许多方面是很出色的。这是一个范例，它表明俄国文艺学研究种类的范围是多么广：一般的注释（如同以前常有的那样）在这里转变为一种研究，依据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对这位著名的俄国思想家作了出色的研究。甚至是“研究种类的要求”（尽可能地避免直抒己见）也在这些注释里成为一种合适的形式，那就是以一种“对话的”，似乎是“询问的”态度去处理材料。也许，在为数不多的现有的巴赫金研究论著中，这里所利用

① 参见：Борис Борисов，«М. М. Бахтин о символах, слове и диалоге: мысли о символике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имволики», «Символистика», № 4, 1973 г., с. 5—44.

② М. М. Бахтин: «Лингвоставесмий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 Г. Борисов (ред.), С. А. Аверин (зам. ред.), С. Г. Борисов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1979, с. 384—415. (Примечание)

的材料第一次没有“被物化”，没有变成一般注释者为建立或证实某个逻辑公式和观念而加以利用的手段和材料。本文集的注释者再三琢磨，希望从两个方面了解巴赫金本人的逻辑和观念，一是从它们的内在的具有个性特点的联系和统一中，二是从巴赫金的精神特性和学术立场所固有的“原则性的无终极性”。

这一研究性的注释，引文简短而又确切，利用了关于巴赫金生平和活动的大量新材料，尤其是广泛援引了以朋友们的名字出版的，但据注释者考证属实属巴赫金的那些文章和书中的话。

有三部书和一系列文章是以巴赫金的朋友们的名字发表的，但据口头传说是出自于他本人之手。它们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相当复杂，需另作考察。

七

为纪念巴赫金诞生七十五周年，出版了（在1973年，确实，稍许晚了些）两本文集《学术笔记》，一本是萨兰斯克，另一本是塔尔图出版的。两本文集开篇各有一篇论巴赫金的文章，主题和风格却迥然不同。萨兰斯克版本中的就是那篇（至今也是唯一的一篇）《生平和活动简述》，基本上是由B·科日诺夫撰写的，它仍然是我们叙述巴赫金生平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

关于以巴赫金朋友们的名字发表的三本“有争议”的书和一些文章的作者是谁，这里只是作了一下暗示：

根据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哲学与心理学、哲学与美学问题的谈话，后来就写成了一系列文章和书。^①

对此说所作的注脚中指出的书有B·H·沃洛希诺夫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I·H·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B·H·沃洛希诺夫在杂志和文集中发表的一些文章”。这一注脚只是提了一下而没有一一列举。最有可能的是，B·科日诺夫在阐述这问题时应该同巴赫金本人相一致，因此在“……简述”中只能这样表述：巴赫金完全可能有出于道德，甚至是出于务实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后来妨碍了对这些书和文章进行“考证”。

塔尔图版本的序文是B·H·伊凡诺夫的《M·M·巴赫金关于符号、言谈和对话的思想对现代符号学的意义》。文章十分坚决地肯定巴赫金是作者。此文有一附表“引用的巴赫金的文章和书”，其中也包括以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名字发表的三本书和梅德韦杰夫在1926至1930年间发表的三篇文章，附表注解说：

作品1—5和7的正文由巴赫金撰写。他的学生B·H·沃洛希诺夫和I·H·梅德韦杰夫只是对个别地方（在有些情况下，如5和小标题）作了少量的增补和更改，这些文章和书后来是以他们的名字发表的。所有这些著作均出自于一人之手，这已为目睹者们所证实，从正文本身也显然可以看出这一点，如同根据引文可以确信的那样。^①

① 《诗学和文学史问题》，文集，第6页。（原注）

② 《符号体系论著》，第6卷，第44页。（原注）

当然，这一切显得有些奇怪。为什么不指出目睹者们是谁？为什么不引用最主要的“目睹者”——巴赫金本人的话？要知道，不仅在这篇文章（作为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纪念会上的报告）第一次口头发表的时候，而且在三年之后，《符号体系论著》第六卷出版的时候，巴赫金还在世。

认为从正文本身以及从 Bax·Bc·伊凡诺夫的引文中“显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文字都是巴赫金所写，这一看法也是不很令人信服的。可以从所有这三本书中摘出同样那么多的引文来证明相反的东西；也就是说，从风格和语调，从思维方式和对“别人的声音”的接受方法来看，这些文字不可能是出于巴赫金之手！

很明显，伊凡诺夫的文章是谈巴赫金关于符号、言谈和对话的思想对现代符号学的意义，因此它非得把《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作为巴赫金所写的书来利用不可，因为正是这本书把语言当作符号体系来谈的；而专门论述“言谈”问题的两篇文章，虽然署名沃洛希诺夫，但伊凡诺夫却把它们列在巴赫金著作表里。

伊凡诺夫的文章也许是对“别人的声音”——在这里是对巴赫金本人的个性和思想方法——采取“独调的”、客体的态度的最典型的例子。对“别人的声音”——对意识，对“别的”人的内在个性采取“对话的”态度，在巴赫金看来，这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特征和他在艺术上的发现，而且也是道德的必然要求。这不是说对另一种思想方式要有起码的宽容态度，而是要比这多得多。巴赫金的道德哲学要求对具有主权的人的个性采取一种特殊的态度，正如人

们常说的要有“开放的思想”；要准备听别人说，理解别人的意思，要探求真理；没有求知欲，“意识”的交往和相互作用就一无成效。这种对“别的意识”采取的探求的、“发问的”态度，这种对“别人”所说的话从本质上作出对答、异议或赞同的能力，巴赫金就称之为“对话的”态度，与之相反的则是“客体的”或“物化的”（“独调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别人的个性和他的思想只是变成（常常是不由自主地）一个客体，成为对自己的观念或自己所喜欢的“现成的思想”加以支持和证实的一种手段。巴赫金善于对别人采取“对话的”态度，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现代思想家能更好地对巴赫金个性和思想采取这种态度。

然而，木已成舟。巴赫金没有对伊凡诺夫的声明提出异议，因此这一说法也就被苏联学术界所公认，似乎这就是对假名或匿名文字作了持之有据的考证。甚至在引用三本“有争议的”书和某些文章时，全都附上了和伊凡诺夫一样的说明：

正文由巴赫金撰写，书以B·H·沃洛希诺夫之名出版。

或者，在谈到《弗洛伊德主义批判》时说：

正文由巴赫金撰写。①

声称又有一大批著作是巴赫金所写这一说法轰动一时，而西方对此却另有看法。西方学者想得到更有分量的证据，

① M·M·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第399、403页。（原注）

然后才会去更改扉页上的作者名字。看来，附有伊凡诺夫这篇文章的塔尔图版的《符号体系论著》第六卷，只是在1976年才传到美国，当时《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已经译成英文并出版（1973），当然用的是B·H·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同样也译出并准备出版。在该书序言中详尽地论证了为什么作者是巴赫金这一“非常”声明会引起怀疑：

B·B·伊凡诺夫的这一声明并没有任何证据，只是随便谈到：有‘目睹者们的证明’，以及作品本身（即沃洛希诺夫、梅德韦杰夫和巴赫金三人的作品）表明作者是一个人——巴赫金。显然，伊凡诺夫所知道的比他目前想说或能说的要多得多，但在现在的情况，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他所声明的就是事实。①

有些人怀疑作者是巴赫金，这是不能同意的。比如，H·季图尼克和H·布拉斯认为，只有四年（1926—1929）功夫就写出这么多，这本身就不象是真的：三篇长文和四部书，而且每次都转向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心理学、诗学、语言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每次都利用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

这看起来确实难以置信，如果没有考虑到巴赫金早在维捷布斯克——至少是从1921年起就开始研究上述所有学科的问题的话。为了从边缘学科中划分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

① V·N·Voloshinov:Freudianism·A Marxist Critique·Translated I·R·Titunik·Preface Neal Bruss and I·Titunik·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6, p·XIII. (原注)

——道德哲学和诗学(“语言艺术创作美学”),他认为自己必须根据第一手资料弄清所有这些学科的近况。不但如此,这些“顺便的”研究几乎总是使巴赫金对总的问题以及它在“交叉”知识领域里将如何解决的前景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当然,这种方法只有象巴赫金这样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才有可能采取。

至于J·季图尼克和H·布拉斯的其他一些疑问和论证,与其去一一反驳,还不如去发挥它们,使它们更准确一些。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美国版的译者J·季图尼克合乎情理地指出有一种奇怪的前后不一的现象。

应该指出,……B·B·伊凡诺夫没有把《在社会的彼岸》一文作为是巴赫金的著作。但是几乎通篇都收到了《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中了,伊凡诺夫当然是认为此书是巴赫金写的。不能想象,伊凡诺夫竟然会不知道较早写的那篇文章。^①

确实,要么承认这篇早期的(1925)批判弗洛伊德主义的文章也是巴赫金写的,要么否认同一题材的那本书通篇都是出于巴赫金之手,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可以称之为“少量的增补”的东西。《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美国版的出版者们的这一看法也是对的,他们断言说,《在社会的彼岸》一文“几乎绝对不可能是巴赫金写的”。^②

美国学者们的观察力是十分敏锐的,他们发现,不同的

① V·N·Voloshinov·Freudianism,Translator's Introduction,p·2.

② V·N·Voloshinov,Preface,p·xiii。(原注)

风格和思想之间有着相近（也可能是相关）之处，而那些不同之处在把巴赫金的文字作为一方，把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文字作为另一方加以对照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

许多读者惊讶地看到署名 B·H·沃洛希诺夫的文章和书在风格上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也是在当时发表的、署名巴赫金的唯一的一部书）不同的。当然，还应该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即署名B·H·沃洛希诺夫（以及梅德韦杰夫）的著作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从一定的观点看是非正统的），而在巴赫金的书中却完全没有。①

我们应该补充一点，这种风格和语调的不同（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相关联的），不仅在巴赫金本人和他的朋友们署名的书之间，而且在他的朋友们署名的每一部书里面也可以发现。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说话的，同时又常常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政论中盛行的那种命令式口气、那种应当如何甚至是非得如何的套话。论弗洛伊德主义一书中有几章概述和批判俄国和西方现代心理学诸流派，叙述精神分析的历史或严厉批判弗洛伊德的理论及其方法，在这些章节里，如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里一样，没有诸如此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动辄就批的做法。

从所有这一切可以看出，在《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正文里，多半的甚至是大量的部分确实出自于巴赫金之手，而核心部分（甚至是整章整章）都是B·H·沃洛希诺夫写的。

① V·N·Voloshinov·Freudianism, Preface, p·XIII.

当然，目前还不能认为这是完全证实了的。但不是因为这是无法证实的。以科学的准确性，通过版本学分析是可以把巴赫金同沃洛希诺夫区别开来的：把这些书的全部文字同巴赫金不同年代写的著作，以及同沃洛希诺夫的文章（例如关于音乐的，一般说来是同他在刊物上发表的与他们俩人共同的专业范围没有关系的文章）作一番全面的比较即可。对于用梅德韦杰夫名字出版的一本论形式主义方法的书，也必须同样这么做。他们俩人都发表了很多作品，因此，要作这种鉴别，材料是绰绰有余的。在本篇生平概述中不可能这样做。

和后两部书（《文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相比，在《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里，巴赫金所写的部分显然更少些。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是作版本鉴定，这部书还是应该在扉页上标上他们俩人的名字。

最后，应该说，哪怕是推测地说一说，在交叉学科——心理学和语言领域里自己的全部研究成果，以及对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方法”诗学的批判分析中，巴赫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而似乎是“赠送”给自己的朋友们呢？有人推测说，“更换姓名是迫不得已的，主要是由于社会一政治性的……原因”^①，其中也包括巴赫金出身贵族。我们觉得，从1926年至1929年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根据不足；在那时出版书，发表文章的“旧贵族”够

① 米哈伊尔·巴赫金：《文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白银时代出版社，纽约，1982年，第8页（出版者的话）。（原注）

多的了！

在这里，很可能有错综复杂的动机。问题在于，凡是涉及到象心理学和语言学这样的一些领域里的现代问题的一切，巴赫金之所以批判地研究它，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他自己的立场，提出他自己的思想，而这立场和思想对于他在研究上的基本需要，即对于“语言艺术创作美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目的既已达到，他就对“顺便”做完的东西失去了兴趣，也就不再去完成和发表这些东西。他不想在这上面花费时间，他需要时间，去做他自己认为合适的那些工作。

1924年返回列宁格勒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大批在维捷布斯克几乎是独居两年期间里完成的著作。这些著作应该拿到“康德研讨小组”里去讨论（小组成员现在经常在尤金娜家中聚会）。小组称“康德研讨小组”，仅仅是按照传统而已。事实上，把小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地从新康德主义朝着宏大的历史主义思想进发。但是青年朋友们的这一进展，各有各的方向，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还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但已经十分积极地要成为这种思想观念。朝着这一方面演进的有Л·Н·梅德韦杰夫和В·Н·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他的未完成的著作中始终一贯地展开“两条战线上”的批判——反对抽象的唯心主义和反对实证主义。这一批判在他们俩人看来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对于“当前的”思想意识生活来说的的确是很迫切的。

也许，他们曾劝说巴赫金搞完这些著作去发表，但结果只是巴赫金本人提出一个转交材料（要知道，对于巴赫金来

说这仅仅是一些“材料”！）的计划，而要他们搞完这些材料去出版。如果最后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精神对巴赫金的思想作了一些重新思考的话，那末从巴赫金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无可指责的：这同“对话主义”、具有主权的意识的相互作用的原则是一点也不矛盾的。可见，应顺时代的批判见解和合理思想必定会成为社会的财富，必定会进入当时的科学视野！

在这一点上，参与骗局的双方完全可以取得一致。这一骗局也因此而得以澄清。它是同学院派风气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戏弄、狂欢、仿佛是一种“乔装喜剧”的因素在这里无疑是有的。

但是，有一点仍然不清楚，既然书的大部分终究是巴赫金自己写的，那末为什么他连作者之一也不是？对此，也只能作个推测性的回答。应该认为，巴赫金并不以为他能够代表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准备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把自己的名字标在这些书上——由于沃洛希诺夫或梅德韦杰夫把它们搞完拿去出版，这些书最终完全“定形”了，这就等于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会意味着在思想意识上自我确定，作出选择，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和一定的责任。其他的一切暂且不说，这是同巴赫金当时已经形成的“意识的原则性的无终极性”思想是不相容的，同把个性看作是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而且也体现在完整的人身上的“自我发展的思想”这一理解是不相容的。

或许，巴赫金道德哲学的最坚定、最一贯的思想就是责任性的思想和个性统一的思想。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1919）中，他已经断言，“唯有责任性的统一”才能保证“个性诸

因素的内在联系”。晚年，在一则短记中（正在考虑为一本拟定诗文集作序），巴赫金又重新回到个性统一的思想上，用之于自己和自己的著作：

准备把我的文章汇编成集，由一个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主题统一起来。形成着的（发展着的）思想的统一。由此也就产生出我许多想法的内在的无终极性。^①

巴赫金作为一位独树一帜的思想家而具有的意义在本质上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要广泛得多，并且远远超出了文艺学或符号学的范围。我们当前还只是去思考巴赫金在人文知识各个不同领域里提出的思想的内在联系和一贯发展：思考他的历史哲学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们的道德哲学和美学、历史诗学和关于整个语言文化历史的见解。这些思想的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

为此，必须把巴赫金在五十五年从不间断的思想劳动中所做的一切加以收集、复原和系统化。不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现在都在进行这一工作。重新出版曾以他的朋友们的名字发表的那些书是这一收集阶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是“形成着的（发展着的）思想的统一”的开头几个环节中的一个环节。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形成着的（发展着的）思想的统一”乃是个性的内在中枢：心理学是第一学科，巴赫金批判地研究了其现状，划分出自己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继此之后的是法学、语言学、形式主义方法文艺学等等。

① M·M·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第360页。（原注）

译 后 记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苏联文艺理论家之一。他不仅在艺术方面有极深的造诣，而且还涉足于哲学、心理学等其它相关学科的领域。《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便是一部他对精神分析学说研究的专著。作者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既为我们认识弗洛伊德主义，又为我们了解巴赫金的文艺思想和研究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该书完成于1927年。1983年在美国再次出版。由于本书对西方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把它翻译介绍给读者。

本书的第一、二篇和第三篇第七章的一、二两节由张杰翻译，第三篇的其余部分和巴赫金传记由樊锦鑫翻译。全书由张杰负责统稿。

译 者

1987年2月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